

目 錄

魯迅研究

- 03 黎活仁 俄國式文學理論視域下《阿Q正傳》的結構分析
- 20 王玉春 劉家齊 闡釋學視域下魯迅序跋分類研究
- 41 劉靚靚 探尋魯迅筆下女性的覺醒歷程—以小說《明天》《離婚》《傷逝》為例
- 54 張克 簡括與反噬：法家文化與魯迅的“刀筆吏”問題

翻譯研究

- 67 趙一荀 宮英瑞 體認語言學對翻譯主客觀性的解讀—基於《暮江吟》13篇英語譯文的研究
- 82 高潤祥 張濤 後期維特根斯坦家族相似視角下《韓非子》英譯本對比研究
- 97 Lu Xin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 109 Ma Yong, Sun JiCheng Yan Fu and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 127 LI Xueqian He Wenbin Trad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The Influences of Confucianism in Korean History

文學與文化研究

- 144 劉征遙 《莊子·秋水》對洪大容《醫山問答》創作的影響
- 159 何健功 宏觀視角下的《貨殖列傳》經濟學思想研究
- 171 李慧文 晚清科幻烏托邦中的「文明新人」—以《新石頭記》中的賈寶玉為中心
- 185 孫麗涵 劇本殺與後互聯網文化轉型：跨媒介互動與教育創新的探索
- 197 胡文博 陳果“妓女三部曲”的妓女形象書寫

LUXUN Studies

鲁迅研究

俄國式文學理論視域下《阿Q正傳》的結構分析

黎活仁¹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摘要：本文引用托馬舍夫斯基（Boris Tomashevsky）、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艾興包姆（Boris Eikhenbaum, 1886-1959）和巴赫金（M.M.Bakhtin, 1895-1975）等的相關論述，給《阿Q正傳》一文的結構作了深入分析。

關鍵詞：托馬舍夫斯基；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阿Q正傳》；魯迅；時空體

一、引言

托馬舍夫斯基（Boris Tomashevsky, 1890-1957）〈主題〉（“Thematics”）一文²很早就列出小說常見的情節，有助於確認〈阿Q正傳〉³的寫作特徵。〈主題〉仍常用於教學，分類尤其有啟發意義，論文寫作需要一個架構，讀學者可以循序漸進，漸入佳境，告別讀後感，或讀書報告式的習慣。以下集中於幾個重點：1)主題；2). 情節；3). 細節；4). 細節印證；5). 主人公；6). 「情節分布的程序」，按步就班地進行分析。

¹ 黎活仁（Wood Yan LAI），男，1950年生於香港，廣東番禺人。京都大學修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國際金庸研究會會長、國際張愛玲研究會中方會長、國際錢鍾書研究會中方會長。《國際魯迅研究》《國際村上春樹研究》總主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名譽研究員。著有《盧卡契對中國文學的影響》（1996）、《林語堂痼疾簡嬪筆下的男性和女性》（1998）等數十種。

² 托馬舍夫斯基（Boris Tomashevsky, 1890-1957），〈主題〉（“Thematics”）姜俊鋒譯，《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方珊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107-208；中譯和英譯都有刪節，英譯刪節了內文所引的這一部分，參Boris Tomashevsky, “Thematics”, in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Essays*. trans. Lee T. Lemon and Marion J. Reis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65) 61-95。

³ 魯迅，〈阿Q正傳〉，《魯迅全集》，卷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512-559。本文以此版本為準。

二、符合讀者迫切需要的主题或政論

托馬舍夫斯基認為: 1) . 主题往往為符合讀者的迫切需要; 2) . 屠洛涅夫(Ivan Turgenev, 1818-1883)小說中有很多政論; 3) . 主题按成分兩類, 有情節 (中篇、長篇、史詩), 無情節 (醒世詩歌、抒情詩、遊記) 1。〈阿Q正傳〉是中篇, 是因為批評辛亥革命沒有帶來社會的改革, 有政論的內涵, 力能回應「讀者的迫切需要」, 引起共鳴。

1. 以陌生化瓦解辛亥革命的宏大敘事

俄國形式主義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 (Victor Shklovsky, 1893-1984) 在1917年寫作的〈作為手法的藝術〉(“Art as Technique”)一文, 提出「陌生化」的理論, 認為藝術的技巧就是要把客體(對象)變得「陌生」, 例如以從未知見的角度來寫, 文中於是引托爾斯泰(Lev Tolstoy, 1828-1910)《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和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等為例作一說明, 「陌生化」(defamiliarize)的要使事物「奇特化」, 方法是增加感知的難度, 從而拖長感知的時間, 重點放在感知過程而不是對象²。在敘事「視角」而言, 常常採用陌生人、小孩子、精神病患者甚至是動物的眼光重新建構社會歷史現象。「視角」是指敘述者觀察事物的角度。

《阿Q正傳》大部分篇幅是由一個不識字的、近似流氓、惡棍的農民阿Q把所見所聞交代出來, 據知是要寫出辛亥革命的失敗, 這跟中國歷史教科書所描述的不一樣, 在歷史學者筆下, 辛亥革命無疑會被描繪為一場顛覆封建王朝的偉大革命, 在《阿Q正傳》則是一場鬧劇, 阿Q在省城接觸到革命, 開始時覺得革命就是反對他本人(「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 造反便是與他為難。」第7章, 538)後來發現舉人老爺怕革命, 於是在街上大叫「革命了」(第7章, 541)。

¹ 托馬舍夫斯基 111。

² 什克洛夫斯基: 〈作為手法藝術〉(“Art as Technique”), 《散文理論》, 劉宗次譯(南昌: 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4) 10。

2. 國家民族大事+愛情的史詩

巴赫金 (M.M. Bakhtin, 1895-1975) 認為，史詩的時間，是記極遙遠的舊聞，是靜止的過去，是不流動的時間，也沒有未來¹，要把從史詩的久遠層面轉變為現時發生中的事件作一聯繫，加點親昵，就可以解決²。阿Q向吳媽示愛(第4章，戀愛的悲劇，523-528)，結果被拒，這顯示作者也考慮過愛情的素材。阿Q向吳媽示愛具備後述狂歡化的狎昵或親昵的特徵。「示愛」是關係人物成長於原欲的表現，另一方面是「孩子在田園詩裡常常是性行為和妊娠的昇華結果，與生、生命復蘇、死亡相關連」³，「愛情、誕生、死亡、結婚、勞動、飲食、年歲」是田園詩的基本元素⁴，〈阿Q正傳〉的少奶奶在八月間生了孩子(第4章 528)，不妨留意，即下一段所說的「未完成性」的特徵。巴赫金在九十年代中期因為中譯著作集出版，而在兩岸大為流行，特別是以狂歡化最為中國譯者接受。

(一) 沉思型哀歌

巴赫金在論「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說到了18世紀，時間在文學中變得突出，出現沉思型哀歌(elegy)的「墳墓、愛情、新生活、春天、孩子、老年」⁵等元素及其有關墓地的沉思，阿Q喜歡唱的當時紹興流行的地方戲《小孤孀上墳》(第9章，551)，具備墳墓、愛情、新生活、春天、孩子(不知道小孤孀當媽媽沒有)的要件。另外舉人老爺則符合年歲和老年的要件。〈阿Q正傳〉有「幸而已經春天」(第4章，527-528)的提示，時節也是配合。〈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用於中國小說研究並不多見，其實對文本的解讀十分有效。

¹ 巴赫金，〈史詩與小說——長篇小說研究方法論〉，《巴赫金全集》，白春仁譯，卷3(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515。

² 巴赫金，〈史詩與小說〉540。

³ 巴赫金 (M.M. Bakhtin, 1895-1975)，〈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Forms of Time and of the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巴赫金全集》卷3，白春仁、曉河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27。

⁴ 巴赫金，〈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425。

⁵ 巴赫金，〈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428。

(二) 未完成性

古希臘羅馬對人體的描述與的狂歡化文本不同，古希臘羅馬標準是所要求人體先是「嚴格完成(相對於下面提及的未完成而言)、完全現成的」，要是單獨、單一的、「生長和增生的特徵都被排除」，這包括即人體鼓起和突出部分都不提及，所有的凸起的地方(具有發育和繁殖意義的)都不描寫，口、鼻、肛門等孔洞都被堵塞。「人體彷彿被隱藏、掩蓋起來:受胎、懷孕、分娩、彌留」通常也是不加以敘述的¹。

狂歡化文本與古獵羅馬相反，描述的死亡和誕生、成長與形成，都在不斷變化、處於「尚未完成」的狀態²。「現成的東西都被拋向肉體下部，使其重新熔鑄和重新誕生」³，即通過交媾達到「未完成性」。「未完成性」更細節的表述是以「交媾、懷孕、分娩、身體成長、衰老、身體的分解、身體的肢解」⁴和「吃喝拉撒」來揭示「不斷超越自身界限的因素」⁵。

阿Q往法場時說「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好漢)」(第9章, 551)的話，以「未完成性」來說，就是投胎之後，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同一個體的死，又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

三、以矛盾衝突的方式展開情節

托馬舍夫斯基認為：情節通常以矛盾衝突的方式展開，例如愛情故事⁶。詹姆斯·N·弗雷（James N. Frey）《勁爆小說秘境遊走：弗雷的小說寫作坊》（*How to Write a Damn Good Novel: A Step-by-Step No Nonsense Guide to Dramatic Storytelling*）的「傑作生成三大妙法」是：「製造衝突！製造衝突！製造衝突！」⁷《衝突與懸念：小說創作的要素》（*Conflict & Suspense*：

¹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憲等譯，《巴赫金全集》，卷6（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5。

²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29。

³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62。

⁴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30。

⁵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31。

⁶ 托馬舍夫斯基 111-12。

⁷ 詹姆斯·N·弗雷（James N. Frey），〈傑作生成三大妙法：製造衝突！製造衝突！製造衝突！〉（“The Three Greatest Rules of Dramatic Writing: Conflict! Conflict! Conflict!”），《勁爆小說秘境遊走：弗雷的小說寫作坊》（*How to Write a Damn Good*

Elements of Fiction Writing) 一書說，一個場景如沒有製造麻煩，就變得乏善足陳，一個人物沒遭遇考驗、危險、挑戰、內心和客觀世界都沒有離奇曲折的磨難，讀者是不會感到驚喜的，這種人物，地位一定不重要，所以製造麻煩，是作者的份內工作¹。阿Q跟所有人都合不來，起而口角，繼而動武。

1. 情緒語言、理性語言、規範語言

穆卡洛夫斯基 (Jan Mukařovský, 1891-1975) 的〈對話與獨白〉(“Two Studies of Dialogue: Dialogue and Monologue”)²對於小說對話分析，有啟示作用。雅庫賓斯基 (L.P.Jakubinskij, 1892-1915) 認為獨白與對話的關係，是語言功能的對比關係，如同書面語言 (規範語言) 與口頭語言的不同，或理性語言與情緒語言的不同³；「譬如說甲用情緒語言，乙用理性語言，丙用規範語言，丁用口頭語言。」⁴。〈阿Q正傳〉也有引經據典的理性語言，「塞翁失馬馬安知非福」(第2章, 518)、「君子動口不動手」(第3章, 521)、「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第4章, 524)，至於轉述阿Q想法是用了《左傳》的「若敖之鬼餒而」(第4章, 524) 一句話，則是不可靠敘述，因為阿Q沒讀過書，是沒有文化的，施洛米絲·雷蒙-凱南 (Shlomith Rimmon-Kenan)：《敘事虛構作品：當代詩學》(*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於「不可靠的敘述」總括為下列3點，其一是：不可信賴的敘述者是：「讀者有理由懷疑他對故事的表現和評論」⁵，「若敖之鬼餒而」這句話會造成閱讀過程度的停頓，因為大家不懂這句話講的是什麼，於是停了下來，形成所謂空間化的效

Novel: A Step-by-Step No Nonsense Guide to Dramatic Storytelling)，許峰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39-67。

¹ 詹姆斯·斯科特·貝爾 (James Scott Bell). 《衝突與懸念：小說創作的要素》(*Conflict & Suspense: Elements of Fiction Writing*)，王著定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3。

² 穆卡洛夫斯基 (Jan Mukařovský, 1891-1975) 的〈對話與獨白〉(“Two Studies of Dialogue: Dialogue and Monologue”)，莊繼禹譯，《布拉格學派及其他》。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文論》編輯委員會編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 25-53。

³ 穆卡洛夫斯基 30。

⁴ 穆卡洛夫斯基 27。

⁵ 施洛米絲·雷蒙-凱南 (Shlomith Rimmon-Kenan)，《敘事虛構作品：當代詩學》(*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賴干堅譯 (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 118。

果，空間化沒有一致認可的定義，譬如華麗的修辭，可以使瀏覽速度慢下來，於是不讓閱覽太快完成，是為「空間化」的匠心¹。

（二）〈阿Q正傳〉的對話，多用口角

對話可以分為：1).「人稱型」(必須有兩個立場不同的談話參加者，二者的標記即「我」和「你」； 2)情景型(雙方在對話時受環境影響，譬如如突然聽到街上的聲音而轉變話題，此時情景因素便介入談話了。情景對談話的影響是可能不多，但也可能無處不在的；3).純粹的對話(如果立場對立，其中有了相反的意見，於是出現「爭辯性的對白」²。

情景型對話與純意義型對話，有關社交的和娛樂的主題，經常是協調的和諧的³。譬如婦女一邊工作、一邊聊天、男人在吃零食，妻子在旁邊編毛衣⁴。極端對話是「口角」，「對口角的偏愛符合兒童的天性」⁵，隨社會變得文明，「口角或爭吵的衝動亦逐漸的消褪」⁶。

〈阿Q正傳〉的對話，多用口角：「阿Q自己也不說，獨有和別人口角的時候，間或瞪著眼睛道：『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第2章,515),「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敵之後，便愉快的跑到酒店裡喝幾碗酒，又和別人調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勝，愉快的回到土穀祠，放倒頭睡著了。」(第2章,517)

2. 〈阿Q正傳〉的詈罵語與巴赫金狂歡化的比較研究

口角多用詈罵語，詈罵語是用惡毒的話來罵人，王小麗（1981-）據中外學者的分類⁷，再精簡為以下幾點，參考稱便：。

¹ 戴維·米切爾森（David Mickelsen），〈敘述中的空間結構類型〉（“Types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Narrative”），《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約瑟夫·弗蘭克（Joseph Frank, 1918-2013）等著，秦林芳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56。

² 穆卡洛夫斯基 30。

³ 穆卡洛夫斯基 37

⁴ 穆卡洛夫斯基 37。

⁵ 穆卡洛夫斯基 32。

⁶ 穆卡洛夫斯基 33。

⁷ 王小麗（1981-），〈談《紅樓夢》中詈罵語的分類及文化含義〉，《寧波教育學院學報》10.4（2008）：50-54。

詈罵語	〈阿Q正傳〉中的詈罵語
1. 跟性有關的詈罵語	包括(1)表性器官的、(2) 表性行為的和(3) 表性混亂的，以下一例是屬於(2)和(3)的共通的例:阿Q罵未莊的女人都是「娼婦」(第5章,529)
2. 貶義詈罵語	
(1) 罵人不是人的	包括a.把人當動物的、b.把人當妖魔鬼怪的和c.把人當無生命物的，以下3例是屬是a一類:
	把阿Q當作畜生來打:『阿Q,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說:人打畜生』(第2章,517) 阿Q罵小D是「畜生」(第5章,530) 「阿Q王胡是毛蟲,王胡反罵他是癩皮狗」(第5章,520-521) 秀才罵阿Q做忘八蛋(第4章,526)
(2) 罵人卑賤的	其中d. 人的低能有關的、e. 人的性質有關的、f. 專門罵女性的和g.與輩份有關的，找不到相應的例:
a. 卑微地位有關的	長衫人物在審問時指阿Q有奴隸性。(第9章,548)
b. 血緣、出身有關的	趙太爺不許阿Q跟他同姓: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趙太爺家裡去;太爺一見,滿臉濺朱,喝道:「阿Q,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麼?」阿Q不開口。趙太爺愈看愈生氣了,搶進幾步說:「你敢胡說!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麼?」(第1章,513)
d. 與相貌、生理缺陷有關的	阿Q面上有癩瘡疤,因此連光和亮兩字成了他的禁忌:「因為他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一犯諱,不問有心與無心,阿Q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第2章,516) 阿Q罵剪辮的假洋鬼子和尼姑做「禿兒」(第3章,522,

	523)
3. 生理排泄物有關的	沒有
4. 詛咒詈罵語	包括(1) 咒人死的和(2) 咒人斷子絕孫的，以下一例屬(2): 尼姑罵阿Q斷子絕孫(第3章,523)
5. 與說話有關的	沒有
6. 與宗教有關的	沒有

以上如用巴赫金狂歡化觀點來閱讀，性與排泄十分缺乏。羅賓·R. 沃塞爾（Robyn R. Warhol）對不敘述事件的分析，也有助於理解，對「不敘述」的研究，涉及四個方面，1）. 不必敘述（the subnarratable）；2）. 不可敘述（the supranarratable）；3）. 不應敘述（the antinarratable）；以及 4）. 不願敘述（the paranarratable），不應敘述指一些違反社會常規和禁忌，在維多利亞時代，「性」總是不能講述的東西¹，在威權時代，一般而言，在任何時代，太殘忍的事(如肉刑、解剖)，也不能敘述。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Problem of Dostoevsky's Poetics*, 1929)裡面認為小說的體裁有3個來源，即史詩(epic)、雄辯術(rhetorical)、狂歡節(carnivalistic)，形成了歐洲小說發展史上的3條線索²，其中狂歡節影響最大，他在《拉伯雷研究》(*Rabelais and His World*, 1965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之中，提出一種「笑文化」的理論，稱為「狂歡文化」，認為小說的「狂歡文化」來自古代的嘉年華會。

據巴赫金的介紹，由古羅馬到中世紀，狂歡節沒有中斷過，每年合計起來，大約有三個月或更多時間，是過著慶祝各種節日的狂歡生活，於是中世

¹ 羅賓·R. 沃塞爾（Robyn R. Warhol）：〈新敘事：現實主義小說和當代電影怎樣表達不可敘述之事〉（“Neonarrative; or, How to Render the Unnarratable in Realist Fiction and Contemporary Film”），收於James Phelan 和 Peter J. Rabinowitz 主編，申丹等譯。《當代敘事理論指南》（*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41-256。

²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白春仁、顧亞玲譯，卷5(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43。

³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

紀人就有兩種生活，一種是嚴格的階級森嚴的生活，充滿恐懼、教條、虔敬，另一種剛顛倒過來，是對神聖人事的不敬和放縱猥褻的狂歡行為¹。這種情況，由於狂歡節在17世紀後趨於式微，狂歡節被文學的狂歡化所取代，狂歡化就成為文學的一種傳統²。狂歡節後來演變為在室內戴面具的形式，沒有了廣場的群眾特徵³。

狂歡節特別重視寫地球和身體的下半部，即地獄和生殖器⁴。為了顛覆和表示不敬，帝王都到了地獄，淪為奴隸，原是奴隸的，卻在地獄變成帝王。狂歡式文學特別重視寫身體開口器官，譬如口(大吃大喝)、鼻(排泄系統之一)、生殖器、肛門。糞便、分娩、性交的描寫至為特徵⁵。〈阿Q正傳〉沒有寫到地獄，但尼姑和輪迴（阿Q認為可以投胎重新做人：「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好漢)」第9章, 551），顯示了佛教信仰的存在。

罵人髒話是「古代詼諧性祭祀活動的必要成分」，髒話的「詼諧角度」創造了自由氣氛和看待世界的另一種角度」，還有，髒話「具有雙重性：既有貶低和扼殺之意，又有再生和更新之意」，發誓或賭咒，「在很多方面與罵人話相似」(《拉伯雷研究》⁶)，沿著《拉伯雷研究》的引導，可以找到〈阿Q正傳〉因調戲吳媽，而被迫立下五條件誓詞，「指天賭咒和發誓、對流行的神聖文本和格言進行滑稽改編」(《拉伯雷研究》⁷)：

- 一 明天用紅燭——要一斤重的一——對， 香一封， 到趙府上去賠罪。
- 二 趙府上請道士除縊鬼，費用由阿Q負擔。
- 三 阿Q從此不准踏進趙府的門檻。
- 四 吳媽此後倘有不測，惟阿Q是問。
- 五 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錢和布衫。(第4章, 528)

¹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 170。

²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 173。

³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 172。

⁴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 429。

⁵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 368。

⁶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 20。

⁷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 101。

據巴赫金對「梅尼普諷刺」(Menippean satire)的總結，梅尼普廣泛插入各種各樣的文體，例如故事、書信、演說、筵席交談等，「目的在於諷刺的摹擬性」¹，以上摹擬誓詞作一重寫，不過是在搞笑。文本裡面的不同文體，像在教堂發出的聲音一樣，信眾在一起祈禱的，包括犯過罪的人，嚴格遵守教規的人；也有不思改過的人在懺悔，象徵不融合的心靈的交流²。在〈阿Q正傳〉裡面，有「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第2章, 518)、「君子動口不動」(第3章, 521)、「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第4章, 524)，至於轉述阿Q想法是用了《左傳》的「若敖之鬼餒而」(第4章, 524)，紹興流行的地方戲《小孤孀上墳》(第3章, 519)等，形成不同層次的思想和聲音。

四、作為打架的動態細節

托馬舍夫斯基認為：1) . 關聯細節 (bound Motif)：不可省略；2) . 自由細節 (free Motif)：可以省略，情節通常以矛盾衝突的方式展開；3) . 動態細節 (dynamics motif)：使情境發生變化，如人物的行動；4) . 靜態細節 (static motif)：不使情境變化，自由細節屬之，典型的靜態細節包括自然、地域、環境、人物的性格等³。

阿Q重複地出現的行動是打架，不敵之時，就說是兒子打老子(第2章, 517)，是為精神勝利法：如前所述給舊世界(舊權力、舊真理)脫冕，使之變得荒謬可笑，並為之送終，同時又產生一個新世界。⁴「毆打和辱罵「是創造性的，因為這些毆打有助於新世界的誕生。」毆打就成為「歡樂的、悅耳的和節日一般的了⁵」。

五、細節印證

托馬舍夫斯基認為結構細節分四類：1) . 結構細節印證 (motivation)：例如道具；假細節印證，是道具可以引開讀者注意力，阿Q的辮子是否可成

¹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 153。

²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 153。

³ 托馬舍夫斯基 111-17。

⁴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 237。

⁵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 237。

為道具，是可以考慮的；2）。求實細節印證（realistic motivation）：令讀者覺得真有其事，如歷史背景的引進，與傳統道德或讀者願望妥協，如前所說，這個中篇的辛亥革命背景，符合這一細節。另外，也可能會導致雙重的解釋，如民間相信鬼神，於是敘事一方面附會現實，另一方面又呈現幻想的特徵，小說本端的「過了二十年後又是一個(好漢)」(第9章, 551)，顯示民間似乎信，又似乎不相信的輪迴；3）。藝術細節引證（artistic motivation）：以反常化的視角描述，例如以小孩子的眼光描寫會議過程¹。

藝術細節引證的反常性寫法，在〈阿Q正傳〉是利用沒有文化知識，對革命沒有認識的阿Q來觀察辛亥革命，即所謂陌生化，陌生化不重視描述的對象，而得益於描述事件發生的過程，因為不理解，於是多花了很多筆墨轉彎抹角去形容，；由是獲得新奇可喜的靈感。田園詩體的小說，巴赫金認為隨著人物的成長，以及走向改變社會政治的革命，譬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烏托邦思想，都會使田園詩體小說破滅，辛亥革命正是在盧梭等人烏托邦思想影響下爆發的。阿Q在省城接觸到他無法理解的辛亥革命，梅尼普體帶有烏托邦的成份，主人公常在夢境或透過遠遊去到未知的國度²，適用於阿Q往省城一行的解釋。

六、主人公

托馬舍夫斯基認為：1）。性格在命名中顯示，居住環境、外表、衣服也可以交代；2）。性格一種是不變，另一種是可變，例如壞人懺悔³。

小醜和傻瓜是中世紀諷諧文化的人物。生活方式既現實，同時又帶理想，「處於生活和藝術的交界線上(彷彿處於一個特殊的中間領域)」，不能把他們視為怪人或傻子⁴。阿Q就是這一類人物。給文本提供源源不絕的笑料，而狂歡節就是一種笑文化。

¹ 托馬舍夫斯基 124-33。。

²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 155。

³ 托馬舍夫斯基 135-36。

⁴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 9。

1. 居住環境、外表、衣服和命名

阿Q有提及其人外表：頭上長癩疤瘡(第2章, 517), 帶氈帽、穿破布衫, (第4章, 528)、口訥(第2章, 518), 居住在土穀祠。出現舊日農村常見的土穀祠、尼姑、當舖, 還有公開處決。

2. 道路時空體

果戈理曾經說過：要寫好故事，「作者只要把自己所熟悉的房子或街道描寫出來就行了。^{1]}

阿Q在小說中，幾乎是在道路上生活的，除了睡在土穀祠之外，有時在趙太爺家舂米(第4章, 525)，調戲吳媽的一節，寫到趙太爺的內院(第4章, 527)，踏上前往城市的一段，曾交代未莊不是大村鎮，「不多時便走盡了」，「村外多是水田」，之後在水田附近，就是靜修庵(第5章, 531)。

根據倫佛魯(Alastair Renfrew)《導讀巴赫金》(Mikhail Bakhtin)²的綜述，巴赫金在總結時說：人物相遇是小說重要的情節，相遇常在路上，於是與之相關的道路時空體(chronotope of road)當居首位；之後，十八世紀的哥特小說，又多出現古堡時空體(chronotope of the castle)；至於稍後又有如見於《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的省城時空體(chronotope of the provincial)，阿Q在城裡接贓(第7章, 537)，故適用此說，什克洛夫斯基說「搶劫的手法經久不衰，其命運頗為有趣」。搶劫後退化至「情節結構中的次要部份」，只「一筆帶過而已。」在後來興起的兒童文學也是常見的³。至於描述到廣場或客廳，又有了類似古代狂歡節的拉伯雷時空體(Rabelaisian chronotope)，阿Q是在廣場當眾處決的，故尾段屬之。

逃走與因之而來對之追捕，是常見情節，人物需要走來走去，故需要「非常廣闊多樣的地理背景」。希臘小說「一般是在大海相隔的三五個國家裡(希臘、波斯、腓尼基、埃及、巴比倫、埃塞俄比亞等等)」，於筆觸所及，就留下不少「國家、城市、各種建築、藝術作品(如繪畫)、民

¹ 艾興包姆(Boris Eichenbaum)，〈果戈理的《外套》是怎樣創作的〉(“The Structure of Gogol’s ‘The Overcoat’”),《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扎娜·明茨(Z. G. Mints)、伊·切爾諾夫(Igor’ Chernov)王薇生編譯，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281。

² 阿拉斯泰爾·倫佛魯(Alastair Renfrew)《導讀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田延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7)112-128。

³ 什克洛夫斯基，〈情節編構手法與一般風格手法的聯繫〉，《散文理論》53

俗習慣、異鄉奇獸和其他稀世之珍」的描述，涉及「各種宗教、哲學、政治、科學」的話題¹。

（一）劫持、逃跑、追趕、搜尋、監禁

「劫持、逃跑、追趕、搜尋、監禁，在希臘小說裡起著巨大的作用」²，阿Q是在向吳媽求愛，不為未莊所容而到了城裡去的，吸引人的地方在於：「他會遭到暗算嗎？」這就讓看官有了讀下去的興趣（《衝突與懸念》³）。足見巴赫金提示的「逃走與追捕」的道路時空體，實在十分重要。

（二）機遇、偶遇、相逢與支配力量

巴赫金提示「相逢」是希臘小說的重要情節，「相逢——分手（離別）、散失——復得、尋找——發現、辨認——不（認）識」，成為日後各類文學作品的重要素材⁴，相逢這種「機遇」，在希臘小說而言，是受到一種力量左右，早期是受天神、魔鬼和術士所幹預，後來是受惡人所阻撓。〈阿Q正傳〉寫主人公進城之後，加入偷竊的匪幫，也就是遇到壞人。

3. 由阿Q到Q老

艾興包姆(Boris Eikhenbaum, 1886-1959)在〈果戈理的《外套》是怎樣創作的〉(“The Structure of Gogol's ‘The Overcoat’”)⁵，說果戈理很喜歡利用搞笑的人名來寫作滑稽劇，〈阿Q正傳〉的開端，花了很長的篇幅討論阿Q的命名，與此類似。

阿Q因參加革命，而被地位高高在上的舉人老爺尊稱「Q老」，在狂歡節而言，是常見的「加冕和脫冕」儀式，表現出更新交替不可避免和創造意義；「它還說明任何制度和秩序，任何權勢和地位(指等級地位)，都具有令心發笑的相對性。」⁶

¹ 巴赫金，〈時空體〉 278。

² 巴赫金，〈時空體〉 290。

³ 貝爾 72。

⁴ 巴赫金，〈時空體〉 287-288。

⁵ 艾興包姆，〈果戈理〉 2005，

⁶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 163。

(一) 滑稽的故事可分為兩類

艾氏認為滑稽的故事可分為兩類:一是敘事式的故事? 二是描繪式的故事。以下把他的想法加以表列:

	艾興包姆如是說	〈阿Q正傳〉特點
敘 事 式 的 故 事	<p>是一些玩笑，同音異義詞的文字遊戲。</p> <p>給人一種平淡的話語的印象 (280-281)</p>	<p>「我曾經仔細想:阿Quei, 阿掛還是阿貴呢?倘使他號叫月亭, 或者在八月間做過生日, 那一定是阿桂了」(514)</p>
描 繪 式 的 故 事	<p>用「文字描述面部表情和手勢」,「編造一些滑稽奇特的發音, 字母或音節次序顛倒, 古怪的句法安排等等。」(280)</p>	<p>「我的最後的手段, 只有托一個同鄉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 八個月之後才有回信, 說案卷裡並無與阿Qu ei的聲音相近的人。……再</p> <p>沒有別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還未通行, 只好用了『洋字』, 照英國流行的拼法寫他為阿Quei, 略作阿Q。」(第1章, 514)</p>
	<p>「使我們隱約地感到有個演員在講話, 因此故事敘述便有一種表演的特點。」(281)</p>	<p>「我所聊以自慰的, 是還有一個『阿』字非常正確, 絕無附會假借的缺點, 頗可以就正於通人。(第1章, 515)</p>
	<p>「決定結構的不再是玩笑的簡單的組合, 而是各種面部表情和奇怪的發音動作體系。」(281)</p>	<p>阿Q「諱說『癲』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 後來推而廣之, 「光」也諱, 「亮」也諱, 再後來, 連『燈』『燭』都諱了。一犯諱, 不問有心與無心。阿Q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 估量了對手, 口訥的他便罵。」(第</p>

		2章,516)
--	--	---------

(一)用嚴格的邏輯句法掩蓋詞的荒誕

艾興包姆又說：果戈理常見的一種手法，「就是用嚴格的邏輯句法掩蓋一些詞的荒誕和不合邏輯的組合，以致使我們感覺這種用法並非是故意的。」例如，以下一段：「他雖然是個獨眼龍，又生了一臉麻子，可是要縫補官員們和其它人的褲子和燕尾服，卻幹得非常出色。」艾氏認為這種手法隱藏得「十分巧妙」，「喜劇作用卻相應地增加」¹。在〈阿Q正傳〉，也有「阿Q真能做！」(第2章, 515)這一句。

(二)改變人物的姓名或稱呼

什克洛夫斯基論情節編構手法說：阿Q參加革命後，地主改口稱為老Q(第7章, 539)，如此改變人物的姓名或稱呼，是利用主人公的身份改變，把小說情節拖長的一種方法²。

(三)反常化手法來指稱事物

「拉長情節的手法，是利用不同說法稱呼」，托爾斯泰常「不用事物的名稱來指稱事物」「第一次看到的事物那樣去加以描述」，就象是初次發生的事情，同時，他在「描述事物時所使用的名稱」，不使用慣常說法，「而是象稱呼其它事物中相應部分那樣來稱呼。」³譬如方便麵初興起時叫「公仔即食麵」，因為商標有個公仔圖案，普及之後新加坡稱快熟麵，臺灣稱為泡麵。有些地區又叫泡泡麵。

阿Q自然更自負，然而他又很鄙薄城裡人，譬如用三尺長三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莊叫「長凳」，他也叫「長凳」，城裡人卻叫「條凳」，他想：這是錯的，可笑！油煎大頭魚，未莊都加上半寸長的蔥葉，城裡卻加上切細的蔥絲，他想：這也是錯的，可笑！然而未莊人真是不見世面的可笑的可笑的鄉下人呵，他們沒有見過城裡的煎魚！（第2章, 516）

¹ 艾興包姆，〈果戈理〉 287。

² 什克洛夫斯基，〈作為手法的藝術〉 47。

³ 什克洛夫斯基，〈作為手法的藝術〉 7。

七、情節分布的程序

托馬舍夫斯基認為: 1). 17世紀悲劇規定活動地點不變, 時間限在二十四小時; 2). 在文本中暴露寫作過程的情節多有喜劇成份, 甚至變為鬧劇¹。〈阿Q正傳〉的小說發端, 作者現身談寫作動機, 談阿Q的命名過程. 故是一種元小說或稱後設小說的寫法, 「展露對於寫作行為的極端自覺」, 「暴露寫作的過程」²。談阿Q的命名過程, 小說暫時停頓下來。停頓減慢小說向前推進速度的方法, 敘述學稱之為「空間化」³。

八、結論

拙稿以道路時空體, 以及拉伯雷的「未完成性」等概念, 給讀者對〈阿Q正傳〉提供了不一般的賞析, 也許可以更能達到研閱窮照的效果。

(後記: 拙稿作為主題演講發表於2019在紹興舉行的「紀念中國魯迅研究會成立四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研討會, 寫作期間二度受疫情影響, 深感力不從心, 這次大幅度作了重訂, 增加了巴赫金的「道路時空體」、「田園詩時空體」的哀歌體和「未完成性」諸概念作為主軸, 謹在此作一說明。)

¹ 托馬舍夫斯基 140-43。

² 張惠娟, 〈台灣後設小說試論〉, 《當代台灣評論大系》, 冊3(台灣: 正中書局, 1993) 206。

³ 米切爾森 156。

An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ssian literary Theories

Wood Yan LAI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tructure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ssian literary Theories by Boris Tomashevsky, Victor Shklovsky, Boris Eikhenbaum and M. M. Bakhtin.

Keywords: Boris Tomashevsky, Victor Shklovsky, Boris Eikhenbaum, M. M. Bakhtin, *The True Story of Ah Q*, Lu Xun, Chronotope

闡釋學視域下魯迅序跋分類研究

王玉春 劉家齊¹

（大連理工大學 人文學院 遼寧大連 116024）

摘要：序跋寫作是現代作家的重要書寫內容與表達方式。魯迅序跋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在文本分析基礎上，以闡釋學解讀作為魯迅序跋新的研究切入點，以魯迅他序跋、自序跋為分類主體進行對比研究，能夠闡釋其不同的傳播原理。在他序跋中，序跋作者以“批評者”身份介入文學作品，以第三者立場引導讀者解讀文本；在自序跋中，序跋作者則以正文本作者的身份親自下場與讀者對話，以權威身份引導讀者，使自序跋擁有更高的引文可信度。序跋作者在分別持有以上兩種寫作意圖的情況下，根據文學史中對其不同的引用比例，可以發現自序跋引用可信度遠高於他序跋；而在他序跋中，有意識地對現代文學史起到整合歸納作用的綜合類序跋，同樣成為他序跋中被主要引用的對象，相關研究應回歸作家所在的文學史環境中，以避免過度闡釋的謬誤。

關鍵詞：魯迅；序跋；副文本；序跋價值；闡釋學

序跋寫作是現代作家的重要書寫內容與表達方式。魯迅序跋研究在國內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與豐富深入的魯迅研究相比，從闡釋學角度對魯迅序跋進行的系統研究還沒有充分展開。厘清不同類型序跋的闡釋路徑並加以區分，對比魯迅在不同身份下所撰寫的序跋在文學傳播層面的讀者接受差異，由此產生的學者引用魯迅序跋進行現代文學史建構的不同偏向，現有研究在此領域的挖掘相對較少。因國家與民族差異，魯迅序跋研究在國外尚無影響力較大的課題；而在國內，序跋研究起步較晚，直到八十年代，魯迅序跋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魯迅全集》中擁有獨立分卷，但收錄不全、增補不及時的情況比較嚴重；再如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魯迅序跋集》中，魯迅序跋收錄同樣存在大量散佚，魯迅序跋收錄整理與分類研究的重要性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本文將魯迅序跋分為他序跋、自序跋兩大類，對引文物件——魯迅序跋進行詳細研究解讀，並根據這些特徵闡釋其文學史作用；在解讀過“批評者意圖”與“作者意圖”的對立之後，還將選取幾篇具有代表性的魯迅序跋進行不同意圖的歸類，《蕭紅作〈生死場〉序》《〈吶喊〉自序》與《〈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

¹ 王玉春，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劉家齊，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碩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

序》將分別以他序跋、自序跋、綜合類序跋的身份進行對比分析，探討兩種意圖下讀者的代表——後人研究學者對序跋引文的信任程度。文章還將結合闡釋學經典理論，根據已有分析資料，思考該篇目獲得後人學者高度關注的原因及影響因素，並對魯迅序跋引文研究中發現的問題進行反思並總結。

一、魯迅序跋中的他者言說

研究魯迅序跋，為之定性與分類是很重要的。不同類型的序跋具有不同的文體特徵與寫作意圖，分類的詳略也可體現序跋篇章之間的整體性特徵。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全集》修訂版中，相對於1956年至1985年的上一版，首次出現了將《古籍序跋集》《譯文序跋集》單獨編集的改動，而最新的2005年修訂版中，更是將《魯迅譯文集》（十卷）單獨出版，這體現了權威出版社在做魯迅作品收錄編校過程中，有意將魯迅序跋分類編錄的傾向。在現代文學研究中，一般也傾向於將現代作家序跋以自序跋、他序跋、譯序跋的方式進行分類，但分類依據較為簡單直白，且對魯迅而言，除卻魯迅譯介的眾多外文小說戲劇，魯迅也整理過許多輯校古籍並為之作序跋，而出版刊物、發刊詞等更是零散分佈在史料之中，難以被傳統三大類包含，單獨將譯序跋從他序跋中提出，意義並不大。本文中採取的分類方式是：將魯迅序跋按照寫作意圖分為自序跋、他序跋兩類，其中，自序跋作為“作者意圖”，序跋作者與正文本作者重合；他序跋作為“批評者意圖”，序跋作者與正文本作者不重合。二者在不同作品中具有不同的闡釋作用。

文學作品的源泉是社會生活，而生活要經過作家的藝術加工和改造，創造出具有意義的文本，才成為“作品”；除此之外，作品還要由“讀者”來接受，由此構成完整的文學活動。因此，文學活動是以作品為中心所展開的活動，作者是文學生產的主體，讀者是文學接受的主體，幾種文學活動要素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過程中，圍繞著作品為中心，作者與讀者之間建立起一種話語夥伴關係，構成有機的文學活動系統。一般而言，序跋作為文學作品的一支，本身也具有相似的“作者-讀者”交流路徑。但在評述視角上，我們必須將他序跋單獨拿出討論——他序跋與普通的序跋有所不同，序跋作者並非為正文本作者，對作者而言，序跋作者是特殊的讀者，能夠在作品出版前拿到一手手稿，並作為第一位讀者對作品給予文學評論與鑒賞；對讀者而言，序跋作者又是特殊的作者，他們創

作的序跋在作品發表之初就伴隨正文本附於文前文後，序文提供指引與閱讀思路引導，跋文提供總結與閱讀感悟參考，與正文本作者一道，成為該文學作品較為權威的發聲者，其中的評述性發言更容易得到讀者的集體認同。一般模式的“作者—讀者”話語鏈則被打碎，序跋作者作為兼顧作者與讀者，又與雙方有所不同的協力廠商要素——“批評者”身份加入文學闡釋大循環中，使得他序跋在文學作品解讀中被置於微妙而不可忽視的特殊地位。

因而，在有他序跋的文學作品中，文學鑒賞的過程則依靠序跋在三個主體間傳遞：作者從他序跋中汲取意見、修訂作品；讀者從他序跋中感同身受，有序認知並理解作品；批評者通過他序跋向上影響作品的撰書成稿，向下影響作品的輸出傳播。序跋在文學創作過程中的影響可見一斑。以寫作視角的不同來劃分魯迅序跋，有便於我們對魯迅序跋的影響有更為準確的認知。魯迅序跋的影響力不僅只針對於序跋所依附的正文本自身，就如《〈自選集〉自序》也並非只針對《自選集》服務；作家自我闡述的文字，在文學史洪流激蕩中迸發出經久不息的回音，足以從作品本身映照出作者的影子，而這些模糊的作家形象、作家心境、作家創作動機便被有求索精神的後人學者牢牢抓住，以此為線索構思結網，逐漸構築出魯迅其人其文在文學史中的穩定形象。

在對魯迅他序跋、自序跋有了總體的概括性認知後，便可引入他序跋與自序跋的引文研究。如前文所言，他序跋以“批評者意圖”的姿態，成為進入作家與作者之間的協力廠商角色，縱使他們是序跋“作者”，但這種“加了料的”作家-讀者互動，終究會降低讀者對該篇序跋的信任度。畢竟，此篇序跋並非正文本作家本人所寫，序跋作者不過是與我們相同的讀者，為何他的評價就一定準確無誤？序跋作者做序跋時，正文本通常尚未正式出版，未經過市場調研或輿情預估，序跋作者又如何確信自己獨自揣摩作品而作的結論不是一家之言？

無疑，這將成為序跋作者與讀者間的一道信任裂痕。體現在具體的引文闡釋中，便從引用目的與引用頻次兩方面得以體現：在引用目的方面，相對於自序跋中更為常見的“直接引用序跋原文作為文學史結論而不加改動”，他序跋中的序跋作者發言則更容易被後人學者打上問號，這種質疑不是直接否定，而是多半傾向於與其他文獻聯合引用，共同推導出不同於他序跋引文自身的嶄新結論；而在引用頻次方面，我們將從引文角度，分析文學史教材中他序跋與自序跋的引文占比，並將二者聯動比較，來證明學者對他序跋、自序跋不同的引用傾向。

以《蕭紅作〈生死場〉序》為例，該文是魯迅在蕭紅《生死場》出版發行之際傾力寫就的他序跋。文章從上海開北的動盪時局說起，論及己身前往哈爾濱的輾轉逃亡，道出《生死場》在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審核的個中無奈，直到該組織失去文學管控的資格，才有能力將《生死場》正式付印出版。隨後，魯迅終於將目光移回《生死場》文本自身，卻又閉口不談小說劇情與人物，反倒是詳細刻畫了自己在讀過《生死場》後感受周遭的環境變化：“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¹”關東民眾在生與死中輾轉，從中流露而出的病態的現實令魯迅“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但隨即他又指出，若是這部作品能夠帶給讀者觸動與震撼，那麼“我們還決不是奴才²오류! 참조 원본을 찾을 수 없습니다.”。文章精煉簡短，共901字，由於其正文本刻畫背景在抗日前期哈爾濱，渺小的關東民眾百態在生死一線中掙紮，書稿本身便是記錄當時動亂年代底層百態的真實寫照，而作者與序跋作者又是在文壇具有相當知名度的大家，因此無論是在蕭紅研究、魯迅研究乃至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蕭紅作〈生死場〉序》都具有不凡的地位與影響力。

與自序跋不同，他序跋作者與正文作者的分異，使得序跋本身的存在就傳遞出一種資訊：關於魯迅與蕭紅二人的交往關係。《生死場》作為蕭紅日後的成名作，寫作時便一定傾注了十二分心血，請他人作序，一方面是為自己的作品贏得關注、打出市場，另一方面，大家名士的評述與講解，也可以成為自身修改精進的直接管道。因此，“他人”的選擇，必是經過審慎斟酌的。從其他資料中可知，1935年底小說出版前，胡風曾受魯迅之托為小說作序，而因蕭紅本人的請求，胡風的序最終改名為《讀後記》附於文末，而魯迅則欣然作序，成就此篇《蕭紅作〈生死場〉序》，可見蕭紅對篇首序必要魯迅來寫抱有一定執念。葉君，郎春豔《從“悄吟太太的稿子”到蕭紅的〈生死場〉——關於〈生死場〉的成書過程》（2020）中，在考據《生死場》成書與更名始末、魯迅與胡風作序跋先後時，果然引用了序跋中作為作證。

這就引出另一問題，那就是，胡風的“生死場”命名，不僅讓悄吟太太的稿子有了一個漂亮、深刻的好書名，且自然會影響到魯迅對該書

¹劉運峰編. 蕭紅作《生死場》序，魯迅序跋集（下卷）[M]，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²劉運峰編. 蕭紅作《生死場》序，魯迅序跋集（下卷）[M]，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那極其經典的評價：“生的堅強和死的掙紮”。這顯然是對書名別具深意的開掘與闡釋，在不到千字的小文裡，重複多次。¹

魯迅為《生死場》校對後將校稿輾轉寄給蕭紅，蕭紅還曾把校稿作為重要紀念保存，直到1937年去北平遇到舒群才贈出，亦可從此篇序跋的誕生推測二人交往甚是投機。《蕭紅作〈生死場〉序》，便是魯迅、胡風與蕭紅友情的珍貴證明，成為被後人廣泛引用的重要參考文獻。從引文中不難發現，論文作者並未完全因循序文原文“生的堅強和死的掙紮”²오류! 참조 원본을 찾을 수 없습니다.”簡單作結，而是聯合胡風的另一篇生死場跋文《〈生死場〉讀後記》共同引用，為魯迅對蕭紅作品的籠統評價扣了一個更精確的帽子——這種生與死交織的掙紮，正是對更名後的小說標題《生死場》的涵義開掘，魯迅顯然對這個蕭紅更改過的標題非常滿意，以至在序文中反復推敲。這句評語不僅成為蕭紅與《生死場》被捧上文學史神壇的最經典評述，更是魯迅與蕭紅、以及更名提議者胡風三人志同道合、默契匪淺的證明。

除卻他序跋本身所能帶來的“序跋作者與正文本作者之間的人際關係”這一身份資訊，序文文字內容對作品的評價同樣非常重要。《蕭紅作〈生死場〉序》中，魯迅並未開宗明義，直接向讀者介紹《生死場》中的主人公、人物情節與故事結局，而是以一種模糊的環境渲染描述了自己閱讀作品之後的感情：“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這暗示了魯迅在通讀過《生死場》後心境的沉寂的震撼，在不劇透故事走向的同時，在讀者心中埋下好奇的種子。在後人關於《生死場》的撰寫中，也時常引用序文中的片段，結合魯迅閱讀小說的心境推測蕭紅想要傳達的思想感情。

朱燕頤《哈爾濱左傾報刊對蕭紅創作的影響——以〈大同報〉兩份文藝副刊為例》（2020）中，便引用魯迅這篇他序原文，探討蕭紅作品《生死場》的文學史評價：

¹葉君，郎春豔。從“悄吟太太的稿子”到蕭紅的《生死場》——關於《生死場》的成書過程[J]，魯迅研究月刊，2020（3）：55-60。

²劉運峰編。蕭紅作《生死場》序，魯迅序跋集（下卷）[M]，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蕭紅的創作大多選擇弱者視角:老人、母親、孩子,但她堅韌和頑強的性格內核在創作中體現得很明顯令人感受到這些底層弱者頑強掙紮著求生的欲望。所以蕭紅在前往上海之前完成的《生死場》才會被魯迅評價為“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紮的力氣”。¹오류! 참조 원본을 찾을 수 없습니다.

“堅強和掙紮的力氣”之言，便是《蕭紅作〈生死場〉序》中的末句。結合《生死場》正文分析，作者認為，小說選擇以弱者人物的視角仰望時代，無論是同處於一片戰火之下的當時還是複歸和平年代的後人，都能引起廣泛讀者的強烈共鳴，為同類的頑強生存、掙紮赴死的共情，並以此引導現實的生者努力生存，從這慘澹的現實中多出一份掙紮的力氣來。這不僅是蕭紅寫就《生死場》的主旨，更是魯迅為之撰序的心念。在序文前言看似慢條斯理以大篇幅詳細介紹在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對此書手稿封殺阻攔的行徑，實則以此暗示此書內容之深刻、意義之重大，也難怪夏志清坦言自己未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評論蕭紅的作品，是“最不可寬恕的疏忽²”。

魯迅不僅作為《蕭紅作〈生死場〉序》的序跋作者，他自身特殊的文壇地位，使得他留下的筆墨中無處不包含對現代文學史的洞悉。這就導致《蕭紅作〈生死場〉序》中不單包含魯迅對小說自身的感歎與推薦，更具有更深遠的現代文學史指導意義。在後人的學術研究中與文學史教材撰寫中，學者們也傾向於將《蕭紅作〈生死場〉序》與魯迅撰寫過的其他文字聯繫起來，推導出更加宏觀的文學史結論。

例如，吳丹鴻《“過去的生命”與“大時代”的血——從三則題辭看魯迅轉折期“犧牲”觀念的變化》（2019）中，引用《蕭紅作〈生死場〉序》原文，便不僅僅是分析小說自身，而是判斷中國所處時代背景，闡釋現代作家應當把控好的“文藝與民眾的關係”：

到這裡,魯迅不僅賦予了“過去的生命”以大時代的預示性意義,確認了“文藝”對於民眾和社會應當造成的“不舒服”的作用,更確認了

¹朱燕頤. 哈爾濱左傾報刊對蕭紅創作的影響——以《大同報》兩份文藝副刊為例[J], 魯迅研究月刊, 2022(4):84-91.

²夏志清. 中國現代小說史[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5.

自己在這個“生或死”的沒有別種可能的時代中，除了“從文藝推出人生”之外別無選擇。¹

這裡的“不舒服”，並非指審美體驗的劣等，而是指揭露殘酷社會現狀所帶給讀者的“揭露瘡疤”的生理不適。《生死場》的背景是抗日戰爭爆發的關東前夜，對於入侵或是抗爭，大部分農村平民百姓毫無還手之力，活下去已是艱難，死狀更是潦草。蕭紅將這種身負重壓的苦楚揭露給人看，不僅是一家的突發奇想，更是整個三十年代作家群體的呼聲：若是這瘡疤的揭露仍能令清醒的人感到痛苦，那麼中國人也絕非喪失了抗爭的希望，作家們也仍可期許一個“守得雲開見月明”的明天。魯迅在《蕭紅作〈生死場〉序》中，並未明顯提及《生死場》的文藝立場，更不涉及談論《生死場》具有“文藝戰鬥性”的思考。很顯然，將《生死場》上升至文藝理論層面，是論文作者自己的全新推導。事實上，這種推導並非空穴來風，要分析《蕭紅作〈生死場〉序》被後人學者引用頻率之高的原因，還要回歸《生死場》一夜成名的當時，深追魯迅這篇序跋是如何帶領《生死場》一步步走入文學史，實現作品經典化的。

作為最早也是最為經典的評價，《蕭紅作〈生死場〉序》的隨書出版，在魯迅這個響亮名號的推動下，快速奠定了蕭紅在文學史上被視為“抗日作家”的初始地位。說是抗日，雖說序文中沒有直接提及此詞，但小說的背景與同年蕭軍出版的《八月的鄉村》一道，被魯迅以另一個相近的短語代替：“關於東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說²오류! 참조 원본을 찾을 수 없습니다.”。這一年是1935年，距離全民抗戰的1937年距離不遠，因與歷史幾乎同步的進程，《生死場》與《八月的鄉村》，一個講述“野生的奮起”，一個講述頑強的革命遊擊隊，雙雙成為全民抗戰的先聲，而備受讚譽。其中代表性的聲音當屬周揚，於1936年撰文評價《生死場》道：“我們第一次在藝術作品中看出了東北民眾抗戰英雄的光景、人民的力量、‘理智的戰術’³。”這賦予了《生死場》超越文學價值自身的政治性。在《蕭紅作〈生死場〉序》中，魯迅也曾大量筆墨談論《生死場》被在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再三封禁一事，看似無意，實則暗中向讀者強調此書作為一部歷史文本，具有超越

¹ 吳丹鴻，“過去的生命”與“大時代”的血——從三則題辭看魯迅轉折期“犧牲”觀念的變化[J]，魯迅研究月刊，2019(4):86-93.

² 劉運峰編，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魯迅序跋集（下卷）[M]，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³ 朱立元，海上文學百家文庫 91：周揚、成仿吾、李初梨、彭康、朱鏡我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故事情節的戰鬥性，以至於躲過審核如此不易，小說地位因與大方向同頻而再度拔高。“現在需要的是鬥爭的文學”，魯迅在書信中對《生死場》的定性，結合他的序文，共同《生死場》其賦予了左翼文學作品的標準特徵，這也成為了蕭紅最早被文學史分類為“左翼文學作家”的依據之一。隨著這些頭銜的加持，《生死場》一步步走入文學史中不再被輕易剔除，成為夏志清因整合《中國現代小說史》時漏掉此篇而追悔莫及的劃時代名作。

歸根結底，《蕭紅作〈生死場〉序》作為一篇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由魯迅親手寫就的他序，內容豐富，信息量極大，下至《生死場》自身的出版考據、藝術手法評析、蕭紅本人的創作思想轉變，上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作家群體從“啟蒙俯視”到“對話平視”的思潮轉變，繼而談論現代文學史在三十年代發生的大方向轉型，《蕭紅作〈生死場〉序》都能成為被時時引用的重要發言。

再以《〈窮人〉小引》為例，該文初發表於1926年6月14日《語絲》週刊，是魯迅為韋叢蕪所譯《窮人》而作，全文2019字。與普通的譯序跋不同，《窮人》的譯者並非魯迅，這意味著在本次文學傳播的過程中，魯迅與作者的直接溝通被切斷了——在作者、譯作者與讀者的三重互動之外，魯迅作為序跋作者的“第四者”加入《窮人》的文學闡釋活動，這也意味著，《〈窮人〉小引》在被學者引用闡釋文學理論時，針對譯文本論述的權威性將進一步降低；但當話題衍生至魯迅本人的寫作技巧與創作風格時，《〈窮人〉小引》又重新獲得了它的生命力。

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窮人》的篇首譯文序跋，《〈窮人〉小引》中不乏大量對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創作思路以及寫作風格的科普。在魯迅的序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即我是將人的靈魂的深，顯示於人的¹”，又在談其人物塑造時，認為他擅長將筆下的人物給予“精神的苦刑”，“駭人的卑汙的狀態上，表示出人們的心來²”。作為原作者的評價與《窮人》小說解讀，這些都應成為學者重要的引文依據。但是，在魯迅相關研究中，針對魯迅為《窮人》作序的研究方面，少有針對《窮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的引文論述。

為證明《〈窮人〉小引》在成為引文時存在魯迅譯《窮人》相關研究引用缺失，將《魯迅研究月刊》2018-2022五年刊載論文中引用魯迅序跋的條目進行整

¹ 魯迅.《窮人》小引,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² 魯迅.《窮人》小引,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合統計，得到資料1075條；篩選其中《〈窮人〉小引》的部分，得到引文資料3條，如下圖所示：

序 號	論文題目	引文 總數	引用魯迅序跋 篇目
1	再論“頹敗線的顫動”及其他	23	集外集·《窮人》小引
2	周樹人的文藝運動與日本明治時期俄羅斯文學譯介之關係考	67	集外集·《窮人》小引
3	《幸福的家庭》：“顯示出靈魂的深”	21	集外集·《窮人》小引

圖 1.1 篩選後的《〈窮人〉小引》引用頻數示意圖

依據引文資料查詢3篇論文中《〈窮人〉小引》的具體引用目的：郅元寶《再論“頹敗線的顫動”及其他》中，引用“天才的心誠然是博大的”以闡釋魯迅在《野草》中自覺吸收西方優秀文化遺產所提升的更高精神意境。張宇飛《周樹人的文藝運動與日本明治時期俄羅斯文學譯介之關係考》中，考據了魯迅對《窮人》的部分觀點化用了日裔俄國文學研究者昇曙夢的《俄羅斯文學研究》。而喬世華《〈幸福的家庭〉：“顯示出靈魂的深”》中，作者在論文末尾讚美了魯迅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與魯迅在《〈窮人〉小引》中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語一致。

在《中國現代文學30年》《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新文學史稿》三本文學史教材中，可供查閱的《〈窮人〉小引》引文僅有4條。這四條引文的引用也主要集中於魯迅“畫眼睛”的人物塑造技巧、借鑒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寫實主義的創作風格、以及魯迅小說的普遍創作目的：“和讀者一起正視人性卑汙¹”。

可以發現，這些引文基本圍繞魯迅自身的文學特徵與文學評價展開，而對《窮人》小說本身的細節解讀並無太多涉及。而中國知網中搜索涉及《窮人》文本研究的期刊論文，則能發現引文多直接來源於王加興《俄羅斯文學修辭特色研究》（2004）或王立業《俄羅斯文學名著賞析》（2015）等權威教材，而其中提出的

¹ 魯迅.《窮人》小引, 魯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觀點也較少來源於魯迅的這篇序文。可見在《窮人》的文學研究中，《〈窮人〉小引》的話語權較低，這或許與魯迅單一的批評者身份有關。魯迅並非《窮人》的直接譯者，僅作為較早將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薦入中國的評論家而存在，而類似的科普發言，後人學者在對俄國文學進行更詳細的分析研究後，也不再依賴於最早的魯迅一家之言。這意味著後者發揮的優勢區間依然集中於魯迅研究自身，魯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諸多評價，都在“魯迅自覺吸收現實主義作家的創作精髓”這層論證後被學者應用於魯迅本人，用於解讀魯迅自身以殘忍塑造人物以體現人性卑汙的寫作手法，延伸為與俄國一脈相承的寫實主義創作風格。

綜上所述，無論是魯迅針對國內新銳作家而作的《蕭紅作〈生死場〉序》，還是魯迅為自覺引進俄國優秀小說作品而作的《〈窮人〉小引》，具有共同的引文特徵：雖然序文自身在當時對正文本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宣傳作用，對外將陌生作家引入大眾視野，對內將不知名作品送入現代文學史殿堂；但在後人的學術研究引文中，他序跋在引用以論述正文本作家作品時，直接引用以作為文學史結論的頻率很低，學者更傾向於綜合多篇文獻引用以共同推導出新的文學史結論；引用目的方面，使用引文以闡述魯迅自身文學特徵依然是他序跋引文的主要內容。

二、魯迅序跋中的自我言說

與他序跋不同，自序跋天然地具有一大優勢：序跋作者與正文本作者的重合。這意味著，自序跋的撰寫不再出現序跋作者與正文本作者的理解鴻溝，本來在正文本作品完成之後“已死”的作者，在自序跋中重又“復活”，在讀者面前現身說法，詳細討論本篇作品中自己的創作構思、人物原型、主旨心聲等。作品幕後本是作者一個人的寫作，具有一定私密性。論及作品緣起，本可千人千言，就算是他序跋篇首率先提出猜測，那也是一千個讀者中的“一千個哈姆雷特”之一；可一旦正文本作者本人在序跋中發聲，那便是一錘定音，又有誰比作者本人更清楚作者創作作品時的心路歷程？極少再有讀者敢於提出與之相悖的觀點。這便是自序跋與他序跋截然相反的，特殊的“作者權威性”。

綜合四本高校常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魯迅序跋引文分類比例具體如下圖所示：四本文學史教材中，自序跋引文總數為62篇，占序跋引文總數的46.27%；他序跋

占比72篇，占序跋引文總數的53.73%。自序跋的引用資料遠遠高於序跋創作比中，自序跋篇目占比的13.94%。

教材名	作 家總引 文數	魯迅 序跋引文 數	魯迅 自序跋引 文數	魯迅 他序跋引 文數	魯迅 自序跋占 比	魯迅 他序跋占 比
錢理群、溫 儒敏、吳福輝《中 國現代文學三十 年》	166	33	14	19	42.42 %	57.5 8%
王瑤《中國 新文學史稿》	592	57	28	29	49.12 %	50.8 8%
嚴家炎《中 國現代小說流派 史》	284	6	3	3	50.00 %	50.0 0%
唐弢主編 《中國現代文學 史簡編》	215	38	17	21	44.74 %	55.2 6%
總計	1257	268	62	72	46.27 %	53.7 3%

圖 2.1 文學史中的魯迅序跋分類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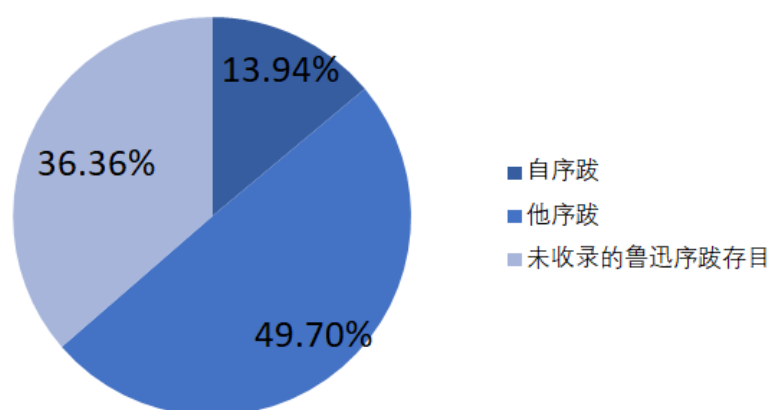


圖 2.2 魯迅序跋占比統計圖

顯然，統計從資料層面，為我們進一步佐證了學者對他序跋與自序跋引用的信任差異：自序跋創作篇目少，字數少，但直接引用頻次高；具體到各本教材中，自序跋引文占比均未低於42%，接近總序跋引文半數；他序跋創作篇目多，字數多，直接引用頻次雖然也都過了半數，但相對於他序跋創作的總體體量而言依然較低，且大部分都未被直接引用作為定論，而是結合其他文獻引文聯合得出新的推論。讀者對魯迅序跋不同類別接受的差異，有了更為準確的數字依據。

以《〈自選集〉自序》為例，該序文共1334字，最早印入《魯迅自選集》中，由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3月首次出版。與《吶喊》相似，這是一部小說、散文、散文詩的集冊序言，共22篇，出版後大受讀者歡迎，此後8年共印行7次，4次遭到國民黨當局查禁，可見《自選集》與《〈自選集〉自序》在當時的影響力。在後人學者的研究論文中，《〈自選集〉自序》依然在文學史佔據重要地位，無論對魯迅本人的文學創作特徵，還是魯迅對新文學種種的性質定義，亦或是魯迅對文學革命時期動盪時局的整體評估，教材中可見大量直接引用自序引文用作文學史結論的典型案例。

作為新文化運動時期具有相當名氣的文學評論家，魯迅在當時就有著整合、定義新文學的自覺。知名度較廣的，如後來成為現代文學史專有名詞的“鄉土文學”，最早便出自《〈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在《〈自選集〉自序》中，同樣存在類似的直接定義，結合日後該名詞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接受程度，學者很容易直接引用《〈自選集〉自序》，作為該名詞的權威注腳。

《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針對魯迅《故事新編》中幾部歷史小說給予了以下解釋：

1930年代魯迅寫了《非攻》《理水》《采薇》《出關》《起死》等“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性質的小說，這幾篇歷史小說與寫於1920年代的《補天》《奔月》《鑄劍》等同類作品，後來一併收入《故事新編》中。¹

¹朱棟霖，吳義勤，朱曉進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1915-2016（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針對新文學浪潮中出現的《非攻》等幾部化身歷史原典、但又有時代新見的小說作品，魯迅對此的定義是神話傳說與史實演繹，這段直接引用出處正是《〈自選集〉自序》。有了自序的簡潔定義，文學史教材自然不再有額外的單獨概括，可見《〈自選集〉自序》提供的眾名詞在相當程度上方便了學者對現代文學史的直接引用論述。

除此之外相似的定義片段可見於《中國新文學史稿》第5頁：

所以“新文學”一詞中“新”字的最準確的解釋，就在於文學與人民革命的密切聯繫。魯迅說他在《新青年》上的小說“確可以算作當時的‘革命文學’”。總的看來，“五四”革命文學傳統的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對文學如何更好地為人民革命服務這一光榮使命的不斷努力和追求。¹

王瑤在這裡對“新文學”下的定義，依據正是《〈自選集〉自序》中魯迅對自己所作小說的革命性評價。與此同時，魯迅的小說將新文學與“五四”革命文學傳統結合起來，用以闡釋當時文學與人民革命的密切聯繫，在此段論述中，自序的作家自我言說無疑起到了重要的闡釋作用，以板上釘釘的直接引用作為文學史定論，大大增強了文學史教材論述的權威性與可信度。

而魯迅對《吶喊》的自我評述，也證明了其文字中徹底的、不妥協的戰鬥性。《中國新文學史稿》第98頁中，針對此論點引用了《〈自選集〉自序》中的整段長句，並出現了直接引用作結論的標誌性的開頭短語“誠如魯迅自己所說的”：

這些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的作品，充滿了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戰鬥熱情。誠如魯迅自己所說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²

魯迅自述自己寫小說時自覺與時代潮流步調保持一致，而寫革命小說時既是“遵命文學”，也是“自願文學”的：

¹王瑤. 中國新文學史稿[M],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2.

²王瑤. 中國新文學史稿[M],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2.

他後來把自己的這些作品稱之為“遵命文學”，並且說“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所願意遵奉的命令，絕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可見魯迅從開始創作，他的自覺地使文學為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的目的就是十分明確的。¹

在這裡，《〈自選集〉自序》中的原文被直接引作魯迅憑自我意志創作小說的證詞，雖有潮流引導，但自願的成分仍占寫作衝動的主要部分。事實上，凡是涉及魯迅小說創作緣起、魯迅《吶喊》《彷徨》創作前後心境變化等話題，《〈自選集〉自序》總在論述中佔有一席之地，由此可以一窺這篇自序跋中魯迅自述被文學史教材廣泛引用的頻率與權威地位。

綜上所述，以《〈吶喊〉自序》和《〈自選集〉自序》為例，無論在期刊文獻還是權威文學史教材中，學者對自序跋引文的信任程度都是很高的。從統計數字上看，自序跋引用頻數雖不及他序跋，但考慮到他序跋創作篇幅的占比，我們仍能得出學者更傾向於引用自序跋進入學術論文與文學史教材的結論；引文目的上，比起他序跋引文中的質疑、考據與綜合多篇文獻引用，自序跋的引文往往單獨出現、一錘定音，直接以“正如魯迅所言”“誠如本人所說的”的格式直接進入文學史，甚至摘錄原文作為凝練的文學史結論。

三、雙重身份：魯迅綜合類序跋引文

在常規的他序跋與自序跋之外，有一類特殊的序跋：綜合類序跋。這種類型常見於總集類文學收錄，如《新文學大系》《中國現代小說史》等，篇幅較長，同時收錄了包括序跋作者在內的多篇作家作品，而序跋作者在其中總結概括全書，也不免在評議他人與自述得失間反復切換“裁判”與“選手”兩重身份。這就使得上文提到的引文信任問題，在綜合類序跋引用領域具有額外的複雜性：一般說來，學者更傾向於相信自序跋中作家自我言說的文字，而對他序跋中序跋作者的推測持有懷疑態度；而綜合類序跋面前，由於所有作品集結為史，需要在文學史中找到自己最精准的定位，這類序跋引文應以客觀性為上，越是序跋作者（即總集主編），作為學界公認的領域精英，其對他人的文學評價更客觀，其批評文字

¹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越容易被學者奉為權威；而他們對自己作品的評價，則容易受自謙意識或其他個人情緒影響有失偏頗，更容易作為聯合引用的一環，由學者結合其他引文做出修正性的新結論。在這裡，自序跋不再是“自序跋”，而是他序跋中的“自我言說部分”，序跋作者在面對自己作品時所流露出的個人情緒，反而降低了這部分引文被直接作為文學史結論蓋棺論定的可能。這也與精英批評理論中“虛假的自我評述”重合。

我們將以《〈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等為例，詳細闡釋這種闡釋的複雜性。如果說，自序《〈吶喊〉自序》中浸透魯迅作家視角自述的主觀，他序《蕭紅作〈生死場〉序》中充斥著第二者審視作品的旁觀視角，那麼《〈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作為自序與他序的綜合，便是主客觀相統一的文學史性質導讀大綱。序文全篇共一萬四百餘字，魯迅帶著編撰文學史的史學家意識，用詞落墨之仔細、印證考據之嚴謹，都超越了魯迅以往任何一篇序跋，因而更具有代表性。

倘若說自序跋作為“作家自我言說的一手史料”，其闡釋內容與解讀方向集中於魯迅本人與魯迅作品本身，那麼與之對應的他序跋則補全了魯迅對身邊親友乃至外在世界的獨特看法——經由自己之口創作而成。在魯迅一生三百餘篇的創作序跋中，不乏大量為他人寫就、描述他人的評述性文字，經由魯迅在當時及後世的影響力，為所有關注這些作家、研究作家的學者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感情基調，並為後人代代相傳，流為經典。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對同時代文人文字的集中闡釋。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魯迅除了對自己小說創作的自評“表現的深切”與“格式的特別”為人熟知，被後人書寫廣泛接受採用，“問題小說”、“鄉土文學”、“‘自敘傳’抒情小說”、更廣泛的知名度不高的文學團體、對同時代其他作家的概括性評價，更是成為現當代文學界針對這些學者研究中不可繞過的重量級定性評述。

如《〈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被魯迅評述定性過的作家，如歸入“鄉土文學”流派的臺靜農、蹇先艾，以寫個人心路著稱的廬隱、馮沅君等，魯迅在一一分析眾作家文學特徵之後，有著主動歸納聚合的意識，使得類似“鄉土文學”的定義開始被提出：

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之方面來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

僑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卻不是這作者所寫的文章……在還未開手來寫鄉土文學之前，他卻已被故鄉所放逐，生活驅逐他到異地去了，他只好回憶‘父親的花園’，而且是不存在的花園。¹

而這便為早期現代文學史的構築與書寫打下基礎。以魯迅作為先導，五四時期文學流派劃分、影響力評估等一系列工作有條不紊的展開。臺靜農作為出色的鄉土小說作家，其出版小說少而精，本身在當時與後世學術研究中並未留下聲勢格外浩大的史料風潮。在有限的資料獲取中，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這樣一部著名作家學者參與、知名度很高的新文學運動寶貴遺產，中國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的理論作品精選集，在開篇序言中對臺靜農文字的公開定性，其影響力是近乎壟斷性的。他提到：

（臺靜農的作品）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的了。²

《地之子》中小說共14篇，且都為短篇，讀過之後魯迅之於作者本人的述評仍在耳畔，後人再來定義“鄉土文學”時，便因繞不開魯迅之評而忘不掉《地之子》的存在，臺靜農之於鄉土文學，乃至之於現代文學史的地位由此鞏固。

類似的其他個體學者評述數不勝數。如魯迅對淦女士（馮沅君）的評價中，滲透了對所在文學團體“創造社”的整體風格評價：

文學團體不是豆莢，包含在裡面的，始終都是豆。³

作為女性小說家，在當時新舊交替的時代浪潮中緊緊咬住新文學先聲而加入，剖析青年女性主人公內心的隱秘心境，無論是文字的細膩表達、抒情的濃烈感性、主題上反抗封建家庭的銳利鋒芒，馮沅君都是具有相當勇氣的。而魯迅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基於了中肯的評價：

¹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²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³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馮沅君的文字）這一段，實在是‘五四’運動之後，將毅然和傳統戰鬥，而又不肯毅然和傳統戰鬥，遂不得不復活其‘纏綿緋惻之情’的青年們的真實的寫照。¹

她的風格與鬱達夫相似卻不同，抒情濃烈但心境純潔莊重，未有《沉淪》式抑鬱頹喪的絕望質感，這也是魯迅認為其與創造社、鬱達夫不構成承傳關係的“豆莢理論”來源，而相關的引文也同樣通過他序跋，特別是如此有影響力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中的他序跋將這種論斷保留下來，近乎所有學者在拜讀這部“中國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的理論作品精選集”前都要看過的引文評述，而伴隨著這部分具有“五四性質”的女性文學的保留，魯迅他序跋也就這樣潛移默化地進入文學界的現代文學構築之中，如同釘上畫框的釘子，躋身於眾多意義非凡的文學名篇之列。

3.1.2 他序跋中的自我言說：魯迅小說地位及外延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畢竟出自魯迅之手，在不遺餘力分門別類介紹現代作家之餘，序文的字裡行間時常宕開一筆，與自己的小說散文相映照。這其中較為頻繁引用的典型，當論《吶喊》中的幾篇。朱棟霖、吳義勤、朱曉進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1915-2016》中，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專章的篇首第一句便引用了此序：

自1918年開始，魯迅在《新青年》上陸續發表《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作品，“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²

此句開宗明義，迅速將讀者引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五四風雲文壇，以魯迅親口直言為三篇短篇小說定性，文學革命自此拉開帷幕。隨後的《新潮》雜誌彙聚其一批以葉紹鈞、俞平伯為代表的青年作家，並被後人命名為“新潮作家群”的，也是文學革命大旗揚起後的後生回應。教材如此開篇，並引出後文的專章介紹，對文學革命具體有何實績不再贅述論證，顯然是默認了魯迅親口定義的權威

¹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² 朱棟霖，吳義勤，朱曉進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1915-2016（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性。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同樣在魯迅專章的小標題開頭首句直接引用此序原文，直言魯迅創作對新文學的貢獻：

魯迅曾談到自己對新文學的貢獻，主要是以創作成就“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這是確實的：在有了胡適、陳獨秀、周作人等的理論宣導之後，又有了魯迅這樣的作家創造了足以與中國傳統文學及世界文學的經典作品並肩而立的現代文學經典，新文學才有可能在中國真正立足、紮根。¹

然而，魯迅的引文不僅被直接引用，代替後人學者得出結論，經常也作為一手史料依據與其他文獻資料相結合，被合理推導出更深入、更廣泛的結論。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重版代序中，作為全書提綱挈領的導讀，便在談及五四革命現實主義傳統時引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如下：

關於“文學革命”的許多進步的主張和論點，歸根到底必須在創作上得到體現，才能發揮它為人民革命服務的社會作用，因此魯迅把他的《狂人日記》等最初發表的小說，看作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其實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切進步的創作成果都屬於“新文學”的實績。²

與《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不同，《中國新文學史稿》在言明魯迅早期白話小說對文學革命的成果展現確有其事之外，多加了自己的論斷。首先，教材為魯迅小說擁有展現文學革命成果一事補充了前因，因為五四時期的文學是“革命的文學”，生於除舊立新的年代，就必然導致文學與生活、與社會的緊密聯繫；因此，在這些以魯迅為代表的有識之士筆下，無論小說還是散文，必然要與現實風起雲湧的人民革命現狀相關聯。其次，在引出《狂人日記》等作為文學革命的成果後，教材更進一步，將成果的範圍擴大至整個現代文學史的先進創作作品，對文學史的概括和總結更有深度，魯迅序文的引用又使其不流於空談。

精英批評並非居高臨下的，而是為普通大眾讀者挖掘文本深層的力量與價值。以《〈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為代表的綜合類序跋引文中，學者的引用

¹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² 王瑤. 中國新文學史稿[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傾向呈現出與他序跋、自序跋都不完全相同的複雜性：綜合類序跋引文中，涉及到他人作家作品評論的方面，出於序跋作者編撰《新文學大系》的自覺性，魯迅自會在本人大量研讀相關作家作品的基礎上基於公正評判。此時，魯迅與研究學者站在同一立場，因魯迅是文學革命時期的當事人，《新文學大系》的責任主編，甚至與其中多位作家互通信件，甚至有過直接接觸，魯迅對他們的作品往往更具有發言權，對新文學得失的認知見解也更具有權威性，故而被大量直接引用作為文學史結論而被寫入教材之中；而在涉及到魯迅自我言說的方面，在文學史編撰這種莊重的嚴肅場合，魯迅本人往往易因自謙而模糊其意，其對自作作品的剖析與解讀，反而不如平日隨意作序書信時那般自由真切。因此，學者更傾向於將這部分序文引文聯合其他引文共同印證魯迅本人對新文學的貢獻，而這個推導而出的結論重量，往往大於魯迅自我評價的一家之言。這意味著在研讀魯迅序跋中，對序跋提前進行類別與寫作立場的劃分，還是十分有必要的。

自序跋與他序跋，以正文本作者是否與序跋作者相同為劃分依據，具有不同路徑的闡釋意義：自序跋中，序跋作者享有與正文本作者一致的最高解釋權，對外撰寫序跋則擺脫了隱於幕後的“作者已死”原則，回到臺前親口講述創作作品時的心路歷程，包括作品緣起、人物原型、思想主旨與時事影射等等。他序跋中，由於序跋作者與正文本作者的理解隔閡，使得他序跋對作品的解讀可信度降低，作為普通讀物可以被大眾借鑒為導讀參考，但不適用於學術研究。涉及到作品之外的文學史概括或作家交往情況、文學史評價等內容時，他序跋依然具有相當的參考意義。特別是在正文本作家不出名時，一篇成功的他序跋推動正文本在國內外大火，乃至進入文學史殿堂，這都將成為該作品傳播史研究的重要一環。而在自序跋與普通他序跋之外，兼有雙方特徵的綜合類序跋中，既有序跋作家對自己作品的評述，又同時有對同時代其他作家作品的品評，在參賽者與裁判的雙重身份轉換中，這種傳播路徑的分異則更加明顯。而當學者引用不止一篇序跋引文論證同一觀點時，序跋與序跋間的觀點碰撞，以及學者最後傾向於採用的結論，也能體現自序跋遠高於他序跋的引用傾向，這種信任程度由統計資料加以佐證，更顯其嚴謹性。以上結論是在序跋文本內容分析之外，以對序跋本身進行細化分類的形式，從闡釋學角度展示出不同傳播路徑下魯迅序跋在讀者群體中的傳播影響。隨著大資料的普及與軟體技術的反覆運算升級，在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科技化浪潮之下，“數字人文”的呼聲越來越高。對魯迅序跋進行多維度數據分析，有

助於將隱藏於文本內容之下的更多規律性特徵展示出來，這也對魯迅序跋文本的資料庫建設提出更為急迫的要求。資料資源的整合與共用，資料庫網站的反覆運算與維護，以及如何讓魯迅序跋文本在數位時代“活起來”的策劃新見，在未來的魯學研究發展過程中，可被認為是值得期待的一大亮點。

（本文為遼寧省社科規劃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現代作家‘自序跋’整理與研究”（L22AZW002）的階段成果）

參考文獻

- [1]劉運峰編.蕭紅作《生死場》序，魯迅序跋集（下卷）[M],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 [2]葉君,郎春豔.從“悄吟太太的稿子”到蕭紅的《生死場》——關於《生死場》的成書過程[J],魯迅研究月刊,2020(3):55-60.
- [3]朱燕頤.哈爾濱左傾報刊對蕭紅創作的影響——以《大同報》兩份文藝副刊為例[J],魯迅研究月刊,2022(4):84-91.
- [4]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 [5]吳丹鴻.“過去的生命”與“大時代”的血——從三則題辭看魯迅轉折期“犧牲”觀念的變化[J],魯迅研究月刊,2019(4):86-93.
- [6]劉運峰編.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魯迅序跋集（下卷）[M],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 [7]朱立元.海上文學百家文庫：周揚、成仿吾、李初梨、彭康、朱鏡我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 [8]魯迅.《窮人》小引,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 [9]朱棟霖,吳義勤,朱曉進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1915-2016（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 [10]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 [11]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 [12]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A Study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Lu Xun'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ation Studies

WANG Yuchun LIU Jiaqi

(Faculty of Humanit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Abstract: The study of Lu Xun'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should return to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of the writer to avoid the fallacy of over-interpretation by future generations. In addition to textual analyses, interpretive reading of Lu Xun'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as a new entry point for the study of Lu Xun'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is the main subject of a comparative study, which can explain the different principles of its dissemination: in the case of Lu Xun'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for others, the author of the preface and postscript intervenes in the literary work as a "critic" and guides the readers to interpret the text from the third-party position; in the case of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for himself, the author of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akes on the role of the author of the main text, and the reader is led to interpret it. In the self-preface, the author of the prefaces comes down to dialogue with the readers as the author of the text and guides the readers in an authoritative capacity so that the self-preface has a higher credibility of the citation. The author of the prefaces holds the above two kinds of writing in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itation ratio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itation credibility of the self-preface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refaces for others in his prefaces for others, the comprehensive preface, which consciously plays a role of integrating and summing up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has become the main citation target of his prefaces for others as well. Relevant research should return to the writer's literary history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void the fallacy of overinterpretation.

Keywords: Lu Xun; Preface; Paratext; Value of Preface; Hermeneutics

探尋魯迅筆下女性的覺醒歷程-以小說《明天》《離婚》 《傷逝》為例

劉靚靚¹

(韓國國立全南大學 東亞學研究所 59626)

摘要：在中國，女性解放一直都是社會關注與深思的重要問題。新文化運動後，關注女性的權益，呼喚男女平等便成為了新的社會思潮。魯迅作為站在中國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鋒，一直致力於文學救國。他試圖用文字來喚醒麻木的中國人，喚起人們對自由平等和個人權利的追求。同時，他自始至終都十分關注女性的命運。他通過作品向世人展示了當時中國女性的遭遇，揭開了封建綱常禮教下女性的悲慘遭遇和鮮血淋漓的真相。並且他也試圖通過其文學創作為女性的解放尋找一條正確而光明的道路，希望能夠促使女性意識的覺醒。他的短篇小說《明天》、《離婚》、《傷逝》中的三位女性主人公便很好的向世人們展現了中國近代女性思想意識由麻木順從到開始覺醒，最終走向反抗的變化歷程。本研究將視角聚焦於這三位女性主人公形象，通過對魯迅筆下女性形象的思想變化歷程的探究，進而思考魯迅對女性解放問題的觀點的變化歷程。

關鍵字：魯迅小說，魯迅思想，女性形象，意識覺醒

¹ 유정정(劉靚靚) 韓國國立全南大學，東亞學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 한국어 교육학, 한국어 언어학, 동아시아 문학。

一、緒論

在近代中國漫長的反帝反封建歷程之中，追求自由平等，實現女性解放一直都是值得社會關注與深思的重要內容。自古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思想深深紮根於人民的思想中，這也讓女性的人權始終受到壓迫，人格被隨意踐踏，自我意識早已被磨滅。直到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展開使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愚昧思想遇到了挑戰，中國的女性也慢慢踏上了鬥爭與覺醒之路。

在新文化運動之後，新思想的衝擊使人們開始關注女性權益。魯迅作為站在中國近代思想解放的最前線的先鋒，一直致力於文學救國。他試圖用文字來喚醒麻木的中國人，喚起人們對自由平等和個人權利的追求。在那個“世人皆醉我獨醒”的年代，魯迅意識到拯救愚昧的國民意識才是第一要務，而最好的手段就是文學。¹為了對國民的劣根性進行改造，魯迅接受了啟蒙主義思想的影響。雖然五四運動之後，魯迅在啟蒙思想上產生了嬗變，但是他自始至終都十分關注女性的解放和女性的命運。通過筆觸，他向世人展示了當時中國女性的境遇，揭開了吃人的封建綱常禮教下女性的悲慘遭遇。他也試圖通過其文學創作為女性的解放尋找一條正確而光明的道路，希望能夠促使女性意識的覺醒。也可以說，魯迅先生為中國近代女性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為了更清晰地體會女性意識的覺醒，本研究將聚焦於中國近代女性的命運，通過對魯迅作品《明天》、《離婚》、《傷逝》中三位看似相同，時則不同的女性形象進行整理分析，感受三者的悲慘命運以及造成悲劇的原因。從她們的順從與反抗來進一步體會魯迅筆下中國近代女性意識的覺醒歷程，從而體會魯迅思想中對於女性觀念的變化。

從目前現有的有關魯迅小說中女性形象研究來看，中國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都相對比較豐富，並且現存的研究大多為魯迅小說女性形象對比研究。韓國在關於魯迅小說中女性形象研究相對較少，現存研究主要集中於女性人物性格分析研究。在對比研究方面，目前中國現有研究大概分為兩個方向，一是魯迅筆下的女性形象與其他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進行對比研究，進而探究魯迅筆下的女性與其他作家筆下女性的異同。二是將魯迅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進行對比研究，通過女性角色不同的命運探究那一時代的婦女解放歷程，進而思考現代婦女解放之路。本研究將延續第二個方向繼續進行拓展研究，雖然對這一方向進行研究的學

¹ 嚴英旭，魯迅文學散策[M]，글빛문화원, 2022, p75

者不在少數，但是大部分學者的視角都聚焦於那一時期的女性解放問題，通過那一時期的婦女解放來進一步思考現代婦女解放之路。而少有學者將視線聚焦於魯迅思想中女性觀的變化與進步歷程。因此本研究將把研究視角集中於魯迅女性觀的變化與進步歷程，通過對比對魯迅作品《明天》、《離婚》、《傷逝》中的女性形象的順從和反抗歷程進行分析，從而感受魯迅思想中女性觀的變化。

首先我們先來探究一下自近代以來，中國女性的價值和思想是如何發展變化的。自近代以來，社會中女性思想的嬗變一直都是值得聚焦的話題。自1898年至1923年，有關於女性的價值判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女性的地位得到提升並逐漸受到關注。1898年，上海開辦了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學堂——“經正學堂”，儘管開堂不到兩年就關閉了，但是還是給近代中國的女性地位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從此之後，各地都有了女性學堂。但是在1903年之前，中國的女學堂都是私人開辦，在法律上並沒有承認其合法性。1903年，政府承認了女學合法，但這時的女學並不是指女性可以走進課堂，而是在家接受教育。1906年，政府在慈溪太後的指示下興辦女學。1907年清政府頒佈了中國第一個女學章程，正式確立了女學的合法性。民國初期，教育部頒佈《壬子癸醜學制》，擴大了女性受教育的範圍，延長了女性受教育的時間，提高了女性受教育的程度。1917年，教育部公開招收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學生。到了1919年，大學開始允許女性就讀，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校園，開始接受西方先進思想和男女平等思想。¹我們可以意識到在1898年到1923年之間，中國女性在教育方面的地位可以說是得到了質的飛躍。

究其原因，本研究認為女性在教育方面地位的提高與1898年戊戌變法和1915年新文化運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1898年，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開展了宣導學習西方，改良政治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晚清的這次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雖然最終以失敗結尾，但對於近代的中國來說，這次思想啟蒙運動無疑為近代中國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助力，推動了近代中國思想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在戊戌變法中文化教育方面中，維新派主張廢除八股，興辦兼學中西方文化的學堂，創辦京師大學堂。正是在這一時期，在主張學習西方的變法的影響之下，中國女性的地位和價值也被國人所關注，一些思想啟蒙人士意識到了女性在社會上的價值。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解放女性的道路邁向第一個轉捩點，中國第一所女學堂在上海誕生。也正是中國維新變法的這一時期，中國維新派將國民性

¹ 張莉，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M]，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P48-50

改造視為拯救民族、復興國家的根本。魯迅的啟蒙主義思想在這一時期受嚴復思想和梁啟超新民說的影響，繼承發展了梁啟超的國民改造精神。魯迅認為，拯救愚昧的國民意識的最好手段就是文學。¹魯迅通過文學作品對封建制度和綱常禮教進行強烈的諷刺與批判，於是在他的筆下也誕生了許多封建社會下的女性形象，這些女性人物在舊社會封建思想的重壓和封建禮教迫害之下，無一不以悲劇收場。

這一時期，女性的價值問題雖走進國人視野，但是在中國封建制度和數千年以來的思想束縛之下，平等自由的女性解放之路仍然進程緩慢，舉步維艱。直到1915年，解放女性的道路才又一次邁向新的轉折。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開展使中國的思想解放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有力地打擊和動搖了中國千年以來的封建思想的地位，喚醒了一代新青年，使他們的思想受到了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解放了他們的思想，在當時中國社會上掀起一股猛烈的思想解放熱潮。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女性開始走進大學，開始接受西方先進思想和男女平等思想。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中站在最前線的先鋒，高舉科學民主的旗幟，在文學作品中進一步抨擊了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在這一時期，魯迅筆下的女性的思想意識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她們開始被新思想新文化所影響，從最初的愚昧麻木、怯懦順從走向了思想覺醒、勇敢反抗。

二、魯迅筆下女性的覺醒歷程

魯迅筆下誕生了中無數名像單四嫂子、愛姑、子君這樣典型的舊社會女性形象。她們當中有人順從命運，也有人進行過抗爭，但她們依舊沒能逃離殘酷的現實社會，都以悲劇收場。究其原因，本研究認為，這逃不開中國的封建制度壓迫和封建思想的影響。魯迅則通過這些女性的悲慘命運，向麻木的中國人們揭露“吃人”的封建制度、綱常禮教對於中國女性的嚴重迫害，但同時他也希望能為中國女性解放尋找一條光明的道路。²

（一）第一階段：麻木順從——《明天》中的單四嫂子

單四嫂子是魯迅小說《明天》中一個淳樸善良、安分老實的農村女性。她年紀輕輕便死了丈夫。在丈夫去世之後，她把希望從丈夫身上轉移到兒子身上，實

¹ 嚴英旭，魯迅文學散策[M]，글빛문화원，2022，P75

² 黎菲，向封建禮教說不——魯迅小說女性形象的意蘊詮釋[J]，柳州師專學報，2015，30(05)，P20

兒成為了單四嫂子活著的全部意義。雖然生活艱苦，但是單四嫂子依舊積極面對，她靠紡棉紗養活自己和兒子，覺得自己紡的紗線“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著”¹。然而不幸的是沒過多久寶兒也離她而去。寶兒離開了，失去唯一精神寄託的絕望和周圍看客的冷漠和不仁讓她覺得“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圍著他，太空的東西四面壓著他，叫他喘氣不得”。² 單四嫂子失去了唯一的希望，她悲痛萬分。但同時她也在困惑，在中國，傳統禮教規定婦女遵循“夫在從夫，夫死從子”，可是現在兒子死自己又應該從誰呢？她困惑著究竟自己的“明天”在哪裏。

在單四嫂子痛苦又絕望的時候，她周圍的人卻無視了她的痛苦和絕望，冷漠地欣賞著單四嫂子的不幸。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等人時刻都在關注單四嫂子其實是不懷好意的。即使在幫助單四嫂子抱孩子的時候，他們也不忘占單四嫂子便宜。在單四嫂子失去了兒子之後，他們便開始肆無忌憚地開始撲向了這個孤苦的女人。另一方面鄰居王九媽和庸醫何小仙從某種程度來說也是斷送單四嫂子“明天”的“幫兇”。庸醫何小仙面對奄奄一息的寶兒，並沒有展現出醫者治病救人的仁心，而是隨便給寶兒開了藥便打發了，也間接導致了寶兒的死亡。王九媽看似熱情的在幫助單四嫂子，但實際上她也是一個冷漠的看客。寶兒下葬當天，“單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總不肯死心塌地的蓋上；幸虧王九媽等得不耐煩，氣憤憤的跑上前，一把拖開他，才七手八腳的蓋上了。”³ 王九媽面對飽經喪子之痛的單四嫂子，沒有同情安慰，只有不耐煩。她張羅寶兒的葬禮，並不是真心想要幫助單四嫂子，而是把葬禮當作一件非常普通的任務來完成。這個由紅鼻子老拱、藍皮阿五、庸醫何小仙、王九媽構成的吃人的牢籠就這樣奪走了單四嫂子的“明天”。

單四嫂子的悲劇不僅僅是魯迅筆下的一名可憐孤單的女性形象，也是當時千千萬萬舊社會女性的縮影。這一時期的女性深受封建制度和綱常禮教的迫害，她們愚昧麻木，沒有自我，也沒有“明天”。單四嫂子的丈夫早逝，兒子去世，周圍人的冷漠導致了她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她最初將自己的“明天”寄託在丈夫身上；丈夫去世後，她又將“明天”寄託在兒子身上；兒子也去世後，她開始迷茫自己的“明天”在哪裏。

¹ 魯迅，明天，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P696

² 魯迅，明天，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P695

³ 魯迅，明天，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P695

面對發生的一切，單四嫂子一直都表現出了麻木順從，她任由身邊人擺佈，沒有一絲抗爭，也意識不到自己的人生正在收到封建社會的殘害。封建禮教禁錮著她的思想，她一直將“明天”寄託在別人身上，絲毫沒有自己掌握“明天”的意識。封建禮教的迫害、思想意識的禁錮使以單四嫂子為代表的一系列舊社會女性失去自我意識，喪失獨立人格，習以為常的做著家庭的奴隸和社會的奴隸。

（二）第二階段：開始覺醒——《離婚》中的愛姑

《離婚》中的愛姑同單四嫂子雖然都為農村婦女，但她們之間從性格到成長環境再到思想意識都有著極大的不同。愛姑出生於農村的一個大戶人家，她性格大膽潑辣、天不怕、地不怕。在面對不公與壓迫時，她潑辣蠻橫的個性容不得自己被欺負。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她敢於向強大的封建勢力發起挑戰，懂得反抗，懂得為自己爭取利益，相比於單四嫂子，愛姑已經由愚昧麻木走向了覺醒之路。但是她的反抗並不是要打破封建禮教的束縛，而是為了爭取屬於自己的利益，在封建制度內進行反抗。所以在本質上其實愛姑也並沒有逃脫出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因此，本研究認為她的反抗可以說是在封建制度下的反抗。

愛姑面對封建陋習敢於表達不滿，並且公然進行反抗。面對丈夫另結新歡，要拋棄她時，她大罵丈夫是“姘上了小寡婦”的“小畜牲”¹；又因為父親站在丈夫那一邊，她就罵公公是“老畜牲”²。丈夫要和她離婚，她說：“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總要鬧得他們家敗人亡！”³是離婚這件事鬧了整整3年也沒有結果，最後，愛姑的夫家施家請出了有權勢的七大人出面調解。面對七大人，愛姑最初還心存幻想，以為他能夠為自己主持公道，她說“七大人是知書識禮，頂明白的，不像我們鄉下人。我是有冤無處訴，倒正要找七大人講講。”⁴但是面對愛姑的話，七大人卻表示

“年紀青青。一個人總要和氣些：‘和氣生財’。對不對？我一添就是十塊，那簡直已經是‘天外道理’了。要不然，公婆說‘走！’就得走。莫說府裏，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這樣。你要不信，他就是剛從

¹ 魯迅，離婚，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P981

² 魯迅，離婚，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P981

³ 魯迅，離婚，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P982

⁴ 魯迅，離婚，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P986

北京洋學堂裏回來的，自己問他去。”¹ 可見七大人所維護的“公正”只是在封建制度下，以夫權為主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秩序。

在強大的封建勢力和七大人的威勢面前，愛姑由莫測高深到心慌意亂，從優勢轉為劣勢，先前的銳氣已經一掃而光。愛姑的幻想破滅了，她的抗爭以失敗而告終。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中國的女性意識到了人格的重要性，於是開始為擺脫傳統綱常禮教而進行抗爭。但是愛姑的反抗是為了維護自己舊式婚姻，她並沒有擺脫舊思想的束縛，反而是渴望得到封建禮教的庇護來保護自己的婚姻。與單四嫂子相比，在思想意識上二者有著極大的差異，但是也在獨立人格這方面，二者又出奇一致。單四嫂子因缺乏獨立人格，致使她迷茫自己的“明天”在哪。愛姑的思想雖具有反抗意識，但是卻是蒙昧的。面對丈夫要拋棄她的時候，她主張自己“我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抬來的呵！”²。愛姑雖然強勢，懂得反抗，但依舊把傳統婚姻當作最崇高最公道的婚姻準則。雖然在思想上已經有了進步，但仍然是封建制度的擁護者。面對代表封建父權的七老爺時，她又十分怯懦，不知如何是好。她在弱者面前變強，強者面前變弱，是一個跟著權利而動的偽善者。³另一方面，她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於自己的父親和兄弟，因此她的反抗具有軟弱性，⁴她的父親並未脫離思想束縛，面對七老爺時他也不敢多言。這時愛姑才意識到自己是孤立無援的，沒有人能夠幫她爭取利益，於是她的心理防線被攻破。愛姑自己並沒有自主獨立的人格在支撐著她，相反她還試圖通過來自父親和兄弟的壓力迫使夫家屈服。愛姑這種依附於他人的意識決定了她的反抗只能是以失敗告終。中國數千年來女性一直深受傳統綱常禮教的控制和束縛。然而作為一名傳統女性，愛姑卻敢於對封建夫權進行反抗，這已經比單四嫂子有了很大的進步，也顯示出了中國女性在思想意識上的初步覺醒。

（三）第三階段：奮力反抗——《傷逝》中的子君

《傷逝》中的子君是一位在“五四”運動之後，她家庭優渥，受過良好的教育，接受了反對封建，追求

¹ 魯迅，離婚，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P987

² 魯迅，離婚，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P987

³ 嚴英旭，魯迅文學散策[M]，글빛문화원，2022，p186

⁴ 虞賽賽 錢肖好，論魯迅，周作人對中國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思考[J]，牡丹2023（04），P27

婚姻自由和個性解放的新思潮洗禮的新女性。如果說愛姑的反抗是利用封建制度來爭取自己的權益，本質上是認同封建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下的抗爭。那麼子君的反抗則是為了追求真愛，反抗封建，是在思想啟蒙下的反抗。子君為了追求自己愛情婚姻的自由，在面對家族封建思想的壓迫與束縛時，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你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¹這一新時代女性宣言代表著近代中國女性對封建思想和舊文化的反抗和挑戰，也是女性解放的新思想在實踐中的展現。²

為了追求愛情，子君和家庭決裂，與愛人同居。在愛情在初始階段，二人感情依舊濃烈熾熱，都擁有為了愛情可以打破一切的決心。所以即使生活裏充滿困難與艱辛，兩個人依然能夠同甘共苦。涓生與子君談關於愛情的看法時，他們都認同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與創造。³但在脫離封建父權制家庭，組建自己的小家之後，她便不再追求愛情的進步。隨著時間的推移，子君失去了新時代女性這個吸引涓生的特質。他們的愛情走向滅亡，於是子君又回歸到了自己的家庭。然而回家後的子君不僅要面對封建父權家庭的嚴格管理，還有封建禮教下更加嚴苛的壓迫，在這樣的雙重壓迫之下，子君最後選擇了死亡。

子君作為接受啟蒙新思想的女性，雖然已經喊出追求自我的口號，但實際上她的思想還是被封建禮教思想嚴重束縛著。雖然接受了五四運動帶來的新思潮，但是卻沒能理解新思想的內涵。她逃離了封建禮教中的包辦婚姻，希望能夠獲得戀愛自由。但子君的內心還是被傳統封建觀念牢牢束縛著，所以子君思想的“覺醒”並不是內在的覺醒，而是表面的覺醒。但是與愛姑相比，子君的思想意識可以說是又向外覺醒了一大步。子君作為接受五四運動新思想的新女性，擁有著獨立的人格，在追求自我利益的道路上，她不依附於他人，而是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你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的口號，她意識到追求自我必須靠自己，必須跳出封建制度和傳統綱常禮教的束縛，敢於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進行反抗與鬥爭。但由於當時社會雖然湧現了自由平等的新思想，但是本質還

¹ 魯迅，傷逝，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P946

² 魏孝庭，從魯迅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看中國近代的婦女解放[J]，南昌師範學院學報，2021，42（06），P105-106

³ 梁雨榕，淺析魯迅小說《彷徨》中女性婚姻悲劇結局的原因——以子君、祥林嫂為例[J]，長江小說鑒賞，2023，（28），P11

是還是處於舊思想的籠罩之下，女性權益與女性地位仍然處於弱勢，所以子君反抗的失敗也是必然的走向。

三、魯迅的女性觀念思考

魯迅自始至終都十分關心女性解放問題。他曾在作品中提到“我還記得中國的女人是怎樣被壓制，有時簡直並羊而不如。”¹他深切的認識到中國女性所受到的壓迫，並且認為封建綱常禮教和封建制度即是造成了女性悲劇的根源。所以魯迅在文學作品中多次聚焦女性，塑造了許多深受壓迫的女性形象。在魯迅的創作中婦女各有其不幸，從單四嫂子到愛姑，再到子君，她們雖然在思想上有進步，但是她們仍然擺脫不了封建傳統的思想，所以最終她們也擺脫不了自己悲劇的命運。魯迅透過她們的不幸，清醒冷靜地諷刺批判了壓迫女性的封建社會和封建文化。本章節將通過單四嫂子，愛姑，子君三位看似相同、實則不同的女性形象作為基礎，通過對魯迅筆下女性的覺醒歷程的分析，觀察魯迅對中國女性問題的思考。

魯迅作品中對於女性悲劇命運的藝術再現，實際上是從本質上揭示了中國女性悲劇的根源來自於中國數千年以來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神權、男權的吃人本質。²在魯迅筆下女性覺醒的第一階段，這些女性沒有受過教育，是無知蒙昧又麻木的，她們把自己的一切寄託在丈夫，孩子和家庭上。她們被迫依附於自己的丈夫，妥協於社會。

更可悲的是，她們又心甘情願的接受這種命運，仿佛只有肉體，沒有靈魂。

魯迅指出女性悲劇的根源來自於當時封建的社會環境和人們思想的畸形。當時的女性愚昧迷信、對命運屈從，心甘情願地接受一切壓迫和不公。她們雖然是封建男權的受害者，卻在積極維護著這種封建文化。《明天》中的單四嫂子就是典型的形象。單四嫂子丈夫死後獨自撫養兒子，她遵守著封建禮教對女性的種種制約，過得艱難孤苦，卻毫無怨言。後來兒子離她而去，她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也找不到自己活下去的意義，夜深人靜之時，她痛苦之餘也在迷茫自己的“明天”。而造成這種悲劇的根源其實便是封建禮教。單四嫂子的遭遇不僅僅是一個小說人物的遭遇，更是當時封建社會中千千萬萬下層貧苦女性的遭遇。

¹ 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P1421

² 黎菲，向封建禮教說不——魯迅小說女性形象的意蘊詮釋[J]，柳州師專學報，2015, 30(05)，P20

在魯迅筆下女性覺醒的第二階段，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中國女性開始思想覺醒，開始為自己而抗爭。這一時期的女性已經意識到必須為自己爭取權益，為爭取權益鬥爭。新舊思想所產生的碰撞使她們敢於反抗家庭和社會的束縛。但是由於這些女性長期生活在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束縛之下，思想認知有限，最終還是妥協於封建制度之下。這悲劇的背後又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在《離婚》之中，愛姑在面對不公與壓迫時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敢於向封建勢力發起挑戰，懂得反抗，懂得為自己爭取利益，相比於單四嫂子，愛姑已經由愚昧麻木走向了初步的覺醒。但是由於思想長期被綱常禮教和封建文化所束縛，致使她並沒有真正的跳出封建禮教的禁錮，她仍然是在封建禮教中進行抗爭。但在面對強大的封建父權時，她又回歸了軟弱順從的本質，最終導致她的抗爭走向了失敗。

到了以子君為代表的女性覺醒第三階段時，女性的思想已經從封建走向了啟蒙，她們接受了反對封建專制、爭取婚姻自由和個性解放的新思潮洗禮，在面對封建壓迫和不公時，已經能夠勇敢的為自己發聲，勇敢的進行反抗。子君的女性宣言也代表著近代中國婦女對封建舊文化的反叛，也是女性解放的新思想在實踐中的展現。¹但是子君同前面兩位女性一樣，最終也是以悲劇告終。雖然子君已經接受了五四運動所帶來的新思想，但是她並沒有理解到其真正的內涵，她並沒有真正在經濟上和社會地位上要求獨立。這也就導致她在逃離傳統父權家庭，組建小家庭之後還是要依附於他人，她除了愛情一無所有。所以在愛情消失殆盡之後，她只能被迫回歸傳統父權家庭。但這時她遭受了來自社會和家庭兩個方面的更加嚴苛的壓迫，這最終導致她走向消亡。

從單四嫂子到愛姑再到子君，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向我們揭開了封建禮教下婦女悲慘命運。魯迅既將中國女性置入於中國傳統的倫理秩序，同時給予啟蒙者一種觀察的場景和視野，也引發人們對近代中國女性解放問題的思考。²由紅鼻子老拱、藍皮阿五、庸醫何小仙、王九媽及眾人、凌駕於愛姑之上的封建父權代表七大人等人，還有辭退涓生的局長和子君的父親兄弟等等，這些人共同織就了一張近代半封建社會下的封建禮教的網，而以這三

¹ 魏孝庭，從魯迅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看中國近代的婦女解放[J]，南昌師範學院學報，2021, 42 (06)，P105-106

² 魏孝庭，從魯迅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看中國近代的婦女解放[J]，南昌師範學院學報，2021, 42 (06)，P105-106

位女性為代表的近代中國女性都被籠罩在這張大網之下。魯迅通過他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將矛頭直指封建禮教，指出封建禮教對中國女性的壓迫和殘害。揭示了中國的女性想要得到真正的解放，第一要徹底地推翻封建制度，使女性獲得與男性同等的尊重和地位。第二要爭取到獨立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我以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話。”

¹只有女性取得了經濟獨立，才能擺脫對男性的附屬地位，從而獲得人格的獨立。

現今，封建專制制度早已消失，但仍有一些殘存的封建思想仍在各個方面影響著對當代女性。女性解放之路仍然任重而道遠。魯迅先生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所傳達給我們女性觀，在當今仍然值得我們借鑒與思考。

四、結論

魯迅先生在為“文學救國”而努力奮鬥的同時，也始終沒有放棄對女性問題的思考。他始終對社會最底層的女性的悲慘遭遇和不幸命運表示同情和憐憫，始終在對封建制度和封建綱常進行抨擊。

本研究跳出了對現代女性解放之路的思考，將視角集中於魯迅思想中對於女性觀念的變化歷程。通過對魯迅小說中的單四嫂子，愛姑，子君三位女性主人公思想觀念的嬗變，可以感受到魯迅思想中女性觀的變化與進步。魯迅小說中的單四嫂子，愛姑，子君三位女性的悲劇是處在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壓迫下造成的。魯迅通過他的小說指出了封建禮教對中國女性的壓迫和殘害。揭示了中國的女性想要得到真正的解放，要徹底地推翻中國封建制度；要爭取經濟主導權。一方面，魯迅通過文學作品向世人揭示了她們的悲苦生活，幫助她們尋找出路。另一方面，通過本研究我們可以意識到魯迅的女性觀念也在不斷進步，他把解放女性同反封建聯繫在一起，通過筆下女性形象的變化，使世人感受到女性的覺醒歷程，呼籲真正的女性解放。

¹ 魯迅，關於婦女解放，《魯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P595.

參考文獻

- [1]嚴英旭 魯迅文學散策 [M]，글빛문화원, 2022
- [2]魯迅 華蓋集，忽然想到 魯迅全集 [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3]魯迅 關於婦女解放 魯迅全集 [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 [4]魯迅 傷逝 魯迅全集 [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5]魯迅 離婚 魯迅全集 [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6]魯迅 明天 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7]張莉 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 [M]，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
- [8]蔣永國 魯迅早期思想與他的新文學創作 [M]，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9
- [9]錢理群 魯迅作品細讀 [M]，北京出版社，2017.10
- [10]梁雨榕 淺析魯迅小說《彷徨》中女性婚姻悲劇結局的原因—以子君、祥林嫂為例 [J],長江小說鑒賞，2023, (28)
- [11]黎菲 向封建禮教說不——魯迅小說女性形象的意蘊詮釋 [J]，柳州師專學報，2015,30(05)
- [12]魏孝庭 從魯迅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看中國近代的婦女解放 [J]，南昌師範學院學報，2021,42 (06)
- [13]虞賽賽、錢肖好 論魯迅，周作人對中國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思考 [J]，牡丹2023 (04)
- [14]金河林 五·四時期魯迅的苦悶：個人的自立、民眾的連帶、社會的發展 [J]，중국인문학회, 2009.6

[15]李寶暻 이광수의 동정과 루쉰의 수치 - 신기원 시대의 정동 초탐
[J],중국어문학논집, 2020.8

**Exploring the awakening process of women in Lu Xun's works - taking the
novels "Tomorrow", "Divorce" and "Sorrow" as examples**

LIU LIANGLIANG

Abstract: In China, women's liber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of social concern and reflection. After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paying attention to women's rights and calling for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became a new social trend. Lu Xun, as the pioneer of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in modern China, has been committed to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literature. He tried to use words to awaken the numb Chinese people and arouse people's pursuit of freedom, equality and individual rights. At the same time, he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fate of women from beginning to end. Through his works, he showed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to Chinese women at that time, and revealed the tragic and bloody truth of women under the feudal ethics. And he also tried to find a correct and bright path for women's liberation through his literary creation, hoping to promote the awakening of women's consciousness. The three female protagonists in his short stories "Tomorrow", "Divorce", and "Sorrow" have well demonstrated to the world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modern Chinese women's ideology from numb obedience to awakening and finally to resistanc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mages of these three female protagonists, and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changes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Lu Xun's works, then considers the changes of Lu Xun's views on the issue of female liberation.

Keywords: Lu Xun's novels, Lu Xun's thoughts, female image,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簡括與反噬：法家文化與魯迅的“刀筆吏”問題

張克¹

（深圳職業技術大學 職業技術教育學院）

摘要：法家的簡括和反噬是理解魯迅的“刀筆吏”問題的重要概念。當魯迅站在弱者一方，以“簡括”、“渾名”之術揭露真相時，為人所重所敬。但“簡括”之法本身也有被“反噬”的危險，難以避免“法、術、勢”的權力格局中各種“勢”的操弄之“術”，這是研究魯迅的“刀筆吏”問題時始終不能忘記的。

關鍵字：法家 簡括 反噬 刀筆吏 魯迅

一、法家的秋霜烈日

“刀筆吏”似乎已是魯迅的標籤。1926年“女師大”事件中被陳源指控為“刀筆吏”，²身後被蘇雪林罵作“刀筆吏”、“酷吏”、“其文筆尖酸刻毒，無與倫比”³，中間則有成仿吾稱他為“詞鋒誠然刁滑得很”的“師爺”。⁴這是對魯迅觀感不佳的人的意見，其實即使是對魯迅有好感者，此類意見也不少見，曹聚仁曾經這樣評論，“周氏兄弟的性格與文章風格，都是屬於紹興的，有點兒刑名師爺的調門的”，而且還特別強調，陳源的說法“著實抓到了癢處”。⁵

魯迅的“刀筆吏”問題，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細檢文獻不難發現，對這一問題，周作人於1949到1950年的幾篇短文，可以說迄今為止依然是最為研究界倚重的論述。《目連戲的情景》一文明確指出，“師爺筆法的成份從文人方面來的

¹ 張克（1978-），男，河南駐馬店人，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² 見陳源《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幾封信》，張夢陽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卷一），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34頁。

³ 見蘇雪林《論魯迅的雜感文——四年前的一篇殘稿》，張夢陽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卷二），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23頁。

⁴ 見石厚生（成仿吾）《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張夢陽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卷一），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65頁。

⁵ 見曹聚仁《魯迅評傳》，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1頁。

是法家秋霜烈日的判斷”。¹《師爺筆法》一文提到翻案文章的“反做法”是最能體現刀筆吏手法的。²《關於紹興師爺》一文則談及紹興刑名師爺作為“申韓業的儒生”的諸種“反復顛倒無所不可”的“老幕友講刀筆的秘訣”，認為刑名師爺“主要的特質是受過國學的薰陶，會得做八股的……申韓的法家成分實在只是附加的一點……這所謂八股，當然不是正式的時文，乃是指自唐宋，以至清朝千餘年來養成的應制的本領，不論律師經義以及策論，都能依照題目，說得圓到，那一套舞文弄墨的手段”。³這裏“申韓的法家成分實在只是附加的一點”，看似把紹興師爺與法家的淵源淡化了一下，更強調了現實的“應制”經驗。但實際上，這裏“申韓的法家成分”若是指法家“法、術、勢”的“法”，這話還算妥帖，但若把“申韓的法家成分”換做“術”亦或“勢”，那就顯得不夠周密了。說到底，刀筆吏的做法，例如翻案文章的“反做法”，無非就是法家“法、術、勢”格局裏的“術”與“勢”的操弄，“法”不過是可資利用的資源而已。所以，若說法家，只盯著外顯的“法”，不深究“術”與“勢”，不免仍是隔靴搔癢，不夠切實。

關於紹興師爺的法家氣質，周作人還有散佈各處的點滴言辭，有時會更強調師爺的職業性而非地域性（《關於紹興師爺》），有時還是更傾向於與紹興的地域及浙東文史傳統相勾連，尤其早年，例如1923年他在《地方與文藝》一文裏，就指出浙江“深刻”一路的傳統，“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其特色不在詞華，在其著眼的洞徹與措辭的犀利。”⁴這些論述的精警自不待言，筆者也受益匪淺。略感不足的是，討論魯迅雜文的“刀筆吏”問題，似乎出現了更憑依周作人以上思想，而有意無意忽視魯迅某些更具啟發性論述的傾向。例如，對陳西滢指控自己為“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魯迅曾回應道，“滅族呀，株連呀，又有點‘刑名師爺’口吻了，其實這是事實，法家不過給它起了一個名，所謂‘正人君子’是不肯說的，雖然不妨這樣做。此外如甲對乙先用流言，後來卻說乙製造流言這一類事，‘刑名師爺’的筆下就簡括到只有兩個字：反噬。嗚呼，這實在形

¹ 見周作人《目連戲的情景》，《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頁。

² 見周作人《師爺筆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82頁。

³ 見周作人《關於紹興師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70頁。

⁴ 見周作人《地方與文藝》，《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頁。

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語說：‘察見淵魚者不祥’，所以，‘刑名師爺’總沒有好結果，這是我早經知道的。”¹這裏魯迅對法家起名（命名）的坦然，對法家在筆法層面上的“簡括”、功能上的“反噬”的提示，是應該引起高度注意的。²

二、簡括與渾名

先說“簡括”。魯迅說，“尤其要緊的是給與一個名稱，像一般的“渾名一樣”，“原是極利害，極致命的法術”，“批評一個人，得到結論，加以簡括的名稱，雖只寥寥數字，卻很要明確的判斷力和表現的才能的。必須貼切，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離，這才會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³這是魯迅對法家的“簡括”命名術極深刻的理解。以“簡括”之法給人加“渾名”正是魯迅自己的拿手好戲。“京派”和“海派”論爭時對兩地知識份子“近官”“近商”的定位，《“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裏對梁實秋的命名、對1930年代左翼聯盟裏某些領導人的“奴隸總管”的命名等等，均顯示出以“簡括”之法給與“渾名”，一語定讞的功力，這真是老吏斷獄，寸鐵殺人的絕技。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批評女性所作論辯文的缺點時說，“曆舉對手之語，從頭至尾，逐一駁去，雖然犀利，而不沉重”，自己則採用與此不同的論證方法，“正對論敵之要害，僅以一擊給與致命的重傷。”⁴若是想“正對論敵之要害”，正需具有“簡括”的功力才能找准。⁵

《我還不能“帶住”》一文裏魯迅說，“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

¹ 見魯迅《不是信》，《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頁。

² 魯迅對“簡括”、“反噬”等概念如此理解、論斷的詞源學、概念史文獻依據，筆者雖有努力查詢，但目前仍尚未能明確系統的梳理出來，這是下一步要繼續研究的。

³ 見魯迅《五論“文人相輕”》，《且介亭雜文二集》，《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395頁。

⁴ 見魯迅1925年4月複許廣平信，《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6頁。

⁵ 錢理群在《心靈的探尋》一書裏曾分析過魯迅的“簡括”、“渾名”，“‘簡括’而又形容得痛快淋漓，‘察見淵魚’，這都已涉及到刑名師爺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職業所特有的思維方式與表現方式”，“魯迅創造性思維與紹興刑名師爺傳統的繼承，當然不是簡單的‘取渾名’的手法，而是一種善於察視事物隱匿方面（察見淵魚）的銳利觀察力，善於透過紛紜複雜的現象，迅速切人本質，‘簡括’的提煉，敏捷而明確的判斷力，以及從整體上把握事物提挈全般的‘寫意’式的思維方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93頁。

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¹這是魯迅體察、洞悉到的，“簡括”之法形成的“名”（“美名”、“徽號”、“假臉”、“公論”）的厲害，這些“名”傳播的陰沉技法（“流言”、“吞吐曲折”）、以及修辭背後的真實動機（“行私利己”）。魯迅所謂“我覺悟了，所以要重用”，是指他由諳熟到反戈一擊的激憤，而“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則是他與人論戰發聲致力的目標：說出真相。而這一切，都是不再忍受“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的窒息感。但僅有熱心腸的同情而無力量，也只能徒喚奈何，“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魯迅的這段話可以說是魯迅對“刀筆吏”、對法家“簡括”之術的真實心態。他作為一個高度敏感、對弱者的苦境極度激憤又對弱者生存的權力結構無比清晰的現代文人，所感所思，既痛心於自己與中國“古老的鬼魂”糾纏至深，又不能不以傳統的法家眼光洞穿現代的花色和偽裝，雖然他本意並不情願，卻也是他的價值之所在，這也是個悖論。

魯迅雜文的形象感以往更多是在典型現象、文學性、生動性等闡釋傳統裏得到辨識的，其實，這一問題結合刀筆吏的“簡括”術來看更見其奧秘。“簡括”之法，其精義就是以三言兩言將批判對象特徵勾勒出來，以“渾名”將其進行形象化的定格，並極有韌性的把這一形象從某一特定的具體境遇中抽離出來，運用多個角度、多種方式強化它的符號性，使之慢慢形成一個單調的標示，事過情遷這一“渾名”本身越來越脫離當時語境，只能淪為漂浮的、無內在機理的，甚至荒唐可笑的抽象符號。這可以說是一種對抗時間的“簡括”筆法。魯迅曾說，他是“論時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類型。”²，“不留面子”是說出權力格局裏的真相，“常取類型”則是“簡括”的精義。魯迅與陳西滢的論戰就是這樣，他們在女師大事件中遭遇後，魯迅就把陳西滢在具體論戰中的形象牢牢定格，其後不斷並將其遷徙到各個不同的話語場中，作為一種類型的人物符號加以使用，令其叫苦不迭。

¹ 見魯迅《我還不能“帶住”》，《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頁。

² 見魯迅《偽自由書》前記，《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頁。

細究魯迅的諸多論戰，人們大都會對他的“簡括”術印象深刻。後人有為當時的論戰對手鳴不平的，常試圖以具體歷史情境的重建、分析，為他們的價值立場及言辭的合理性做辯護，如為陳西滢、梁實秋、顧頡剛、周作人、周揚、成仿吾、徐懋庸等做辯護的聲音，或隱或顯，一直未斷過。隨著對魯迅討論的禁忌越來越少，相信這種辯護還會越來越多。但需留意的是，這些辯護，在做特定歷史情境的重建時，是否也需要考慮到，法家的“簡括”，“著眼的洞徹與措辭的犀利”，天然具有穿透具體歷史語境裏人事的瑣細，直接洞見其中權力關係的特質，如果僅用儒家的人際倫理來看待魯迅與論戰對手的分歧，刻意回避其中的權力格局，就會陷入對魯迅個人品性、脾氣的討伐；當然，同樣需要承認的是，魯迅的“簡括”筆法，事實上是把論戰對手某一情形中的某一特點放大、定格，並不能成為總括性的對他人的蓋棺論定。但在現實的社會生活裏，這一區分殊難分辨清楚，簡括筆法、渾名話語產生的鋒利、可遷徙性會對當事人會產生極大的生存壓力，這也正是當事人及其親朋故友、身後的追隨者、歡喜者並不想承受的。

魯迅並非缺乏對這些做法自帶毒性的自省，他自己也苦於身上難以擺脫的“古老的靈魂裏”裏，就有“莊周韓非的毒，時而隨便，時而峻急”。我們在肯定魯迅犀利的同時，恐怕也要看到，魯迅的話語本身也會有權力異化問題，當魯迅發明的“簡括”、“渾名”本身在某種權力格局裏不再是站在弱者一方，儼然成為宰製者藉以使用的“美名”、“徽號”、“假臉”、“公論”時，它自己本身也可以腐化、變質。

這種情況，如果用法家的術語講，其實就是“反噬”。

三、反噬

魯迅談“反噬”，“如甲對乙先用流言，後來卻說乙製造流言這一類事，‘刑名師爺’的筆下就簡括到只有兩個字：‘反噬’。嗚乎，這實在形容得痛快淋漓。”¹魯迅此處所說的“反噬”，是指心機之人的攻擊法，利用名與實的錯位，“反復顛倒，無所不可”，先對敵方進行“簡括”、給與“渾名”，汙名化對方，進而除之以後快的刻毒用心。其情形，正如魯迅所說，“想到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於在暗中撥弄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撥弄和

¹ 見魯迅《不是信》，《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頁。

鼓動，是某黨，是某系；”¹ 至於“反噬”的伎倆，正是法家的“術”的專擅，也是最為毒辣的。魯迅的如下觀察可做參考：“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卻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說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他便用了‘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²這些操弄之“術”，手段繁多，郭沫若在《十批判書》關於韓非子的批判裏就曾提出“術”的具體內容：一、權勢不可以假人；二、深藏不露；三、把人當成壞蛋；四、毀壞一切倫理價值；五、勵行愚民政策；六、罰須嚴峻，賞須審慎；七、遇必要時不擇手段。³

反噬造成的結果，恰恰是最忠誠的人被渾名化為不忠誠從而被剪除，最遵守法制的被以目無法紀被殺，名實相背。當然，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情形，似乎並不限於法家思想家、實踐者，但反噬是法家特別觸目的現象，對他們命運的悲劇性《韓非子》有著清晰的認識，但韓非子本人也難以擺脫“反噬”的悲劇。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推行法家的政權如秦國，其“反噬”的悲劇命運令人深思。秦國因全面推行法家學說而強大，同樣也因此土崩瓦解。法家的代表人物，政治家商鞅力行變法，建章立制、賞罰分明。他實行嚴刑峻法、令行禁止，推動了秦國的迅速發展強大。但秦孝公死後，商鞅被誣謀反，只能逃亡。逃亡途中卻因為無法出示身份證明不能住店，店家不留宿他恰巧是嚴格執行他制定的秦律的結果，因為秦律規定，如果擅自留宿沒有證件的人，全家都會性命不保。“商君只能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史記·商君列傳第八》）秦王最欣賞的事法家的第一思想家、集大成者韓非。“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學說成就了秦國的強盛，韓非卻因同窗李斯的誣陷被秦王處死，或許有人會把韓非子的死歸結為李斯的嫉妒和陰狠，但法家人物個人品德的正直並不能抵擋這一命運。

理想狀態當然是法家人物作為忠臣，為君主“守所長，盡所能”。（《韓非子·功名》）“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

¹ 見魯迅《並非閒話》，《華蓋集》，《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頁。

² 見魯迅《並非閒話》，《華蓋集》，《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頁。

³ 見郭沫若《十批判書》，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頁。

尊主安國者也”。(《韓非子·奸劫弑臣》)事實上，法家幾個代表人物商鞅、吳起、韓非可以說都做到了忠誠君主，赤心奉國。對他們的悲劇命運，歷來有各種說法。《鹽鐵論》裏的如下批評是主流意見：“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欺舊交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仇，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鹽鐵論·非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鹽鐵論》裏面的看法，實際是在批評法家過於依賴嚴刑峻法，只知道崇尚權術，卻不知道敬畏人心、尊重人性，結果落得舉國仇恨，人人恨不得生啖其肉，對自己、對君主、對國家都產生了莫大的危害。“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卒車裂族夷，……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鹽鐵論·非鞅》)這些意見，都傾向於指出卻不同情法家被“反噬”的命運。

法家的確呈現出腹背受敵的狀態。法家人物與君主之間，按照法家的理解，實際也不過是利益才把他們聯繫起來。且“臣主之利相與異者也”。(《韓非子·孤憤》)法家從君王那裏獲得授權，也把自己的命運全部交到了君主手裏，這一矛盾是法家悲劇的主因。法家把全部權力運行的保證寄託在君王一人之手。《韓非子》裏對君主的要求是：以法為本、賞罰嚴明、精於處勢、善於操術、明悉治國三道、掌握治臣三經、堅持三守、識破五壅、細察六微、善用七術、明辨八說、通曉八經、破除八奸、避免十過、善納諫言、知人善任。這是法家權力秩序的人格化，是理想的君主形象。但韓非的《初見秦》《難言》和《說難》都表明，君主也是肉身之人，其決策的方向、動機、目的、心理都是難以揣摩的。“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而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韓非子·難言》)韓非深切的懂得，歷史上最傑出的賢人能士遊說最聖明的君主都不一定會被接受，何況愚者？“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韓非子·難言》)

應該看到，法家的治理秩序裏，法家與民眾之間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既然以權力為最高原則，那麼每個人都會爭先恐後的爭奪權利，絕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利益。法家的社會秩序設計與管理的立足點，是以君王的利益為第一出發點的，很多時候君王的財富、土地、擴張與百姓的利益並不一致，甚至是截然對立

的。法家試圖通過法律將臣民的利益從屬於君主的利益，必然會遭致臣民的反抗，所謂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說到底，法家人物是君王利益的代表者而非民眾利益的捍衛者。法家的意識裏，在商鞅制下的秦國，只有“耕戰”（軍人和農民）之人才是對國家有用的，其他的社會文化、經濟活動幾乎都被視為對君王政權的威脅。為此法家的世界是一個不可能建立信用的世界，而信用匱乏一定會導致社會交易成本過高，導致社會的流動性、活力被抑制。當然，這些本身又是法家恐懼的。在信用匱乏的世界裏，法家勢必建立起嚴密的監控系統。總體來說，監控分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條相互交織的途徑。在上的君主運用“勢”，循名責實、賞功罰過，對在下的臣子加以“術”的操作，這是自上而下的途徑。而告奸則是自下而上的途徑。“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韓非子·奸劫弑臣》）告奸、連坐等制度的設計無非是基於君王自身的有限性，他無非想監控整個社會。這也表明，單一、絕對的以權力之眼理解世界是無法自行休止的，只可能是一個類似於“壞無限”的過程。

還需指出的是，法家人物與其他知識份子乃至法家人物內部也是對立的。究其原因，這與法家以絕對的、單一的權力視角理解世界、理解政治、社會有關，而且它在時間意識上重“時”、過分側重於當下的利益，對歷史與未來的敬畏都不夠，可以說只看重工具理性之用而無價值理性的培養。權力的絞肉機沒有喘息和停止的機會，當下利益的波動又總是難以避免的，畢竟利益的衝突是人類永恆的生存性現象。法家在權力的對峙、衝突中難以實現秩序的恒定性。任何秩序，至少有三個維度的考量，效率、公正及德性，效率是不同群體之間生存競爭的比賽，公正則是同一群體內部秩序得以運行的保證，德性則是不同群體之間從衝突走向妥協的文明起點，很明顯，法家單一、絕對的權力設計是無法覆蓋這三個維度的，它是社會生存鬥爭激化的直接理論化，依據這個邏輯是沒有必要演化出文明的，這也正是法家很直白的說要“以吏為師”就可以了的原因。

最後，法家的思維方式本身，譬如上文所分析的“簡括”之法本身，的確先天有被“反噬”的內在特質。“簡括”有剪裁、有定格、有抽離，體現出的是“簡括”者的特定意志和話語權力。但這一權力本身如若不是君王式的獨佔和不可挑戰，勢必也會遭遇挑戰和解構。所以，做為中國現代社會的重要思想資源，失去政治權力庇護後，魯迅的雜文，也會因其所用的“簡括”筆法，遭到他人的“反噬”，其結果是，必然常在權威感和解構性之間兩極擺蕩，這恐怕才是“魯迅的‘刀筆吏’問題”的現實背景。

四、術與勢

魯迅本人對“刀筆吏”、“紹興師爺”的態度，不是單向的。可以看到，一方面，當別人以“簡括”、“渾名”、“反噬”的方法攻擊他時，他倒是大大方方的接受下來，這和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急著為自己辯誣的做法很不一樣。魯迅的大方接受反倒使對方的攻擊難以繼續發酵。當然，魯迅在接受下來後接著會對按到自己頭上的“渾名”加以辨析（當然在對方看來就是辯誣），他拒絕對方援引的某種未經檢驗的話語秩序和社會共識，意圖使“渾名”隱藏的事物的本性凸顯出來，尤其是使在特定權力秩序中的等級真相、各個發言者的利害關係、動機、目的等浮現出來。這些眼光和筆力，是和他對“刀筆吏”、“紹興師爺”的思維方式、筆致的諳熟是有關的。但魯迅也深知如此操作的危險和毒性。他自己對師爺並無太多好感，他自己也不願意做，“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¹紹興師爺身上惡劣的習氣他更是反感。周作人說：“著者(魯迅)對於他的故鄉一向沒有表示過深的懷念，這不但在小說上，就是《朝花夕拾》上也是如此。大抵對於鄉下的人士最有反感。除了一般封建的士大夫以外，特殊的是師爺和錢店夥計(鄉下叫作“錢店官”)這兩類，氣味都有點惡劣。”²魯迅尊敬的還是“人極方正”塾師壽鏡吾、藤野先生這樣的人品。

在魯迅與刀筆吏的關係上，真正的問題在於，“簡括”、“渾名”、“反噬”這些極厲害的法家的思維及為文的方法（“術”），一方面有著工具性、無涉價值判斷的一面，是一種基本的思維方法，是權力格局中無可避免的客觀現象；另一方面又難以擺脫各種“勢”力的籠罩和設置，最終淪為“術”的肆意之地。即以陳西滢與魯迅的論戰為例，陳西滢先把魯迅的為文筆法認定為“刀筆吏的筆尖”，“一下筆就像構陷人家的罪狀”，這種認定就是把對方行文的思致歸於“術”的操弄了。魯迅的反擊同樣視陳西滢使用“簡括”、“渾名”的辦法將自己定格為紹興的“刑名師爺”，他反駁對方說：“紹興有‘刑名師爺’，紹興人便

¹ 見魯迅《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序傳略》，《集外集》，《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頁。

² 見周作人《魯迅小說裏的人物·故鄉風物》，止庵編《關於魯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頁。

都是‘刑名師爺’的例，是只適用於紹興的人們的。”¹這是一種歸謬法的反擊手段，紹興人未必都是紹興師爺，陳西滢的邏輯本身就是一種“簡括”、“渾名”、“出重出輕”的操作術，而他卻先出手攻擊魯迅為“刀筆吏”，這又是典型的“反噬”。魯迅說，“我對人是‘罵人’，人對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語’，這真使我記起我的同鄉‘刑名師爺’來，而且還是弄著不正經的‘出重出輕’的玩意兒的時候。”²很明顯，“罵人”和“侵犯了一言半語”可以是立於不同立場對相類事項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更重要的是，發言者在現實的權力格局裏還存在著不同的勢位，且佔據較高勢位的人又刻意回避、遮掩這一真相的話，“術”的出場就無可避免了。

魯迅常有撕破假面的要求，他是坦誠面臨這些問題的，但並非所有的局內人都希望發言是以如此透明的形態進行，這才是討論魯迅雜文的“刀筆吏”問題時始終不能忘記的。

參考文獻

1. 陳源.《閒話的閒話之間話引出來的幾封信》，張夢陽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卷一).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2. 蘇雪林.《論魯迅的雜感文——四年前的一篇殘稿》，張夢陽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卷二).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3. 石厚生(成仿吾)：《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張夢陽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卷一).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4. 曹聚仁.《魯迅評傳》.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5. 周作人.《目連戲的情景》.《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 周作人.《師爺筆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7. 周作人.《關於紹興師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¹ 見魯迅《不是信》，《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頁。

² 見魯迅《不是信》，《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244頁。

- 8.周作人.《地方與文藝》.《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年版
- 9.魯迅.《不是信》,《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
- 10.魯迅.《五論“文人相輕”》,《且介亭雜文二集》,《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
- 11.魯迅1925年4月複許廣平信.《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
- 12.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年版
- 13.魯迅.《我還不能“帶住”》,《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
- 14.魯迅.《偽自由書》前記,《魯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
- 15.魯迅.《並非閒話》,《華蓋集》,《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
- 16.郭沫若.《十批判書》.上海:東方出版社, 1996年版
- 17.魯迅.《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序傳略》,《集外集》,《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
- 18.周作人.《魯迅小說裏的人物・故鄉風物》,止庵編.《關於魯迅》,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Generalization” and “Retribution”
——On Legalism and Lu Xun’s “Pettifogger”

ZHANG K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ollege,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eneralization” and “retribution” of Legalism are important concepts for understanding Lu Xun’s “pettifogger”. When Lu Xun stood on the side of the weak and revealed the truth through the techniques of “generalization” and “retribution”, he was respected and valued. However, the “generalization” method itself also carries the risk of being “retributed”,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void the manipulation of various “power” forces in the power structure of “law, trick, and power”. This cannot be forgotten when studying Lu Xun’s “Pettifogger”.

Keywords: Legalism, Generalization, Retribution, Pettifogger, Lu Xun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譯研究

體認語言學對翻譯主客觀性的解讀

——基於《暮江吟》13篇英語譯文的研究

趙一蔔 宮英瑞¹

（青島大學外語學院）

摘要：古代文學作品《暮江吟》因其深邃的意境和細膩的語言，成為了學界探討的寶貴樣本。本文以《暮江吟》13篇英語譯文為研究語料，旨在從體認語言學的理論視角深入探討翻譯過程中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相互作用與平衡。研究中，我們揭示了保持文本忠實性的同時為譯者提供創造性空間的重要性。本研究不僅為《暮江吟》的譯文分析提供了新的維度，同時也為翻譯學的研究和實踐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參考。期望在未來，可以結合先進技術與翻譯家的智慧，完善古典文學翻譯，使中國文學得到全球讀者更為深入的理解與讚賞。

關鍵字：翻譯主客觀性；體認語言學；識解；《暮江吟》

引言

在跨文化交流的時代背景下，翻譯不僅是文字與文字之間的轉化，更是文化與文化的交融與傳遞。傳統的翻譯理論往往著重於翻譯語言的表層結構和意義，但體認語言學提供了一個更深入、更豐富的視角，使我們能夠深入挖掘來源語言文本與目的語言文本的深層意義，並考慮如何更準確地將其傳達給目的語言的讀者。王寅（2014）從繼承與發展的角度將認知語言學修補為本土化的“體認語言學”（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將其核心原則歸納為現實—認知—語言（王寅，2022），突出強調語言研究的“人本觀”和“體驗性”。在翻譯領域，這意味著我們需要考慮譯者如何理解、感知源文本，並如何將這些感知轉化為目

¹ 作者簡介：趙一蔔，女，山東東營人，青島大學外語學院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在讀研究生；宮英瑞，通訊作者，山東青島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合作導師，碩士生導師，青島大學外語學院副院長，研究領域：認知語言學，文體與翻譯。

的語言中的文本（高文成、吳超異，2021）。這其中涉及了一個永恆的問題：翻譯的主觀性和客觀性。因為翻譯根本是解決雙語之間內容與形式的矛盾統一，也就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矛盾統一（黃振定，2000）。

《暮江吟》作為古代中國文學中的經典之作，其意境深遠，語言細膩，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研究物件。儘管學者們對“體”與“認”在翻譯中的結合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並明確了文化和認知差異對翻譯忠實性和準確性的重要影響，但目前為止，尚缺乏專門針對古代文學經典《暮江吟》英文譯文的體認翻譯研究。因此，本研究將通過對13篇《暮江吟》的英語譯文的比較與分析，旨在以體認語言學為理論基礎概述翻譯中的客觀性和主觀性問題。希望通過這項研究，為翻譯研究者和實踐者提供新的啟示和思考方向。

一、體認語言學與翻譯的主客觀性

（一）“體認”之於翻譯研究

許鈞（2009：4）是這樣定義翻譯的：翻譯是以符號轉換為手段，意義再生為任務的一項跨文化的交際活動。這一定義強調了翻譯的五個價值和本質特徵，即翻譯活動具有“社會性”、“文化性”、“符號轉換性”、“創造性”和“歷史性”。如今從體認的觀點出發，翻譯有了新的定義：翻譯是一種基於多重互動的體認活動，譯者在透徹理解原文語篇所表達的有關現實世界和認知世界中各類意義的基礎上，運用多種體認方式（如感覺知覺、意象圖式、範疇化與概念化、認知模型、隱轉喻、概念整合、識解、像似性等）將這些意義映射進譯入語，基於創造性模仿機制將這些意義建構和轉述出來（王寅2021：46）。這一定義將翻譯過程生動地再現在讀者面前，強調了“人本觀”和“體驗性”兩大要素，富含“體認說”的內涵。

繼王寅（2014）將國外的“認知語言學（CL）”本土化為“體認語言學（ECL）”，“認知翻譯學”也在2020年被順理成章地修補為“體認翻譯學”。早在2008年，王寅就以“翻譯的認知研究”為主題，在《中國翻譯》和《外語教學與研究》上發表了運用 CL中的“識解（Construe, Construal）”機制分析同一首《楓橋夜泊》的 40 首英語譯文，用“體”來解釋它們的同，用“認”中的“識解觀”來揭示它們的異。王寅（2019）再次嘗試以“體認語言學”分析《紅

樓夢》三個英譯本中的漢語成語英譯原則，分別在“現實、認知、語言”三個層面上解讀其翻譯方式和分佈情況。王寅及其團隊在本土化認知語言學方面取得了顯著的研究成果，他們不僅將此理論成功應用於翻譯學領域，進而推導出“體認翻譯學”，而且在實際文學作品的翻譯分析中也有深入的探索，證明了“體認”之於翻譯研究的解釋性和科學性。這種研究不僅為語言學和翻譯學研究開創了新的方向，而且對於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和深化跨文化理解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體認語言學理論雖然屬於一種新興的理論體系，但現今逐漸被越來越多的譯學研究者接受並試圖以不同的方式應用在譯界（李靖舒：2022）。學者們針對不同的文本，運用體認語言學理論展開翻譯研究，有針對政治與公共領域的翻譯文本研究（朱雪蓮2023；張儀2023），前者（2023）探討了外宣數位詞彙的英譯手段，強調了“體”與“認”相互關係在譯法選擇中的作用。後者（2023）著眼於中國特色詞彙的翻譯，提出了基於體認翻譯學的三層次關聯模式，並分析了翻譯實踐的體認過程和社會屬性變化。兩篇研究都深化了我們對體認翻譯學在處理特定文本和詞彙時的理解，展示了其在翻譯實踐中的重要價值。

更多地學者將體認語言學與中外文學譯作相結合，展示了體認翻譯學理論在翻譯實踐和翻譯研究中的應用。孔令翠（2023）基於馬克思主義實踐論與認識論，聚焦賽珍珠譯《水滸傳》中酒文化元素的翻譯，指出“體”與“認”的緊密結合有助於譯文的忠實、準確和通順。李瑛和楊運傑（2022）從體認語言學的角度分析《許淵沖經典英譯古代詩歌1000首：唐詩》中隱喻英譯的特徵，並強調譯者在處理隱喻時需要考慮體認的普遍性和文化的差異性。胡安江和彭紅豔（2022）對美國詩人Peter Stambler的寒山詩英譯進行了“體認”考察，探究譯者如何在文本交際中實現譯者和譯本的能動性。學者們從不同的文獻和角度探討了“體”與“認”的結合如何影響翻譯的忠實性和準確性，同時也強調了文化和認知差異在翻譯實踐中的重要性。這些研究不僅為體認翻譯理論提供了佐證，也為翻譯實踐提供了有益的指導。

（二）理論框架

本研究將運用體認語言學的研究路徑，以《暮江吟》13篇英語譯文為研究語料，探討翻譯的主觀性和客觀性問題。譯者的翻譯過程與作者的創作過程都是體認活動，原文是作者將生活中所見、所聞、所想（體）經過認知加工機制（認）而形成的作品，譯文則是譯者在對原文依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想識解（體）的基礎上再經認知加工（認）的結果。這與體認語言學對語言形成歸因的解讀不

謀而合，畢竟翻譯語言也屬於語言。體認語言學（賈娟、彭志斌，2020）認為語言的成因歸結為“互動體驗（Interactive Embodiment）”和“認知加工（Cognitive Processing）”，這便是“體認”一詞的來源。這一術語既能體現出語言來自於人們的“生活實踐”；又能反映出語言出自於“心智運作”，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體認說”為翻譯帶來了可能性，由於人們與相同或相似的自然世界和現實世界打交道，因而形成了相當程度的實踐經驗和認知體會的共通共用，從而決定了全世界各民族的語言和思想必有共同之處（孔令翠，2023：20）。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與原作者相似的身體經驗和互動體驗拉近了他們的距離，譯者更能深入體會原作者所要傳達的思想和情感，致力於忠實呈現原文，這一“體”構成了語言、跨文化交流的基礎。也就是說有了“體”，更易於論述語言的客觀性，突出了語言的確來自於生活實踐這一事實。然而，“體”也可與“認”一同解釋翻譯的主觀性。雖然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但不同國家、地區的人們所處的社會與自然環境存在差異，這導致了實踐上的不同，實踐影響人的認知（認），認知（認）接而有了相異之處，最終影響了語言的輸出（本文特指譯文的輸出）。這樣看來，每個人的“認”之於他們自己而言是客觀的，而人與人之間“體”不同而影響的“認”的不同是主觀的。在翻譯過程中，原作者的“體”都是一樣的，這代表每位譯者都在盡力體會原作者的意圖，力求忠實體現原文，但不同譯者的認知方式不同，文本理解存在著主觀性。又由於採用的翻譯方法和策略不盡相同，譯者可通過多種映射和創仿手段發揮譯者主體性，創造性地輸入各種新創結構和資訊，以實現文本的交際目的和譯者的個人目的（胡安江、彭紅豔，2022：298），翻譯過程與結果因而主觀性和客觀性並存。

二、研究語料

儘管前人研究尚未涉及對《暮江吟》英文譯本的深入研究，但這其中所蘊藏的學術魅力與譯文探究的空間富有意義，值得我們細細品味與挖掘。本研究精選了13篇《暮江吟》的英文譯作，源於各大文學名家及翻譯熱衷者之手。唐代傑出的文學家白居易所作的《暮江吟》是一首充滿詩意與深沉情感的七言絕句：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這首詩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其獨特的意境，將讀者帶入一種獨特的審美體驗中。

三、翻譯的客觀性分析

翻譯中的客觀性指譯者需在原作允許的範圍內在譯文中全面地、真實地按照譯語的習慣表述方式和手段，完整地再現原文文本資訊，客觀反映源語文本的主客體之間、客體與客體之間以及它們對應的時空關係（陳卉，高黎平2016）。相對於其他文本類型的翻譯，古詩翻譯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時空分離性。當譯者致力於翻譯前朝前代文學巨匠的作品時，其所面臨的時空背景跨越了數百甚至數千年。因此，譯者所處的歷史背景與原作作者截然不同，這不僅導致了實際體驗（體）的差異，而且影響了認知方式（認）。在翻譯實踐中，譯者應致力於儘量還原原作者的“體”，即恢復原作所反映的主、客觀世界的精髓（孔令翠，2023）。客觀性是翻譯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客觀性，翻譯將無從談起，最終將導致不可譯性（龔莉，2021）。

在細讀唐代文人白居易的《暮江吟》的13個英文譯本後，筆者注意到各譯者都深入體會了原作中所蘊含的豐富內涵。他們努力在譯文中重現了原詩的那種和諧與寧靜的意境。儘管每位譯者對詩歌的理解和表達均有所差異，他們的主要目標都是盡可能忠實地反映原文的本意。例如“半江瑟瑟半江紅”中的“瑟瑟”在此次並不是如“秋風蕭瑟”般的含義，而是夕陽斜照之下，江面波光粼粼，江水受光多的部分呈現一片紅色，受光少的部分依然是深深的碧色（葉慕蘭，2023）。這裡的“瑟瑟”指的是江水原來的顏色“碧色”。我們可以觀察到，13位譯者都成功捕捉到了“瑟瑟”的深層含義。儘管他們所採用的詞彙和句型存在差異，但都是基於對原文忠誠的解讀，符合翻譯客觀性的要求。再例如“可憐九月初三夜”中的“可憐”在此並不是現代漢語中“值得憐憫”的意思，而是指“可愛”或“引人入勝”，即“最惹人憐愛的是九月初三的夜晚”。筆者發現這13個譯者都較為準確地捕捉到了“可憐”的真實含義，雖然他們的解讀深度各異，但都是基於對原文的忠實解讀。關於各個譯者的翻譯差異，我們將在第四部分從主觀性的角度進行深入探討。職業譯者在翻譯文學作品時能深入挖掘原作者的創作背景和意圖，更好地傳達其深層的情感和意境。白居易在西元822年赴杭州任刺史途中創作了《暮江吟》。那時的朝廷深陷政治鬥爭，牛李兩黨爭鬥不休。經歷朝廷的權力鬥爭後，詩人選擇離職，這首詩表達了他放飛自我，心情舒暢的情感。白居易的這種輕鬆暢快的情感融入了詩歌，使得這首詩不僅僅是一首秋天的景色描述，更多地反映了詩人的內心世界。

四、翻譯的主觀性分析

在上述分析中，我們重點討論了翻譯的客觀性，即尊重原文。譯文應準確傳達原作描繪的社會和情感背景，而不是轉化為譯者自己的文化和情感視角。正如黃忠廉（2000：157）所言：“原則上，翻譯只能將原作話語資訊‘脫胎’，而不能‘換骨’”。但在翻譯決策過程中，譯者經常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尤其是社會文化因素。因此，譯者的最終抉擇無疑也只是一種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不受幹預的權利（譚載喜，2004：248）。這意味著，雖然譯者可以基於對原文的理解輸出各種表達方式、視角和態度，展現翻譯的主觀性，但原文始終作為一個客觀存在應當得到尊重。

程平（2021）提出翻譯是一種體驗性、動態性的識解過程。識解作為認知語言學中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人們可用不同方法認識同一事態的能力（Langacker，1987：138）。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深入體驗文本，結合自身的經驗和情感進行理解。文本的情景和語言會在譯者心靈產生“映射”，對文本中具有體驗性的語言和情景的譯者會用自己最熟悉最生動最貼切的目的語語言表達（譚業升，2016）。本節將從識解的角度對翻譯的主觀性予以闡釋。關於識解的內涵，我們選取的識解維度為：轄域和背景、視角、突顯。

（一）轄域和背景

轄域指被啟動的概念內容的配置，至少應包括基體（一個述義所參照的轄域基礎）和側面（被突顯的某一部分），也就是說人們要理解一個運算式的意義或結構需要啟動相關的認知域，而背景指人們理解一個運算式的意義或結構需要相關的百科知識（王明樹、文旭，2009）。要理解《暮江吟》這首詩，譯者不僅需要把自己置於白居易當時具體的歷史語境，而且還應具有相關的百科知識。這一識解因素在《暮江吟》譯文中可體現在對“一道殘陽”的翻譯上。

“一道殘陽”譯文

一道殘陽	總結
A beam of the setting sun	陽：sun, sunset, sunlight, sunbeam, sunray, glow, sunshine
The departing sunbeams	
The sunset glow	
A ray of evening glow	

Reflection of waning sun

A waning sunlight beam

The setting sun

A beam of exhausted sun

The fading strains of sunlight

A fading streak of sunray

Remnant of sunshine

A shaft of sunlight

The setting sunset

殘: waning,

setting, departing,

remnant,

exhausted, fading,

evening

表注：“一道殘陽”譯文來源見參考文獻[1]、[14]、[18-19]、[20-21]、[30-36]、[40]。

詩歌的前兩句描述了夕陽西下的景象，殘陽斜暉投射在江面，勾畫出一個夕陽晚霞相映的美景。在這裡，“殘”和“陽”的英文翻譯各具特色。對於“陽”，其翻譯均大部來源於詞根sun，如 sunset、sunlight、sunbeam 和 sunray 等。這些詞的基本含義相近，但也存在一定的差異。sunset由sun和set兩片語合而成，set作為動詞，當與sun結合時，意指太陽下沉或消失在地平線以下的動作，與這裡的情境最為貼切。而sunlight、sunbeam、sunshine和sunray這幾個詞並未包含這樣的動態資訊。其中，前三者蘊含shining brightly之意，而sunray過於科學化，難以傳達文學的意境，並不與詩中描述的紅日溫柔西沉的場景相契合。從所引的不同翻譯中，有三篇直接使用sunset或setting sun傳達出了原作的動感意蘊，八篇在表意時搭配了富有動態的形容詞如departing、waning、fading、exhausted等詞以示太陽逐漸消失，迎來日落的動態感這樣的翻譯不僅傳達了光線的特性，還加入了時間感，使整個景象更加動人。也有一位譯者（楊自力，2021），創造性的將其翻譯為A shaft of sunlight，這是另一種風格的選擇，這個表達強調了陽光直射或透過雲層的一束光，通常用來形容陽光從某個縫隙中直射下來的情景，比如從雲層或建築物間隙中透出的光線。這種表達帶有一種更為明顯的視覺衝擊感，更適合描述光線明亮、集中的場景，對於“殘陽”這個詞，它傳達的是一種較為溫柔、分散的晚霞，不僅僅是單一的光線。因此，雖然 A shaft of sunlight在英語中是描述陽光的一種生動方式，但可能不完全符合“殘陽”的意蘊。同時，有兩位譯者（吳洲，2020；秦大川，2020）將其譯為glow，在本文中，“殘陽”指夕陽西下時天空中的那抹餘暉，英語中的glow正好可以表達這種溫暖、發光但不刺眼的光。

（二）視角

視角指人們對事物描述的角度涉及到觀察者與事物之間的相對關係，說話人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對同一情境進行概念化（王明樹、文旭，2009）。原詩的視角顯然是受到朝堂中的政治動盪後，自求外任，終是遠離紛爭，沉醉於大自然之中，表達出一種輕鬆暢快的情感。詩歌的前兩句描述了黃昏時的江景，而後兩句描繪了深秋之夜的月光景色。這暗示了詩人從夕陽沉落開始，一直沉浸於這自然美景，直到月亮高懸。這一整體視角都圍繞著詩人——白居易。在外任的路上，白居易悠然漫步江畔，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吸引，留連忘返。在夜幕逐漸降臨，新月出現時，他不禁發出“可憐九月初三夜”。為了更準確地理解和翻譯這首詩，明確這種從詩人角度出發的視角是非常關鍵的。在不同的譯文中，詩篇的視角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在13篇譯文中，共出現了4種獨特的翻譯句式。其中，以白居易的第一人稱作為視角的有4句，已在下表中以粗斜體進行了標注。

“可憐九月初三夜” 翻譯

句式類型	可憐九月初三夜譯文
感歎句	How winsome this third night of the ninth month! <i>How I love</i> the third night of the ninth moon aglow! <i>How I like</i> the ninth lunar month on its third night! What delights on this ninth month and third night!
介詞短語	On the night of the third day of the ninth moon. On the lovely third night of the ninth moon. On this lovely night of September the third. The third night of the ninth moon, <i>oh you know</i> .
形容詞 + is + 賓語	Tender is this third eve of the ninth month. Tender is the third night of lunar September <i>as I know</i> .
主謂賓	Lovely is this night of September the third. This deep autumn day on third of ninth month is lovely. Time is the night of the lunar September 3.

表注：可憐九月初三夜譯文來源見參考文獻[1]、[14]、[18-19]、[20-21]、[30-36]、[40]。

感歎句在語言中常用來表達強烈的情感或感受，在上述的句子中，強調了這一夜晚的特殊美感和作者深刻的情感。詩的後兩句用了比喻的手法，把露珠比作珍珠，既有形狀又有光澤，完美地表達出作者對眼前景物的喜愛之情。把月亮比作彎弓，既把事物寫得生動，又照應了“九月初三夜”，使詩如珍珠般圓潤，美不勝收。全詩用“可憐”二字點出作者內心深處的情思和對大自然的熱愛。日落西山時，涼意襲人的大江之上一片緋紅，月兒彎彎，露珠晶瑩，面對如此美景，任何人都會心生欣喜（張國舉，2010）。通過“how”與“I love/like”的結合，感歎句進一步強調了詩人的主觀情感，使讀者或聽者明確知道這是詩人的真摯情感。此外，感歎句的結構天然具有強調作用，配上“I love”這種情感深厚的表達，使得整個句子更加情感飽滿。*oh you know*在此處作為一個插入語，為句子注入了豐富的情感色彩。儘管詩人沒有明確使用第一人稱，但通過 *you know*，他與讀者之間構建了一個緊密的紐帶和共鳴。這樣的表達方式為詩句帶來了口語的自然和親切感，更顯真摯。如此，讀者可以更深地體會詩人的情感深處和寓意。*as I know*是一個突顯說話人主觀意見或經驗的短語。它傳達了這是說話人的個人觀點或知識，並不一定是普遍接受的事實。通過這種表達方式，詩人與讀者之間建立了一種親密感，仿佛他正在分享一些私人或非公開的資訊。此外，這種用法也為句子帶來了柔和的語氣，暗示這只是詩人的個人感受，可能與其他人有所不同。總的來說，*as I know* 賦予了句子一種深度的主觀性和個性化，同時與讀者建立了一種特殊的聯繫。

（三）突顯

確定注意力的方向和焦點的認知能力，是人作為認知主體具有的能力之一。在很大程度上，語言是認知主體對作為客體的周圍環境進行概念化的表徵，而概念化過程受注意力突顯原則制約。其中圖形/背景組合是突顯的表現形式之一。也就是說，把某一個參與者作為圖形，把另一個不那麼突出的參與者作為背景。對“一道殘陽鋪水中”這一句中“殘陽”與“水”的圖形/背景組合關係進行探討時，我們發現了譯者的不同選擇。部分譯者將焦點放在“殘陽”上進行突顯，而另一些譯者則更多地突顯了“水”，即“江面”。這種選擇性體現了每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如何權衡和解讀原文的不同元素。“殘陽”一詞說明太陽就要落

山，光線幾乎是貼著地平線斜照過來的確實像“鋪”在了江面上。這個“鋪”字寫出了秋天夕陽的柔和、江面的平靜。

“一道殘陽鋪水中” 翻譯

句式	譯文
主動句：描述夕陽在水面上產生的效果。	The departing sunbeams pave a way on the river.
	A ray of evening glow on the water spreads.
	Over the river the setting sun casts its glow.
	The fading strains of sunlight sweep through the water.
	Remnant of sunshine spread over the river.
	A beam of the setting sun turns half the river dark green and the other half red.
	The setting sunset light projected onto the river.
	A fading streak of sunray's upstream spread.
	A shaft of sunlight crafted half of green and half of red in flow.
	Reflection of waning sun paves the surface of water.
	A waning sunlight beam on the water.
	A beam of exhausted sun in the water paved.
	The fading strains of sunlight sweep through the water.
被動句式：描述水面被夕陽光線所覆蓋或所照射。	The river is paved with a belt of rosy hue that is cast by the sunset glow.

表注：一道殘陽鋪水中譯文來源見參考文獻[1]、[14]、[18-19]、[20-21]、[30-36]、[40]。

從所列舉的譯文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兩種不同的句式選擇：12版譯文優選了主動句，1版譯文（吳洲，2020）偏向於被動句。白居易從眾多相似詞中選

用一個最切合情境、最能體現出思想美學境地的“鋪”，更生動活潑，也更確切。在這裡，“鋪”不僅僅描述了一個簡單的動作，它還繪出一幅夕陽如何和諧、均勻地展現在江面之上的美好畫面，使得此句既具有空間感又富有動態。若作者選擇其他動詞，如“映照”、“落入”或“射入”無疑會使表達失去其獨特的魅力和生動感。所以對於此句進行識解翻譯時，一定要突顯出“鋪”的主體，也就是殘陽，而背景是江面。

採用主動句式的譯文，如*departing sunbeams pave a way on the river*，直接強調了“departing sunbeams”作為行動的主體。這樣的表達方式為譯文帶來了動感，讓讀者更直接地感受到夕陽的光線如何在河面上鋪設出一片光芒。它簡練生動，並突顯了動作主體。而被動句的使用讓描述顯得迂回，失去了直接和生動的效果。對於描述夕陽如何為河面帶來美麗景象的句子，被動句結構使其缺乏一種生動、活躍的畫面。其次，文本的可讀性也可能因過多的被動句而降低，從而影響他們對文本內容的深入理解。再者，使用被動句可能會給文本帶來一種正式、官方的語氣，而這在某些語境中可能不太合適。此種正式感可能導致文本失去某種真實、自然的語感，使讀者覺得譯文顯得過於生硬或機械。總之，雖然被動句在某些情境下具有其獨特的優勢，但在翻譯這類描寫性的句子時，譯者應謹慎權衡，以確保譯文既忠實於原文，又具有生動、直接的效果。過度或不當地使用被動句可能會損害文本的情感深度和生動性，使其失去原文的美感和力量。

結論

明代楊慎在其《升庵詩話》中對《暮江吟》的評價深刻而貼切，他指出：“詩有豐韻。言殘陽鋪水，半江之碧，如瑟瑟之色；半江紅，日所映也。”這句評語恰如其分地捕捉了該詩的細膩之美與深沉的情感。《暮江吟》不僅是古代中國文學中的傑出之作，更是翻譯研究的寶貴樣本。本研究涵蓋了13篇英語譯文，並通過體認語言學的視角揭示了翻譯過程中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相互作用和平衡。這種平衡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確保文本的忠實性，同時又為譯者提供了一定的創造性空間。依據體認語言學理論，我們進一步理解了如何使用識解觀和體認說解讀翻譯的主觀性和客觀性。本研究不僅為《暮江吟》的譯文提供了更加豐富和深入的解讀角度，更為翻譯研究和實踐領域帶來新的啟示。

參考文獻

- [1]ALLEY R.. Selected Poem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M].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 [2]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Langacker R. W..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Ronald W. Langacker.[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4]Langacker R. W..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5]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6]Pym, R.. How to choose between translation solutions[J]. YouTube, 2023.
- [7]陳卉, 高黎平. 從語言哲學的視角看翻譯的客觀性與不確定性[J]. 外語學刊, 2016, (04): 24-28.
- [8]程平. 論翻譯的主觀性[J]. 外國語文, 2011,27(03):100-104.
- [9]高文成, 吳超異. 體認語言學視野下《離騷》中文化負載詞的英譯研究[J]. 語言與翻譯, 2021,(02):42-50.
- [10]龔莉. 談文學翻譯的客觀性[J]. 今古文創, 2021,(26):115-116.
- [11]胡安江, 彭紅豔. 美國詩人Peter Stambler寒山詩英譯的“體認”考察[J]. 外語教學與研究, 2022,54(02):298-307+321.
- [12]黃振定. 簡論翻譯的客觀性與主觀性[J]. 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0,(01):50-53.
- [13]賈娟, 彭志斌. 體認語言學:緣起、現狀及前瞻[J]. 外文研究, 2020, 8(03): 31-36+107.
- [14]經典古詩詞英文翻譯48《暮江吟》[EB/OL]. (2022-10-19)[2024-05-08]. <https://edu.iask.sina.com.cn/jy/jQ8ofphEby.html>.
- [15]孔令翠. 實踐論和認識論視域下的賽珍珠《水滸傳》中酒文化翻譯之“體”“認”分析[J]. 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 2023,30(02):18-27+110-111.
- [16]李靖舒. 體認語言學視角下的具身翻譯範式[J]. 遼寧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24(01):53-56.
- [17]李瑛, 楊運傑. 體認語言學視域下的唐詩隱喻英譯特徵研究——以《許淵沖經典英譯古代詩歌1000首:唐詩》為例[J]. 語言教育, 2022,10(02):77-87.

- [18]林炫威. 翻譯: 暮江吟(白居易)[EB/OL]. (2023-01-04)[2024-05-08].
<https://zhuanlan.zhihu.com/p/593495298>.
- [19]《暮江吟》——白居易(中英對譯)[EB/OL]. (2021-10-04)[2024-05-08].
<https://www.lizhi.fm/942772/2899214710240606214>.
- [20]秦大川. 詩歌翻譯[EB/OL]. (2020-06-19)[2024-05-08].
https://www.zhihu.com/column/c_1246957106025873408.
- [21]雙語詩歌翻譯|白居易《暮江吟》[EB/OL]. (2022-10-17)[2024-05-08].
<https://edu.iask.sina.com.cn/jy/hHaN1Xii5m.html>.
- [22]譚業升. 翻譯能力的認知觀:以識解為中心[J]. 中國翻譯, 2016, 37(05): 15-22+128.
- [23]譚載喜. 西方翻譯簡史-第2版[M]. 商務印書館, 2004.
- [24]王明樹, 文旭. “主觀化對等”在翻譯中的應用——以李白詩歌《送友人》英譯為例[J]. 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9,(08):62-65.
- [25]王寅. 認知語言學的“體驗性概念化”對翻譯主客觀性的解釋力——一項基於古詩《楓橋夜泊》40篇英語譯文的研究[J]. 外語教學與研究, 2008,(03):211-217+241.
- [26]王寅. 後現代哲學視野下的體認語言學[J]. 外國語文, 2014,30(06):61-67.
- [27]王寅. 體認語言學視野下的漢語成語英譯——基於《紅樓夢》三個英譯本的對比研究[J]. 中國翻譯, 2019,40(04):156-164+190.
- [28]王寅. 體認翻譯學的理論建構與實踐應用[J]. 中國翻譯, 2021, 42(03): 43- 49 + 191.
- [29]王寅. 漢語體認語法芻議——試論“對稱原則”為漢語最重要的語法手段[J]. 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45(02):1-9.
- [30]王澤南.《半江瑟瑟半江紅》中有幾種顏色?——《暮江吟》英譯[EB/OL]. (2023-01-13)[2024-05-08].https://wenku.baidu.com/view/cab6e26e346baf1ffc4ffe4733687e21af45ff81.html?_wktks_=1715156274064&bdQuery=Over+the+river+the+setting+sun+casts+its+glow%2C+Half+dark+green+and+half+red.
- [31]吾國斯文. 古詩絕句三百首英譯之五十: 暮江吟(白居易)[EB/OL]. (2017-11-14)[2024-05-08]. <https://mp.weixin.qq.com/s/Ddh8dS4KdkcM2d6W70ZMew>.
- [32]吳洲. 半江瑟瑟半江紅, 瑟瑟是顏色——英譯白居易《暮江吟》[EB/OL]. (2020-10-20)[2024-05-08].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6924086>.
- [33]許鈞. 翻譯概論: On translation[M].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9.

- [34]許淵沖.唐詩三百首(中英文對照)[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 2007: 40.
- [35]徐忠傑. 唐詩二百首英譯[M].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
- [36]楊自力. 唯美語句英譯賞析[M]. 天津: 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7.
- [37]葉慕蘭. 《暮江吟》意境與語言藝術解讀[J]. 小學語文教學, 2023,(08):55-56.
- [38]張嬌. 從原型範疇理論和語義場理論解讀中國古詩詞的意象之美——試以白居易的《暮江吟》作個案分析[J]. 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 (01): 20-23.
- [39]張儀. 體認翻譯三層次關聯模式——以2013—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特色辭彙翻譯為例[J]. 樂山師範學院學報, 2023,38(01):56-62.
- [40]趙彥春. 英譯白居易《暮江吟》[EB/OL]. (2019-08-11)[2024-05-08].
https://mp.weixin.qq.com/s/7hgLWUM9iLkIpgVYRS5rog?poc_token=HH0qO2aj4qexKIVpdHh5Am7mUu8Sr1P_WxPuVxA4.
- [41]朱雪蓮. 體與認互動下外宣數字辭彙的英譯研究: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 為例[J]. 安康學院學報, 2023,35(02):104-109.

On the Subjectivity-objectivity in English translating Mu Jiang Y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ZHAO Yibu GONG Yingr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literary work Mu Jiang Yin has become a valuable sample for academic research for its profound meaning and delicate language. This paper takes the 13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Mu Jiang Yin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iming to deeply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and balance between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e study, we reveal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the fidelity of the text while providing room for creativity for the translator.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dimension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of Mu Jiang Yin and valua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Keywords: Subjectivity-objectivity in translation; 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struction; Mu Jiang Yin

後期維特根斯坦家族相似視角下

《韓非子》英譯本對比研究

高潤祥¹ 張濤²

(中國重慶師範大學 馬克思學院 401331; 日本關西大學 外國語教育研究科
5648680)

摘要：以往對後期維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的翻譯觀停留在對於理論性方面探索，卻很少結合翻譯文本進行分析，尤其是具有哲學性的法家典籍作品。鑒於此，本文對比《韓非子》的兩個英譯本對後期維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進行深入闡釋。研究發現：《韓非子》的文字佶屈聱牙，法意古奧深晦，飽蘸中國古代法律語言和法律文化。詞語意義與中國特有文化的通假字、古今字和假借字息息相關。此外，家族相似跨文化延拓與譯者文化身份、譯者的文本解讀密不可分，而這些對探索法家典籍外譯研究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關鍵字：《韓非子》；後期維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詞語意義；家族相似跨文化延拓

¹ 高潤祥，中國重慶師範大學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典籍，中國傳統文化。

² 張濤，通訊作者，日本關西大學外國語教育研究科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ztt502455286@163.com。主要研究方向：法家典籍翻譯，語言哲學，機械翻譯。**基金項目：**中國留學基金委員會公派博士研究生項目（202308500133）；重慶市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重慶高校維族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徑與對策研究”（23SKJD061）。

引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逐漸崛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大大提高，中國文化受到世界範圍內的普遍關注。為了能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體現中國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古代中國法家文化被譯成多語種形式，傳播到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一位哲學家曾作過這樣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經濟是血肉，文化是靈魂”¹。從中表達出文化在社會中的作用——是一種精神力量。然而，中國典籍，尤其是中國法家典籍外譯最被人忽視，因此“需要人們大聲疾呼，維護其‘尊嚴’”²。面對此種情況，中國法家典籍翻譯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追根法家典籍外譯的源頭離不開《商君書》譯介活動。1928年，荷蘭漢學家戴聞達（J.J.L. Duyvendak）英譯本的《商君書》付梓出版，是第一部完整版的法家典籍英譯本，開啟了法家典籍在西方世界的傳播。在其出版發行之後，包括《韓非子》（1939/1959，1964）、《慎子》（1971，2016）、《申子》（1974）、《管子》（1985/1998）、《呂氏春秋》（2000，2005，2010）等一系列法家典籍相繼出版英譯本或其他外譯本。《韓非子》作為法家典籍代表作之一，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法治建設成果。《韓非子》外譯傳播充分展示出中國的文化自信，是中國法家典籍域外影響的重要舉措。沒有翻譯，談文化自信可謂是紙上談兵。法家典籍外譯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談起《韓非子》，它是一部蘊含多維度思想的典籍，不僅具有法家思想的典籍，同時也是與老子思想有關的哲學典籍。哲學典籍所描寫的認識和解剖要以語言來實現。同時，哲學典籍與哲學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韓國學者崔景烈（Choi, Kyeong-yeol）認為，哲學思想對《韓非子》英譯研究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哲學的論題是為了證明普通意義上的可譯性，哲學的原點是翻譯或可譯性論。為了更好研究《韓非子》英譯，需要借助哲學思想，尤其是與翻譯理論息息相關的語言哲學理論。而在諸多語言哲學理論中，後期維特根斯坦意義觀與翻譯理論建構最為密切。因此，本文從後期維特根斯坦意義觀這一理論視角，對廖文奎的《韓非子》英譯本（以下簡稱廖譯本）和伯頓·華茲生的《韓非子》英譯本（以下簡

¹ 張傳開 單傳友 《文化自信的本質及其當代意義》（《教學與研究》2021年第9期第44頁）

² 馬祖毅 《中國翻譯史》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頁。

稱華譯本)進行對比研究,無疑是理論化構建之本,譯事型實踐之衷,綜合性研究之源,以期對《韓非子》英譯研究有些許啟示。

一、後期維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理論與翻譯研究

語言哲學開山之父維特根斯坦在後期提出“意義即有用”這一理念,即“一個詞的含義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¹。這一理念認為語言的意義只有在一定的語境中才能得以實現,研究語言的意義就是研究語言的使用。與此同時,意義在翻譯研究過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環,“因為對語言意義的把握是翻譯理論和實踐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從事雙語轉換的翻譯活動首要的任務是如何準確的把握語言的意義。對於譯者來說,只有遵從規則才能準確把握語詞和語句的意義,進而實現翻譯所要達到的交際目的”²。後期維氏思想指出翻譯就是一場“語言遊戲”。譯者要利用遊戲規則進行翻譯實踐活動。而語言遊戲之間的存在各種相似性,維特根斯坦提出,要把看似迥異的遊戲聯結起來,我們必須尋找“居間”的事例。“詞本無義,義隨人生”³,語言的基本屬性就是人文性,承載人的思維和情感,而這往往“語言遊戲”中所屬的規則範疇。他在後期提出“家族相似性”理論,認為所有詞語的意義都沒有絕對的確定性,原因在於詞語的意義具有遊移性和時空性。語言哲學的核心旨在探討意義。每一次詞語的意義都是當下的,需要結合當下的使用情況去解釋其意義。維氏提出家族相似強調不要一味追求概念的相似性,而要尋求他們之間的聯結關係⁴。此外,譯者往往要考慮譯者自身的“生活形式”。廖文奎和華茲生分別代表中西方譯者,同時《韓非子》飽蘸大量的中華傳統文化法學元素,有一些很難用其他語言表達出來⁵。因此,譯者往往會根據自身的“生活方式”,選取恰當的詞語意義,體現出兩個譯本的詞語意義存在相對確定性及家族相似性。本文為了充分認識到兩位譯者在傳達《韓非子》的“中國元素”所作出的努力,從維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角度出發,旨在更加深層次理解兩個譯本所承載的文化任務。詞語的意義會受到譯者所在國家的文化及當時社會的時代背景等直接經驗的影響,強調在語言的實際使用中語境的功能和作用,

¹ 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 陳嘉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頁。

² 都庭芳《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說”對美國華裔文學翻譯的啟示》(《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第109頁)

³ 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91頁。

⁴ 馬琳《比較哲學中的家族相似概念及其跨文化延拓》(《學術月刊》2016年第7期)。

⁵ 熊德米《古代法律典籍文化異語傳通比較》(《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借由使用賦予詞語意義。

《韓非子》作為三晉法家典籍之一，曆史悠久，飽蘸大量的中華傳統文化的法家思想，導致學者會參考不同的史學資料。因此，《韓非子》有著不少的中文注本，每個中文注本存在差異，原因在於漢字文化博大精深，漢字的家族相似性盤根錯節，對於漢字的引用和闡釋出現偏差。在雙語語際轉換過程中，兩位譯者需要對《韓非子》原文底本進行考證，探究《韓非子》的漢字文獻記錄及掌握《韓非子》文本注疏，盡可能還原其文化風貌和文化特色。人們在研究《韓非子》中文底本時，往往會借助訓詁學的思想。原因在於《韓非子》法家典籍文獻在其傳承過程中，由於社會發展和文明不斷演變，會出現通假字、古今字和假借義釋“本義”字的訓詞現象。這些訓詞現象是否存在其家族相似性值得我們深挖，旨在更好探究漢字的衍變規律，追蹤漢字所承載的文化符號和文化內容，讓其譯文準確還原中國古代典籍文化的思想風貌。

1. 《韓非子》漢語文本中的通假字英譯

通假字是古漢語書面語的用字現象之一，即借用一個讀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來代替另一個字。其中借用的音同或音近的字稱為通假字，而被替代的字稱為本字。從現存的文獻分析，通假字的使用多集中在三晉兩漢時期。《韓非子》成書於戰國末期，通假字現象的存在也就不足為奇了。後期維特根斯坦認為文化是動態而非靜態，因為現在已經進入到紛繁複雜的開放世界。我們研究文化要從機械語言回歸到日常的“生活方式”之中。而家族相似認為，一個家族之中，一個成員總與另一個成員有相似之處，這樣那樣或多或少的相似之處是每個家族中都有的，但並沒有一個相似之處是所有家族成員共有的。譬如，通假字之間不一定是因為它們有共同的本質，而是他們具有相似點，這種相似點不是由一個本質所統帥的相似，而是“家族相似”。本文以《韓非子》通假字為例：

例 1 王先慎版¹：“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

廖譯²：“When ministers impede the sovereign, the sovereign loses his viewpoint. When they control public resources and revenues, he loses his advantages. When they issue decrees at random, he loses his ruling authority. When they distribute personal

¹ 王先慎 《韓非子集注》 中華書局1998年版。

² Liao, W. K. *The Complete Works of Han Fei Tzu* Vol.I.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1939.

favours, he loses his name. When they feed their dependents, he loses his supporters”.

陳奇猷¹：“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

華譯²：“If the ministers shut out the ruler, then he loses the effectiveness of his position. If they control wealth and resources, he loses the means of dispensing bounty to others. If they issue orders as they please, he loses the means of command. If they are able to carry out righteous deeds in their own name, he loses his claim to enlightenment. And if they can build up cliques of their own, he loses his supports”.

廖譯本參考了王先慎注本，他在《韓非子集解》一書中明確解釋道：“幹道本‘名’當作‘明’”，顧廣圻雲：“‘藏本、今本‘明’作‘名’，今據改”。此處能看到中文注本出現了“明”與“名”之爭。廖文奎直接解讀為“名”之義，故此採用“name”的譯法。華譯本參考了陳奇猷《韓非子集釋》，書中明確指出王先慎根據顧廣圻的校改是存在問題的。雖然藏本、今本‘明’當作‘名’，但陳奇猷採用陶鴻慶《讀諸子劄記》之十二《讀韓非子劄記》，該注本解釋道：“‘明’當為‘萌’，本書多以‘萌’為民氓字，失萌與下文黨義正相類。陳奇猷‘明’當為‘萌’，而‘萌’又當為‘民’。故此文曰：‘臣得行義則主失萌。’意思為如果臣子有了名望，那麼君王就不是一個賢明的君王，會失去民心。華譯本按照陳奇猷的校注，把此處的“明”直接翻譯為“enlightenment”，並與上文的“enlightened ruler”（明君）相呼應。認為此處“enlightenment”表示賢明、聖明之意，言外之意就是君王賢明的話，就能得到民心。在古代文獻中，“明”和“名”常常互為通假字。譬如，宋龔明在《中吳紀聞·與妓下火文》說道：“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其實這裏“無明火”就是“無名火”，此處“明”通“名”都表示明辨之義。此外，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序例》說道：“書凡一卷，金易州明醫張元素所著。”班固在《漢書·杜延年傳》說道：“昭帝末，寢疾，征天下名醫。”雖然古代有“名醫”與“明醫”之爭，但是在中國當代社會文化中，人們往往把“名醫”與“明醫”與同義而互為通用。因此，由於現代社會不斷發展，“名”與“明”在現代同屬一個“家族體系”，但僅僅針對某些詞匯是可以互換，有一些詞匯卻不能互換。（例如，“名師”與“明師”——故明師未必是名師，名師也

¹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² Burton, W. *Han Fei Tzu: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864.

未必是明師，名師又可能是明師。）同時由於古代漢字比較訓詁之學，導致“明”與“名”在古代漢字意思某種程度上是相似的但未完全等同。在語碼轉換過程中如何把握原文傳達“名”與“明”之義，譯者需要結合上下文的語境。對比兩個譯文，廖文奎把“名”譯為“name”（名聲），認為君王要在乎自己的名聲。華茲生把“明”譯為“enlightenment”，不僅“明”字面上與“enlightenment”（點明，明亮），同時“明”深層上與“enlightenment”（賢明，聖明，民心）所呼應。雖然廖文奎和華茲生在譯文都體現對民心的關注，但華譯本重點在點名民心的重要性。《孟子·離婁上》一文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這也體現出韓非所繼承的儒家思想，表達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深諳治國之道。廖文奎把其範圍擴大了，用“name”一詞不僅僅是民眾對君王的看法，同時也是對臣子對君王的看法。

例2 王先慎版：“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

廖譯：Likewise, the literati of the present age, when they counsel the lord of men, instead of speaking about methods to attain political order at present, talk about the achievement of political order in the past”.

陳奇猷版：“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

華譯：“Similarly, when the Confucians of the present time counsel rulers, they do not praise those measures which will bring order today, but talk only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men who brought order in the past”.

王先慎和陳奇猷各自在自己書中明確表示“言”與“善”是可以互換的，即“言”與“善”互為通假字，兩個詞能與後面的“語”字相呼應。“善”在文言文中義項特別繁雜。譬如，《荀子·愛國》：“善日善王，善時者霸。”此外“善”為愛惜之義；《鄒忌諷齊王納諫》：“王曰：‘善。’乃下令。”此處“善”表示贊許、同意的應答之義……。因此，“言”與“善”都可以理解為“說”之義，“言”強調以客觀角度說某件事；而“善”則以一種樂觀角度說某件事，強調善與惡的關係是相對的。兩字雖同屬一個家族，卻存在細微的差別，存在家族相似特點。筆者對比廖譯本和華譯本，發現兩位譯者分別用“speak about”和“praise”分別表達“言”與“善”的意義。“言”與“善”在《韓非子·顯學》一文中意義是相似的，但不完全相同。廖譯本譯出“言”的客觀之義，而華譯本譯出“善”應有的情感色彩。華譯本用“praise”表達出“善”字本來存在正向的情感色彩，不僅表達出了“說”的涵義，也體現出“積極”、“正面”的色彩。因此，譯

者發現古代漢字的通假字規律，找到其相似點和發現其不同點，讓譯作更加符合原文所凸顯的哲學思想和情感意味。

2. 《韓非子》漢語文本中的古今字英譯

“古今字”是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由於曆時文獻記錄的問題，“記錄同詞而先後使用了不同形體的一組字，先使用的叫古字，後使用的叫今字，合稱古今字”¹。由於《韓非子》曆史悠久，注本流傳較多，古今字在原本中會反複大量的出現。在進行翻譯研究活動，不應該忽視底本的古今字的研究。

例3 梁啟雄版²：“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

廖譯：“To warn the officials and overawe the people, to rebuke obscenity and danger, and to forbid falsehood and deceit, nothing could match penalty”。

華譯：“For putting fear into the officials, awing the people, wiping out wantonness and sloth, and preventing lies and deception, nothing can compare to penalties”。

廖文奎此處“殆”參考了王先慎注本，他在書中沒有明確解釋“殆”的具體含義。廖文奎進行原文解讀時，把“殆”解讀為大眾最熟悉的危險（danger）之義。華茲生參考梁啟雄注本，書中明確解釋“殆”可以解讀為“怠”，來源參考《論語》中“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³，其中論語“殆”（“danger”）同“怠”（“sloth”），這與《有度》中的“退淫殆”有異曲同工之妙。梳理古代文獻發現，古代漢字中“殆”通“怠”表懈怠之義，但如今“殆”卻衍變為危險之義。這說明古代漢字中“殆”與“怠”同屬於表示“懈怠”之意的“家族”，雖然採用不同漢字卻表達同一層意思，但由於漢字的不斷衍變和發現，慢慢“殆”字出現了不同於“怠”的涵義，這是古代漢字通假字所具備的相似性。因此，譯者要發現漢字的“家族群落”，找到其相似點和不同點，識別古今意思的差別並選用符合原文語境的涵義進行語碼轉換。由於《韓非子》屬於三晉典籍，華譯本比廖譯本對“怠/殆”字的理解與原文所處時代文化內涵相符，讓譯作更加凸顯出法家典籍所蘊含的訓詁之美。

¹ 張青松 關玲 《顏師古<漢書注>“古今字”字際關係略論》。（《阜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版第5期第56頁。）

² 梁啟雄 《韓子淺解》中華書局1960年版。

³ 梁啟雄 《韓子淺解》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1頁。

例 4 陳奇猷版：“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

廖譯：“Thus Tao is omnipresent in all events. So, follow and preserve its decrees and live and die at the right time. Compare the names of different things, and trace the common source of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m”.

華譯：“The Way pervades all affairs below. Therefore examine and obey the decrees of Heaven and live and die at the right time”.

王先慎的注本把“而”字一詞應該理解為“汝”，即“你”的涵義，這與現代漢語對“而”字的解讀是一模一樣的。廖文奎參考了其的注本，將其翻譯為“its decrees”。但陳奇猷的注本把“而命”解讀為“天命”，是受古代篆書對“而”的解讀。在篆書中“天”比作𠂔，與“而”字相似，因此古人常把“天”字解讀為“而”字。故此，“華茲生直接將其譯為“decrees of Heaven”（天命）”¹，這與上文“謹脩所事，待命於天”和下文“為時生死”相呼應。由於漢字的不斷衍變，古代對“而”字的解讀與現代對“而”字的解讀是千差地別。雖然同為一個字，但古今的意義卻完全不同，具有相似性。因此，譯者在進行語碼轉換時，要識別同一個詞古今意義的差別並結合原文語境選用其合適的翻譯對應詞。

3. 《韓非子》漢語文本的假借義釋“本義”英譯

而訓詁學中的假借義釋“本義”是指，用訓釋詞作為假借字時的意義，來解釋被釋詞本身所具有的意義。

例 5 梁啟雄版：“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

廖譯：“Who utters a word creates himself a name; who has an affair creates himself a form. Compare forms and names and see if they are identical. Then the ruler will find nothing to worry about as everything is reduced to its reality”.

華譯：“Those whose duty it is to speak will come forward to name themselves; those whose duty it is to act will produce results. When names and results match, the ruler need do nothing more and the true aspect of all things will be revealed”.

此處的“形”之義，廖譯本參考的王先慎注本，書中沒有對“形”的意義做出具體的闡述；華茲生採用梁啟雄的注本。該書解釋道，廣雅釋詁：“‘形’，見

¹ 孫亞鵬 《〈韓非子〉英譯本的注釋研究》（《漢學研究》2019年第2期第502頁）。

也，即‘表現’”¹。但“見”本無“表現”之義。《說文解字》：“見，視也。”“見”本義是指“看見”之義”。但是，《毛遂自薦》一文中指出：“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此處“見”同“現”，有“顯現”和“表現”之義。可見，“形”可以通過“見”字進行假借義釋。因此，“形”字與“見”字進行假借義釋，存在家族相似的特點。雖然“形”字和“見”字不能完全同等，但能語境合適的情況下進行假借義釋，能夠通過多維訓釋角度對中國典籍的思想進行解讀。譯者廖文奎把此處“形”翻譯為“form”，乃“形式”之義；而華茲生採用“形”的假借義釋“見”字，將其翻譯為“result”，乃“表現”之義。由此，能發現假借義釋對譯者的選詞造成影響。華茲生放棄陳奇猷的注本對“形”的看法，採用梁啟雄對“形”的看法，打破過分拘泥於“形=形式”之說，以一種新的視角進行解讀和翻譯，這何嘗不是一種“創造性再生”的翻譯實踐思維。

例6 陳奇猷版：“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

廖譯：“If rewards are bestowed according to mere reputation, and punishments are inflicted according to mere defamation, then men who love rewards and hate punishments will discard the law of the public and practise self-seeking tricks and associate for wicked purposes”。

華譯：“If rewards are handed out on the basis of good respect alone, and punishments on the basis of slander, then men who covet rewards and fear punishment will abando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pursue only private schemes, banding regulation to further each other’s interests”。

王先慎在書中指出，“行”字可以當做“法”字²，“公行”直接解讀為“公法”。但是，陳奇猷在書中指出王先慎把“行”字當作“法”是不正確的。他認為“行”應該理解為“道度”的意義。陳奇猷借用《管子·明法篇》：“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此處把“公道”和可以當做“公行”³，進一步解釋自己如此理解的緣由。可見，“行”可以通過“道”字進行假借義釋，但“行”是否可以解讀為“法”字，需要借助假借義釋，這樣的解讀才能做成順理，有憑有據。可見，“行”和“道”具有家族相似性特點。

¹ 梁啟雄 《韓子淺解》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8頁。

² 王先慎 《韓非子集注》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3頁。

³ 陳奇猷 《韓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頁。

雖不能完全同等，但能根據語境進行假借義釋，對中國古代典籍進行解讀。譯者華茲生把“公行”翻譯為“the public interest”，把此處“行”假借的“道”之義翻譯為“interest”，或許是華茲生認為，“公道”不同於其他“道”，不能隨便解讀為“public way”。王充《論衡·說日篇》：“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大致意思人世間的是是非非由大家討論，人們心裏很清楚是公道的內涵，即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因此，華茲生認為“公行”，即“公道”之說在於“人心”，因此翻譯為“the public interest”，更能體現出法家典籍的法治哲學思想。

根據以上例句，解釋通假字、古今字和假借義釋“本義”字存在其家族相似性的特點。譯者需要清楚這些詞類的家族相似特點，了解背後所承載的文化現象和文化知識，譯文才能更好還原中國典籍的思想內核，更好以他語形式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華文化精神。每位譯者對中國古代典籍進行廣泛的參校及參證（語義及行文的真偽判斷、是否判斷及勘疏辨析）之後，注本對其通假字、古今字和假借義釋“本義”字的理解也有存在偏差，導致譯者對於中典籍的詞語意義理解和闡釋就會發生偏差，干擾譯者的意義轉碼的判斷，呈現出的譯文也是有差異的。因此，對這些此類詞匯的認識和把握越清晰、越準確、越深刻、越周密、越完美，那麼呈現出的譯文就更具說服力。

三、《韓非子》英譯之跨文化家族相似思想解讀

為了探究“聯結關係”不僅要立足於本國文化，同時也要立足於他國文化的“生活方式”。要立足於本國文化討論家族相似性，需要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曆史，尤其是漢字的演變規律和詞語闡釋。而要立足於他國文化，需要借助家族相似的跨文化延拓概念。家族相似的跨文化延拓是指在傳統和相異語言之間解釋和拓展家族相似，讓譯者更好詮釋自身所翻譯構建的文本。因此，沒有家族相似的跨文化延拓，我們就很難從事跨文化交流、翻譯與比較。

此外，廖文奎和華茲生分別代表中西方譯者，兩位譯者在進行語碼轉換時，會採用不同的中文注本來解讀《韓非子》，同時譯者有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相同漢字語碼轉換受到自身國家的文化影響，最終呈現譯本也是存在不同。因此，本文旨在探討《韓非子》譯文中所蘊含的家族相似性特點，是跨文化交流的情景中分析和闡釋本國文化及他國生活方式家族相似的重要法寶，是認識到廖文奎和華茲生在傳達《韓非子》的“法家元素”的重要基礎，是了解兩個譯本所承載的文化任務的重要方法。

所謂家族相似概念的跨文化延拓：“來自相異文化的概念可以通過延展詮釋者本土文化的家族相似概念而加以理解”¹。在翻譯學的角度來看，譯者對同一個詞語進行語碼轉換，我們仍然可以辨認出它們之間的相似性。而這種相似性往往會隨著語境的變化——譯者文化身份、所處社會語境及文本語境解讀，出現各種各樣的相似性。因此，本節通過比較不同譯者文化身份及文本語境解讀兩個方面，探討《韓非子》典籍中同一漢字在語碼轉換過程中出現的差異，來展示家族相似概念的跨文化延拓，是值得討論和分析的。

（一）譯者文化身份

廖文奎出生於中國福建，自幼接受中國文化教育，有著紮實的中國國學根基。作為中國本土譯者，他在翻譯過程中旨在還原中國文化的風貌，讓中華文化“走出去”。此外，他比西方譯者更容易理解《韓非子》原文文本的中國文化詞匯的內涵，秉持著類似於取外來之觀念與中國固有材料之相互參證的翻譯理念²，基本上很少會出現錯譯和漏譯的情況，這十分難能可貴。華茲生出生在美國紐約州，從小就特別喜愛東亞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因此，他申請攻讀哥倫比亞大學的本科中文系。讀書期間，英國傳教士陳義全（Rev. A. Lutley）教授教授漢語課程，更加激發對中國國學學習的熱情。本科畢業後，他繼續攻讀哥倫比亞大學的中文系研究生，畢業論文以自己翻譯的《史記》和《漢學》中相關的“遊俠”思考。最後，他接受福特基金會的支持，於1956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博士學位。此外，他的翻譯思想深受王際真（Chi-Chen Wang, 1899-2001）老師的教誨，翻譯主張譯文不僅要做到語義準確，還要在英語文風上做到賞心悅目、行文流暢。華茲生的漢學教育背景與研究經歷為他今後從事中國法學、哲學、史學、詩歌等典籍英譯研究打下了基礎。

《韓非子》不僅蘊含法家思想，而且也蘊含老子的道家思想。因此，《韓非子》原文的詞語意義有一部分來源於老子的道家思想。華茲生在節選章節進行翻譯時，把《主道》放在第一篇，也能看出“道”的重要性。但是，“道”的含義是複雜。將“道”譯為他語，十分考驗譯者自身文化和翻譯功底。下文將列舉出廖譯本和華譯本對“道”的譯法。

例7 王先慎版：“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

¹ 馬琳 《比較哲學中的家族相似概念及其跨文化延拓》（《學術月刊》2016年第7期第22頁）。

² 孫亞鵬 《〈韓非子〉英譯本的注釋研究》（《漢學研究》2019年第2期第529頁）。

廖譯：“Tao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myriad things, the standard of right and wrong”.

華譯：“The Way is the beginning of all beings and the measure of right and wrong”.

廖文奎對“道”字的理解來源於老子的《道德經》對“道”字的理解，即“道”是宇宙生成和演化的重要基礎。由此，廖文奎將其翻譯成“Tao”。然而，華茲生把“道”譯成“The Way”，主要是受到傳教士與基督教文化的影響，他讀本科期間的中文課程基本上是由英國傳教士陳義全教授進行授課。《聖經》作為基督傳教士的必讀經典書籍，書中明確把“Way”定義為“基督所指引的救贖之路”¹，華茲生對“The Way”的理解或許來源於此。可見，“道”與“Tao”與“The Way”存在家族相似性，但是“道”與“Tao”與“The Way”是有區別的。“Tao”代表著道家的思想意志，“The Way”代表著傳教士的思想意志。廖文奎放棄了西化的傳教士的譯法，站在中國道家傳統文化立場上，表現出了對本國文化的理解與尊重。華茲生對“道”的理解受西方傳教士影響，對漢字的理解有時會受到自己國家文化的影響。這表明了譯者進行語碼轉換的意義包含譯者隱含的文化觀和價值觀，往往是為文化傳播服務的。

（二）文本語境

文本語言環境對詞語闡釋和理解也是存在重要的影響。由於同一個漢字會有下屬各種語義關係，譯者去理解原文會存在差異，呈現出譯文也會略顯不同。因此，對原文文本的詞語意義理解和闡釋會發生些許偏差。

例 8 陳奇猷版：“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

廖譯：“The right way to be the sovereign is to make all ministers understand the reasons why they are blamed for giving opinions and why they are blamed for not giving opinions”.

華譯：“The way of the ruler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ministers are called to account for the words they speak and are also called to account for the words they fail to speak”.

同一個漢字“責”，廖譯本結合語境將此處的“責”翻譯為“blame”（咎於、責怪於）帶有負面情緒的意義。而華譯本翻譯為“account”（對其負責）帶有正面

¹ 陳晞 蔣曉華《“道”不同，亦相為謀——基於語料庫的第一個〈莊子〉英譯本中“道”的翻譯》（《外語與翻譯》2022第1期第6頁）。

情緒的意義。“責”字在中國顧問語境下，讀者很難讀出原作者想表達出的情感傾向。往往高水平的譯者會發揮主體性進行翻譯創作，在所屬家族詞匯中選取對應他語形式，會產生了相近或者截然相反的情感涵義，是譯者再創造能力的體現。詞語的他語意義會根據譯者自身對原文的語境進行推理判斷，往往會對原文語境情感色彩的理解出現偏移，但都隸屬於同一家族範疇的詞匯，體現跨文化家族相似性對譯者行為規範的形象。雖然廖譯本和華譯本的情感意義發生了偏差，但卻在同一家族詞匯的限度裏，是結合語言語境進行對“責”字的翻譯思考。後期維氏表示對詞語的意義要保持一種相對確定性的態度，因為翻譯不是一味追求一種非此即彼的理想狀態，而是追求相對確定的理想狀態，也能看出家族相似和意義相對確定性是相互相成，互為補充。

四、結語

語言哲學是翻譯研究的源頭之一，其內容博大精深、奧妙無窮，值得我們研精覃思。本文從後期維特根斯坦“家族相似”視角出發，對《韓非子》兩個英譯本進行探討。《韓非子》作為中國哲學性質的三晉法家典籍代表作之一，蘊含著大量的中國古代法家語言和法家文化，包含通假字、古今字和假借字，都存在“家族相似性”，對譯者理解和闡釋原文思想造成影響。此外，同一個詞語根據譯者文化身份、所處時代背景及文本語境進行語碼轉換，存在“跨文化”的生活方式家族相似性，同一個詞語本語意義和他語意義或許會發生變化，是譯者體現自我價值觀和審美觀的重要體現。

參考文獻

- [1]. 陳奇猷 韓非子新校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 月。
- [2]. 陳晞，蔣曉華.“道”不同，亦相為謀——基於語料庫的第一個《莊子》英譯本中“道”的翻譯 [J] 外語與翻譯，2022 第 1 期，第 1-7+98 頁。
- [3]. 都庭芳 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說”對美國華裔文學翻譯的啟示 [J] 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第 5 期，第 108-112 頁。
- [4]. 梁啟雄 韓子淺解 [M] 北京：中華書局，1960。
- [5]. 劉宓慶 翻譯與語言哲學 [M] 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1 月。
- [6]. 馬琳 比較哲學中的家族相似概念及其跨文化延拓 [J] 學術月刊，2016 年第

七期，第 20-30 頁。

[7]. 馬祖毅 中國翻譯史(上) [M]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9 月。

[8]. 孫亞鵬 《韓非子》英譯本的注釋研究 [J] 漢學研究，2019 第 2 期，第 500-509 頁。

[9]. 王先慎 韓非子集注 [M] 北京：中華書局，1998.7 月。

[10]. 維特根斯坦 哲學研究 [M] 陳嘉映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 月。

[11]. 熊德米 古代法律典籍文化異語傳通比較 [J] 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8 第 5 期，第 13-21 頁。

[12]. 張傳開，單傳友 文化自信的本質及其當代意義 [J] 教學與研究，2021 第 9 期，第 41-47 頁。

[13]. 張青松，關玲 顏師古<漢書注>“古今字”字際關係略論 [J] 阜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版第5期，第56頁。）

[14]. Burton, W. (1964). *Han Fei Tzu: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 1964.

[15]. Choi, K. Y Review on the translation of *Han Fei Tzu*.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s Education in Korea* [J] 2007(1), 433-455.

[16]. Liao, W. K. *The Complete Works of Han Fei Tzu Vol.I*.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M] 1939.

[17]. Liao, W. K. *The Complete Works of Han Fei Tzu Vol.II*. London:Arthur Probsthain [M] 1959.

A Study of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Han Fei Tzu*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ter Wittgenstein's Family Resemblance

Abstract: The later Wittgenstein's family resemblance was stuck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oretical aspect, but it combines with translation works seldom, especially legalism-school classics. Comparing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Han Fei Tzu* provides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ter Wittgenstein's family resemblance. *Han Fei Tzu* exists as an incomprehensible expression and is drenched in Chinese legalism-school culture and exegetical thought. The meaning of words is related to interchangeable characters, ancient and modern characters and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under the Chinese culture. In addition, the influence factor of cross-cultural extension of family resemblance depends on translator's cultural identity and translator's textual interpretation, which offers a revelation for future explorations of English version studies of legalism-school classics.

Key Words: Han Fei Tzu, Later Wittgenstein, Family resemblance, the meaning of words, Cross-cultural extension of family resemblance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Lu Xin

(Fuzhou University of Business and Industry)

Abstract: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come a treasure in the world's literary house due to its beauty in language, image, form, and technique. However, Chinese literature is still weak, and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contradicts the general trend, transferring from a weak to a strong culture. Chinese classical martial arts novels face translation,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bstacles when "going global". On the contrary, online martial arts novels are warmly welcomed by readers from regions such as North America, Western Europe,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It shows that the ecological output of Chinese online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has taken a solid step forward. To enhance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effects of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the author feels it essential to consider the following three elements: translation subjects with dual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bilingual abilities, translation object that fits the acceptance level of overseas audiences and diversified and multimod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Chinese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going global

1. Introduction

Since the 1950s,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ttempted to "go global". In 1951, the English ver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was founded, and in 1964, the French ver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was published. Many excellent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ork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were translated and disseminated, but the results were undesirable. Projects such as the Popular Library Project (1995), External Promotion Program of Chinese Book (2006), and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Project of Chinese Cultural Works (2009) all carry the hope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into the world, but their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e abroad have

not been satisfactory(Wang Hong, 2012:10). China has introduced a wide variety of foreign language books, but the “going glob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rare; the trade deficit of Chinese book imports and exports is about 10:1(Bao Xiaojing, 2015:16). Unlike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favor traditional classic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or its entertainment and popularity, such as Mo Yan’s *Red Sorghum Family*, Liu Cixin’s *Three Body Problem*, Mai Jia’s *Decoded*, Yu Hua’s *To Live*, and Bi Feiyu’s *The Moon Opera*. These best-selling English versions give Western readers a more creative and diverse perspective on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gun to spread overseas through translation, but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s still very limited.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face many problems, such as a lack of excellent translators, a single form of dissemination, poor publishing channels, and unsatisfactory dissemination effects(Hu Kaibao, etc. 2023:37). Martial arts novel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ese popular novel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classic martial arts novels and online martial arts novels continue to extend and develop outward. This article analyzes martial arts texts’ translation mode and dissemination status to inspire Chinese literature to “go global”.

2. “Going global” status quo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2.1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lassical martial arts novels

Martial arts (*Wuxia*) novels consist of two elements: “*wu*” and “*xia*”, with content centered around martial arts and *xiashi* (chivalrous perso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s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newspaper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both the original and translated works were popular, especially those of Jin Yong, Liang Yusheng, and Gu Long.

When it comes to *Wuxia* novels,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to mind is Jin Yong’s novels. Jin Yong i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martial arts field, creating a new school of martial arts novels. His works boast large quantity, high quality, vivid description, unique form, and subtle plot, showing the character and chivalrous spirit of the hero. In 1996, Lingna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ld a special seminar on the translation

of Jin Yong's works, marking the official beginning of the translation research of Jin Yong's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In 1997, a paper collection titled *The Question of Reception: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which included papers by translators like John Minford and Lawrence Wong, and other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In 2006, Chen Gang published an article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of Jin Yong's novels in China's mainland. So far, 129 papers can be found on the CNKI platform, mainly discussing disseminating Jin Yong's novel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ir translation into different languages.

Martial arts novels have triggered a boom i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but their path to going global is full of challenges. In 1967,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 Liu Ruoyu published the monograph *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which presen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Western rea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for the first time.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the 1990s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martial arts novels truly began. There are seven officially-published martial arts novels: ① *Blades from the Willows* (translated by Robert Chard, 1991), ② *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 (translated by Olivia Mok, 1993), ③ *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 The Adventures of a Chinese Trickster* (translated by John Minford, 1997), ④ *The Seven Heroes and Five Gallants* (translated by Song Shouquan, 1997)/ *Tales of Magistrate Bao and His Valiant Lieutenants* (translated by Susan Blader, 1998), ⑤ *The Eleventh Son: A Novel of Martial Arts and Tangled Love* (translated by Rebecca S. Tai, 2004), ⑥ *The Book and The Sword* (translated by Graham Earnshaw, 2005), ⑦ *The Legend of the Condor Heroes -- A Hero Born, A Bond Undone, A Snake Lies Waiting, A Heart Divided* (translated by Anna Holmwood and Gigi Chang, 2018-2021). In addition, due to the lack of official publications, domestic martial arts enthusiasts spontaneously translated Jin Yong's martial arts novels into English on online platforms like wuxiasociety.com and spcnet.tv2, promoting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However,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ng English versions of Chinese classic martial arts novels overseas still face numerous obstacles, and the reader's acceptance is not very high either. Ji Jin, a scholar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o-foreign literature, once pointed out, "It is not easy for any foreign literature to open up the

market in the West (especial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center)". Due to the significant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estern readers fail to appreciate the cultural charm and martial arts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s. In addition, Western readers have long held deep-rooted prejudices against Chinese literature. British sinologist Julia Lovell once said, "Western readers generally regard Chinese literature as political preaching" (Wu Yun et al. 2012:90).

2.2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online martial arts novels

In contrast to the hindered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martial arts novels, online martial arts novels have gained wide popularity in North America since 2015 and quickly swept the world. Nowadays,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websites dedicated to translating Chinese online articles, among which the most influential are Wuxia World, Gravity Tales, Volare Novels, Paper Republic, Novel Updates, Xiaxianworld, 17K, Chinavel.net, Spcnet. In 2017, Webnovel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lead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online novels to go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2017 White Paper on China Online Literature Going Abroad*, overseas readers of translated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have exceeded 7 million, and in terms of total readership, the top five regions are the United States, Brazil, India, Canada, and Indonesia; the potential readers in Europe and America will exceed 500 million. According to the *2020 White Pap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Literature Going Abroad*, by the end of 2019, China had exported more than 10,000 online literature works overseas(of which 72% were translated overseas), covering more than 4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Foreign readers highly seek Chinese online martial arts novels on multiple overseas translation websites. Taking Wuxia World as an example, the website publishes more than 60 English versions of martial arts novels (29 completed, 35 serialized), providing a high-quality platform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readers who love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Founded by Chinese-American Lai Jingping (net name: Ren Woxing/RWX) in December 2014, Wuxia World mainly translated fantasy and *xianxia* (immortal and chivalrous) novels. According to Alexa Global Ranking, the website has ranked among the top 1000 globally, with over 200000 visitors and

around 3 million daily page views, making it highly influential. Readers come from more than 9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orldwide, with the top five countries be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Canada, and India.

The success of Wuxia World has also driven the flourishing of similar websites, and many website creators are fans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s like RWX. In the early stages, they spontaneously organized free translation, and after a period of exploration, they gradually matured and formed a profit model of “payment—updating translation—attracting more readers—payment”(Ji Yunfei, 2016:113). Nowadays, foreign readers actively request updates and even spontaneously “reward” translators for updates. Online literary works also have great market potential. The copyright of online literary works has begun to be sold abroad, and many of them have been adapted into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nd even transformed into derivative products such as games and garage kits.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has the potential to develop into one of the three major Asian cultural industries, alongside Japanese animation and Korean dramas(Dong Ziming et al. 2016:40). This indicates that online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is drawing more and more overseas readers and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to go global.

3. Translation mode 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martial arts texts

The “going global” model of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should include the translation subject, translation object, translation strategy, target-reader, and translation effect(Wu Xiabin, 2019:3). In the face of the Western dominant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translation mode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and optimize translation effects. Besides, priority must be given to issues such as translation subjects, objects, and strategies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effect.

3.1 Translation subject

Translation subject focuses on “who translates”, i.e., translators. Translators should act as intermediaries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or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author, editor, and sponsor(Pym, 2012: 31). If

translators enjoy higher social identity, popularity, and credibility, the translation effect should be better.

There are three main types of translation subjects in Chinese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foreign sinologists, overseas Chinese, and local Chinese translators. As mentioned above, the main translators of classic martial arts novels include sinologists John Minford and Graham Earnshaw, overseas translators Anna Holmwood and Rebecca S. Tai, and Chinese translators Song Shouquan and Zhang Jing. Representative translators of online martial arts novels include Chinese American Lai Jingping(founder of Wuxia World, representative translated works: *Coiling Dragon*, *I Shall Seal the Heavens* and *The Desolate Era*), Chinese American Richard Kong(founder of Gravity Tales, representative translated works: *Battle Through the Heavens* and *The Devil's Heaven*), Taiwanese Etvolare(founder of Volare novels, representative translated works: *The Three Realms* and *Great Demon King*). It can be seen that Western sinologists and local Chinese translators mainly undertake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martial arts novels. However, online martial arts novels have explored a brand-new translation subject model consisting largely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translation teams with strong bilingual proficiency and affection for “martial arts culture”, supplemented by some translators who have transformed from Western readers who love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Hu Anjiang believes that the ideal translator model for promo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go global” can follow Howard Goldblatt(Ge Haowen), chief Western translat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endowing with “Chinese experience, Chinese talent, sinology background, and Chinese affection” (Hu Anjiang, 2010: 12). Richard Kong proposed that copyright and translation quality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Chinese online novels to go global. RWX also mentioned that translator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the target language have a higher acceptance of their translations. We build a translation team with Chinese proficiency,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English; besides, we regularly train and assess translators.

In summary, translators with dual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bilingual ability are important for Chinese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to go global. The translator must be

familiar with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understand the reading habit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and have relevant translation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ability towards th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3.2 Translation object

Translation object focuses on “what to translate”, i.e., the selection of works. Goldblatt once said,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ranslation is selection, not translation. The principle of ‘selection outweighs translation’ can ensure the acceptability, ultimate dissemination, and actual influence of the finished product to the greatest extent” (Hu Anjiang, 2010:13). Liu Yi also believes that translated works should have at least two elements: ‘universal value’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u Yi, 2012: 33).

The “*Xiayi*(chivalrous) spiri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s is relatively consistent with the “heroism” of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ose classical works are rooted in the soi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ich in profound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high artistic value, containing abundant cultural, historical and religious background knowledge, which cause great obstacles for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Mok explained, “Due to the cultural hegemony of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over the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the transmission of martial arts culture is blocked in the West (Mok, 2001: 87)”. RWX said that choosing original text is like seeking gold in the sand, those works that have won market recognition were our first choice.”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s boast “Wuxia elements”, while these elements are the reason why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tial arts novels is hindered. In contrast to classics, online martial arts novels are similar to Western fantasy stories, which are more acceptable to reader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us, the most critical thing for translating martial arts novels is “what to translate”. Readers will favor successfully selected works more, while disseminating unsatisfactory original works might be blocked.

3.3 Translation strategy

In addition to the issues of “who translates” and “what to translate”, it is necessary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for whom to translate” and “how to translate”. Sinologist McDougall mentioned that target readers of translated work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re likely to be English readers who enjoy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readers who learn English, and those ‘fair read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dability or writing style of the work rather than the content(Mcdougall, 2007:23). Newmark believed that when translating, communicative domestication is more suitable than semantic foreignization, the effect of translated text exerted on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should be similar to the effect of original text exerted on the source language readers (Newmark, 1991:36).

By analyzing the audience data of Wuxia World, Gravity Tales, and Volare Novels, the three mainstream online martial arts novel translation website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male readers outweigh female reader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most of them come from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Indi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Philippines. For overseas readers, martial arts novels are full of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rtial arts scenes, creating a strong sense of strangeness. If foreignization strategies are blindly adopted to promote martial arts culture, it will inevitably hinder overseas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and discourage their interest,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ranslation of martial arts text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readers’ acceptance and appreciation, then stimulate the interest of foreign readers in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Therefore, translators must use multimod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balance the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and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ranslated work. Translators should prioritize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ading habits, reading expectations of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and potential translation effects, then accordingly adjust the translation content and strategies. For example, the translator restores the original martial arts movements and moves but simplifies the martial arts scenes, which weakens the original language’s strangeness and improves the reader’s reading experience and anticipation of Chinese kungfu. Although this results in the loss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image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 translation gaining recognition or response from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is a successful work. In addition, online martial arts novel translators can adjus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comments and readers' feedback on the forum, pushing the spreading of online literature overseas.

In summary, in order to produce a readable and acceptable version, the translation of both classic and online martial arts novel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adopt various translation methods, appropriately adopting domestic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free translation, omission, and cultural substitution, and supplementing by foreigniz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transliter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annotation. As Venuti said, "The translator should make his translation appear 'natural' as if it had not been translated"(Venuti, 2004:5).

4. Conclusion

Translation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classics to successfully "enter" the world's literary treasure trove. Chinese literature is temporarily in a disadvantaged posi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t cannot be achieved overnight, nor is it a one-time solu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and few Westerners can read and understand Chinese literary works. Besides, as most Westerners still cannot understand the "*Jianghu*" world, the translated works of martial arts novels are still not very popular overseas.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must face the cultural gap: fully consider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recipient, and cannot unthinkingly export culture; fully consider the acceptance and needs of readers, and absorbing readers from different levels to the maximum extent(Xie Tianzhen, 2013: 12).

The successful dissemination of online martial arts novels can bring enlightenment for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ry works, such as selecting translation subjects, objects, and strategies. The popularity of translated works of online martial art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choosing overseas Chinese translators who love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and possess bilingual abilities, choosing translated works based on readers' reading interests, and adjust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imely according to readers' responses in the forum. It is essential to seize the great opportunity of the online literature market,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more excellent martial arts novels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ks into the

English world, and expand their global influence to drive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 literary works and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References

- [1] Mcdougall, Bonnie.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Pleasure Principle[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07(3): 22-26.
- [2] Mok, Olivia. Translational Migration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East and West[J]. *Target*, 2001(1): 81-102.
- [3] Newmark, Peter. *About Translation*[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1.
- [4] Pym, Anthony. *On Translator Ethics: Principles for Mediation Between Cultures*[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 [5]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6] 鮑曉英. 中國文學“走出去”譯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譯美國作品譯介為例[D]. 上海: 上海外國語大學, 2014.
- [7] 董子銘, 劉肖. 網絡文學產業融合發展的三個維度與思考[J]. 出版發行研究, 2016(08): 39-42.
- [8] 胡安江. 中國文學“走出去”之譯者模式及翻譯策略研究——以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為例[J]. 中國翻譯, 2010(6): 10-15.
- [9] 胡開寶, 李翼. 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英譯對外傳播: 現狀、問題與對策[J]. 英語研究, 2023(1): 35-46.
- [10] 吉雲飛. “征服北美, 走向世界”: 老外為什麼愛看中國網絡小說? [J]. 文藝理論與批評, 2016(6): 112-120.
- [11] 劉意. 從莫言獲獎談跨文化傳播的符號塑造與路徑選擇[J]. 中國報業, 2012(10): 33-35.
- [12] 王宏. 中國典籍英譯: 成績、問題與對策[J]. 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 2012(3): 9-14.
- [13] 吳霞鑫. 傳播學視域下中國文學“走出去”譯介模式研究[J]. 課程教育研究, 2019(15): 3-4.

[14] 吳贊, 顧憶青. 困境與出路: 中國當代文學譯介探討[J]. 中國外語, 2012(05): 90-95.

[15] 謝天振. 譯介學[M] 南京: 譯林出版社, 2013.

中國武俠文學的對外譯介和國際傳播

盧欣

（福州工商學院文法學院）

摘要：歷經數千年，中國文學以其語言之美、意境之美、體式之美、技巧之美而成爲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但是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仍是由弱勢文化向強勢文化的逆勢行爲。中國經典武俠作品“走出去”面臨著譯介、出版、傳播等層層障礙。相較而言，網絡武俠作品受到北美、西歐、東南亞、澳洲等各個地區讀者的追捧，這表明，中國網絡武俠文學生態輸出已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兼具雙重文化背景和雙語能力的譯介主體、契合海外受衆接受程度的譯介客體和多元化、多模態的譯介策略是提升武俠文學譯介和傳播效果三大要素。

關鍵詞：中國武俠文學；對外譯介；國際傳播；走出去

Yan Fu and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by MA Yong¹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by SUN Jicheng²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nlightenment thinkers in modern China, Yan Fu contributed to the Chinese people one of the modern Western academic concepts of “evolut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he constantly made full use of his Western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o translate important works in various western modern disciplines, thus paid the wa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modern academy with these valuable resources. Many branches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disciplines, such as politics, law, economics, logic, and so on, if we trace their origin in China, almost all of them were related to Yan Fu’s initial introduction.

Yan Fu’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academic classics of the modern Western disciplines were closely derived from his academic interest and Western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owever, when we carefully discussed his external background of these achievements, we found that his work was again the product of the system of the institution he was attached; more specifically, it had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nslation Bureau,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Therefore, an exploratory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Yan Fu and the Translation Bureau is likely to be one of the noteworthy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Yan Fu.

I

We know that Yan Fu’s translation of Thomas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had been done before the 1898 (WuXu) Reform Movement.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reform movement, which changed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Yan Fu himself

¹ **The author:** Professor MA Yong, a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² **The translator:** SUN Ji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China. Email: jichengsun@pku.org.cn; Cellphone: 138-69371653.

had changed his reading interest, and gradually shifted to focus on the western classics' translation.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Yan Fu first fled to Tianjin and worked as a teacher, and soon, due to an outbreak of the Boxers' Uprising, he was forced to leave for Shanghai from Tianjin's North Sea Naval College, which he had serviced for 20 years. Yan Fu had lived in Shanghai for some time, and in 1901, he went to the North again and became superintendent at the Translation Bureau, which had a strong official background.

Translation Bureau belonged to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to which Yan Fu initially had a special relationship.

As "the unique souvenir" of the 1898 (Wuxu) Reform Movement,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finally survived after 1898. However, in 1900, Boxers launched attacks against "foreign schools", and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was first occupied by the Boxers and was set as their altar; later, while the Western powers' allied forces invaded the city of 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was regarded as a stronghold of the Boxers and was occupied again and destroyed by the conquerors. As a result, the school was forced to close,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displaced, school buildings were destroyed, and books and instruments were almost gone. Until the end of 1901, the Qing government had ordered to discuss restoring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and in early 1902, Zhang Baixi was appointed Minister of Education to organize the school.

After Zhang Baixi took over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he invited the famous scholar Wu Rulun as imperial university teaching superintendent-in-general to whom Yan Fu was on good terms, and later Wu's appointment was approv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However, Wu Rulun declined the offer by saying his return to his hometown as an excuse, "Wu declined the offer several times even though Zhang Baixi paid several visits to his house in person and tried to persuade him to accept the position. "Wu remained unchanged in his determination" ¹.

¹ Yan Fu. Letters to Zhang Yuanji, In *Works of Yan Fu*, edited by Wang Shi. Book II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P47.

In trying to persuade Wu Rulun to take the position of the general dean of Imperial University, Zhang Baixi or Wu Rulun also seemed to invite Yan Fu as the school's vice dean or dea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persuading Wu Rulun, Yan Fu played a quite positive role, and he hoped to take a position at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to realize his ideal of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education. Therefore, on the second day of his visit to Beijing School, Yan Fu visited Zhang Baixi and put forward many of his suggestions for reorganizing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Maybe Yan Fu was over-enthusiastic, and when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reopened, the school was operated not with Yan Fu's intention. Wu Rulun was not appointed as the general superintendent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nor did Yan Fu work as vice dean or general superintend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When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reopened, Yan Fu was the general agent only for the Translation Bureau,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For this kind of arrangement, Yan Fu seemed to be unhappy. He mentioned his reaction in a letter to a friend about his mood, it said:

Recently, I was occupied by three kinds of work tha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y public duties and could not be given up because of their monthly wages. This awkward situation could be shared among friends and not be discussed with strangers.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s plan was grand, described as a fine spectacle in the Emperor's edict, but judging from its operation, we held that the university would have no good results. For a long time, I took it as a great honor to be a friend of Zhang Baixi, whose hometown was in Changsha, Hunan and also a great pleasure to share my humble suggestion for reopening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Recently, I found that some colleagues held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school and showed a little jealousy toward me in this respect, and I had better keep my mouth shut and busy translating my task in the Translation Bureau. Wu Rulun once mentioned my contribution to other friends, "My contribution to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is my three-character translation principle: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while my official position in the school is not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is, I have the same idea;

thus, explaining other matters is needless and easy to understand.”¹

The purpose of this reopened Imperial University was naturally focused on Western knowledge. However, due to the basic attitude of the superintendent,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in absorbing new Western knowledge,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learning them from Japan, not learning them directly from the West. During this period, Yan Fu wrote to a friend: “It must be alerted that the Chinese came to know the Western information via the Japanese academy, not from the western academy directly. Japanese enjoyed helping the Chinese to keep this trend of learning. Later, Zhao Zhongxuan was appointed as agent-general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he held a different viewpoint of learning Western knowledge and was against by most of his colleagues. To be specific, Zhao’s strategy of learning Western knowledge, Luo and Wu Rulun, called for change in the South; Zhang Zhidong and Li Hongzhang did it in the North, but in Changsha and Nanpi, people supported Zhao. If no change happened, young disciples would go into the school, and in four or five years, they would b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y have achieved nothing, and they would unite as one and call for the followers to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with the corrupted officers -- just like what happened in South Sea Public school --- in the past also Korea was affected by the Japanese, and now it was the turn for China to continue. If so, what a tragedy! Thus, in the initial stage, we can see that Yan Fu felt dissatisfied with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principles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II

The Translation Bureau to which Yan Fu belonged had a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where Zeng Guangquan was the general agent. Other translators like Lin Shu, Yan Qu, and Zeng Zonggong also worked in the Translation Bureau. When Yan Fu was appointed as the general superintendent of the Translation Bureau, he had made a set of fairly comprehensive regulations for the Translation Bureau, Imperial

¹ Yan Fu. Letters to Xiong Jilian, unpublished.

University of Peking which stated that: “Translation Bureau shall appoint one translator-in-general to tackle translation affairs. The translator-in-general should oversee organization, supervision and distribution, editing and polishing,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and even recruiting or dismissal of translators. Four translators were assigned to share the translation tasks. No definite number of translators was not set who were required to bring home their assignments. Two pen-helpers were to assist translators in Chinese if they had problems expressing themselves in Chinese. Two proofreaders were to collate and proofread the translation, which could be the shared work for copyists. Two reviewers were to polish and finally decide on the style of printing and book design. Two Chinese and one foreign painters were to do painting and charting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supervise the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affairs. Four copyists were needed to copy the translation. One accountant was needed to take care of finan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ooks.”¹ Yan Fu proposed several guidelines for the Translation Bureau which could be used nationally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adopted a modern quality-oriented rewards and punishment system for translators, and required the translation bureau to focus on Western books and made it different from Shanghai Translation Bureau which specified in translating Japanese materials.

Yan Fu worked at the Translation Bureau Imperial University until 1904, and then he resigned and left Beijing for Shanghai. It was the early contact between Yan Fu and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In one of Yan Fu’s unpublished letters to Xiong Jikang, Yan Fu mentioned the matter of his resignation from the Translation Bureau from which we notice his achievements in Translation Bureau for these years:

Yesterday, I got the idea of resignation from the Translation Bureau, and asked Zhang Baixi to approve it, but I got refused and had to stay here for the next spring. I plan to enjoy my translation work when I return to the South. I have recently been translating Edward Jenks’s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Shehui Tongquan) “and will complete it in June. When I complete it, I will start to compile the bilingual dictionary,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 (Yingwenhangu). I suppose you could read this book when I arrive in Shanghai

¹ Regulations for Translation Bureau,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from *Works of Yan Fu*, Book I, Edited by Wang Shi, p127.

next year, and I will present it to you in person. Yesterday, I mailed you a letter delivered by Baihuazhou Wisdom-Disseminating Bookstore in Nanchang (Nanchang Baihuazhoushuzhuang), and it will be with you soon. The letter contained nothing important, but I request you buy me some new brush pens. When you buy brush pens for me, you do not need to choose brush pens made by Hua Wenkui because I hear that in Hunan province, some brush pen makers are much better than Hua Wenkui. In addition, in translating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I changed its Chinese name from Ziyoushiyi to Quanjielun, which Commercial Press had published.¹

Yan Fu did not immediately resign from the Translation Bureau. He said in another letter:

H. Spencer died on December 8, 1903, and in his eulogy, it is reasonable for people to think highly of his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which could be as great as Francis Bacon's in history. Since our departure, I have completed the translation of Jenks's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which described 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Zhang Yuanji (Jusheng) read this book and commented that this book was a great help in understanding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why social elites expect to reform China. This book will be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one copy will be sent to you for your reference.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got my last mail, which contained a copy of my translation of *On Liberty*.) I am glad to tell you that my translation of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 will be published next spring.

I now hold two positions in Kaiping Mining Affairs Company and the Translation Bureau, and I plan to quit both. Regarding the seat in the Translation Bureau, Zhang Baixi told me I would have to work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

I am not ambitious and do not w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authorities for personal gain. Next spring, I intend to return home to the South with my family and isolate myself from the outside to read and teach, from which I

¹ Yan Fu. Letters to Xiong Jilian, unpublished.

suppose I could make a living. If I could have some savings, maybe I could go abroad and do some traveling. In that case, I could have a freer life and do whatever I like.¹

From this letter, we know that in 1903, when Spencer died, Yan Fu had completed his translation of Jenks's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Not Spencer's) and scheduled for publicatio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While translating Western classics, Yan Fu realized how difficult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 and then he set out to write a book of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 and expected to publish it next spring. As to his resignation from the translation Bureau, Yan Fu told his friend it was expected to become a reality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he would probably leave Beijing for southern Shanghai till the spring of next year.

Shortly after that, in another letter, Yan Fu again talked about the Translation Bureau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Beijing:

I am very glad to tell you that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 the book I mentioned, will be completed soon. I think when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t was not only a good tool to learn English thoroughly, but also it was helpful to know better about the wor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a comparative way.

In the academic circle, Zhang Zhidong had set the regulations for schools that most students were not encouraged to learn Western languages; if they learned, they would not be appointed to important positions. After that, it was understandable for most people not to support the experimental Bacon Schools, which people of wisdom established. Next spring, I decided to go to the South, but I was worried about some trivialities that would interrupt my departure and could not follow my schedule. In our lives, it is very common for us to follow social routines instead of our intentions. Alas! What a reality!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for me to resign, it is doomed for me to quit and go for my own freer life. I believe it is not very long for me to live a retired life.”²

¹ Yan Fu. Letters to Xiong Jilian, unpublished.

² Yan Fu. Letters to Xiong Jilian, unpublished.

In this letter, Yan Fu mentioned that his writing of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 went very well; he thought highly of this book and its readership.

Soon after this, Yan Fu had left Beijing for Shanghai, and he had been mentioned in one of his letters this feeling and his future vision:

Today in Tianjin, I am very glad to read a book which I have been presented on February 28 in Bian City (Kaifeng, Henan). Due to 13 or 14 this month, I will go to Shanghai with my family. Though I have resigned from the Translation Bureau and Kaiping Mining Affairs Company, I probably visited Beijing around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 have entrusted Zhang Yuanji to find an apartment for me. I will probably live in #551 Tunanli, the south road of Beihe, or in the old Qingcang Jingzhao, Shenjiawan Bay house. If you want to send me a letter, you can send it to Zhang Yuanji at the address of #194, Changkangli Street, North to New Lese Bridge in Shanghai, and he will transfer it to me for sure.¹

Arriving in Shanghai, Yan Fu recorded his trip to Shanghai from Beijing and mentioned some other things unsettled in Beijing in a letter to Xiong Jilian:

I left Beijing for Tianjin on March 3, left Tianjin on March 12, and arrived in Shanghai on March 17. Now, I have been in Shanghai for about one month. My address is #551 Tunanli, south road of Beihe. I just settled in Shanghai, and I am afraid I will go to Beijing again for some transition in the Translation Bureau because some plans are undone. In July or August, I will return to the South and say goodbye to the capital of Beijing. “When I return to Shanghai again, I will have no official work to tackle. I will proofread my sample book of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 which has been printed out already. It will take me a month to complete my proofreading. It goes quite slow and time consuming indeed. The book is written for readers to learn English by themselves who have learned English for two or three years and have some foundation in Chinese. Since it is practical for English learners, I suppose this book will b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language learning and what I am most sure is that it will be

¹ Yan Fu. Letters to Xiong Jilian, unpublished.

helpful to you, my dear brother, and to your school. When I was in Beijing, my annual revenues were almost close to ten thousand dollars. Once I left my official positions, I earned a life for myself and my family from my writing and translating. Comparatively, I have earned very limited money from my translation. Unfortunately, dishonest publishers have often pirated my translation books without respect for the copyright. Whenever I have published a book, many pirated versions are distributed in the book markets, which has been a big headache for me and caused me a great loss in my earnings. What a miserable life! No wonder these cunning printers of pirate editions always made fun of my toleration. As to my translations of Adam Smith'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d Herbert Spencer's *Study of Sociology*, there are about seven or eight pirated editions in Hunan, Guangdong, Shanghai and Zhejiang. It is very hard for us to investigate how many pirated editions there are. Two or three months after publishing my translations of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and Edward Jenks's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I am told that someone intends to pirate my translations of these books in your province. I wonder if you have heard of it or not? If you find it out, please help me to prevent them from pirating my translation. If so, you have done me a great favor, indeed!¹

The letter reflects that Yan's translations have a great reputation, and his famous translations have been pirated many times in many provinces. His translations of Mill's *On Liberty* and Jenks's *History of Politics* have been pirated in Jiangxi Province within several months. On the one hand, these pirated editions have seriously infringed the copyright of Yan Fu and have greatly reduced his "income" in a great way,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are convinced that Yan's translation also played a great social influence at that time.

¹ Yan Fu. Letters to Xiong Jilian, unpublished.

III

Yan Fu had spent more than three years in the Translation Bureau, translating and publishing many Western classics to establish himself as the best translator in modern China. Among his transla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largest scale is the famous British political economist Adam Smith'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Adam Smith had written more than 10 great works, and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orks was hi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is book summarized the main aspect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establishe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for Brit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in 1776, and Yan Fu's translation began in 1897 and was completed in 1900. Like translating T.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as "TianYanLun", Yan Fu translated the title of Smith's masterpiece into *YuanFu*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Wealth*), which was more elegant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Yuan" in Chinese means investigating, probing, researching, etc. Thus, YuanFu is to investigate or seek the causes of wealth and strength.

In his translator's words for the translation, Yan Fu explained his translation of "the title" and his intention for his addi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comments to his translation:

What Chinese scholars are concerned about i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China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 prosperity and extermination of the Chinese race in the long term. Therefore, whenever I noticed what Smith said was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 in China or was to provoke my inspiration on current affairs, I could not help adding my detailed comments in my translation, which called on readers to think more about Adam's words no matter how long they were and how critical my comments became. Alas!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was applied in every society at any tim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beings.¹

¹ Yan Fu. On Translating Spencer'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from Works of Yan Fu, edited by Wang Shi, p101.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Yan Fu's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is to promote a strong, prosperous and developing China. His short-term purpose was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overty of China, and his long-term purpose was to make Chinese prosperous and avoid extermination. Readers could feel Yan's patriotism in the comments of his translation.

When Yan Fu translated Smith'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1897, he translated Herbert Spencer's *Study of Sociology* in the same year. Yan translated the title of *Study of Sociology* into *Qunxue Siyan*, and once he stopped translating this book for a while, and finally completed his translation of the whole book in 1903 and was published by Shanghai Wenming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pencer was a famous British philosopher propagandist, and promoter of evolution enthusiastically. He just applied Charles Robert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to human society, and accordingly, he was called the "vulgar evolutionist" for many years. According to the views of Spencer, evolution was not only adapted to species competition in nature, but also to the human society which could be completely applied to all areas of individual life and social life. He thought that any society was an organism suitable for observation and study with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becaus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ny society could develop in terms of genetic variation, natural selection and heritage.

Yan Fu especially appreciated and respected Spencer's "vulgar evolutionism," As early as he translated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he introduced Spencer's social evolution in the commentaries on several occasions. He believed that Spencer's views were much better than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which could meet the realistic need in Chinese society to fight for its survival. He said: "Spencer developed an all-embracing conception of evolution as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the physical world, human culture and societies. He was famous for his masterpiece, *The Study of Sociology*, which applies the law 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to society."¹ Though Yan Fu admired Charles Robert Darwin's evolutionary theory, he paid more

¹ Yan Fu. On Translating Preface to T.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from *Works of Yan Fu*, Book V. edited by Wang Shi, P1320.

attention to Spencer's social evolution because he added Spencer-like criticism in his comments in translating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which was not completely faithful to the principle of evolution.

Yan Fu also highly evaluated Spencer's *Study of Sociology* and believed that Spencer's views met the urgent need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were compatible with China's tradition of abdication from sage to sage. He pointed out that Spencer:

(Spencer) devoted his life to exploring the principle of evolution and applying the law of evolution to society; when he set up his philosophy of evolution in his book, the *Study of Society*, he was in his eighties. With its profound book, scholars felt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refore, I translated it into Chinese to guide more Chinese to learn it. For the past twenty years, I have had no chance to read his book, *The Study of Sociology*, till now. I agree that Spencer suggests Scholars be honest and sincere in their academic works, while for the people in authority, this book provided them reasonable suggestions and workable measures that analyzed matters thoroughly and predicted their future.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would be shocked by this book and feel obligat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When I analyzed what happened in China recently, I found out that we could apply Spencer's study of society to explore Chinese affairs, present or past, and understand their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While some scholars were shallow and impetuous,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society and always took some provisional measures to tackle the social problems for their desired results. Unfortunately, what they participated in could not solve Chinese problems, and their measures could not help China become strong. If they could not get what they desired, they would become miserable and call on people to do some destruction in despair. It was all known that destroying rather than constructing something new was easier. Therefore, it was better for us to be cautious and more urgent to learn how to construct a new China! ¹

¹ Yan Fu. On Translating preface to Spencer's *Study of Sociology*, from *Works of Yan Fu*, Edited by Wang Shi, p123.

Yan Fu thought that Spencer's work would be able to fix the "China problems".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tudy of Sociology*, i.e., in 1904, Yan Fu completed another important translation, Edward Jenks's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by Commercial Press in Shanghai.

In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Edward Jenks, a famous British scholar (1861-1939), advocated using evolutionary theory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Jenks's view, human society was evolving. So far, generally,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savage society",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modern society," which was similar to the later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as "primitive society, feudal society and capitalist society".

The main purpose of Yan Fu's translation of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like his other classic translations, w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law of social evolution better, and thus he made it clear in the translator's preface:

What a different society China had! The society of China could not be compatible with what Western people described in their evolutionary phases: the society began with a "savage society", succeeded with a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then developed into a "modern society". In its savage society, its social unit was totem groups who were fishing and hunting; during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people were plowing for grain;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savage to patriarchal societies, people had a life of nomadism. Finally, feudalism would come into being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atriarchal clan into the state or political society. During feudalism, people generally engaged in agriculture. In the political society, people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in the fields of military,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se four groups supported each other and experienced a harmonious life that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and could not be destroyed. Such a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ociety was like nature, which has its four seasons, and people grow from young to old,

which could not be reversed.¹

Through his translation of the stag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 Fu fully expressed his deep belief in social organic evolution. He repeatedly stressed strik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human society's evolution and individual organisms' growth. Human evolution followed the stages of "totem", "patriarchal," and "state," which were just like the biological individual who must also experience different stages from childhood, youth, and maturity to age. Thus, Yan Fu convinced the general law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evolved from the "low-level stage" to the "advanced" evolution. It is an unchangeable and objective law. Based on the law, Yan Fu admitted that i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 was some phenomenon of "variation", "Alas! What a different society China had! The phenomenon of "variation" had hindered the normal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made China out of the orbit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and turned it into a poor country and even into the western slave. So, in Yan Fu's heart, his focus on the "China problem" is still how to make China out of the "vari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djust and develop China's "social organism" to restore the survival a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competition among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Yan Fu said:

I became very excited when I translated this part of the book; you might want to know why. In my heart, I expected that the future for Chinese people was still promising, even though we Chinese people were unfortunately trapped in the old methods and constrained by the old customs; it seemed that the Chinese could not extricate from this predicament, but with precedent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progress in China, Chinese could follow their practice and conduct some reforms for a bright future; as a result, China conducted some reforms and Chinese were revitalized and dreamed of its prosperity. How did the government of the federation operate nowadays? If nations were small in number, they would unite to establish a federate government to survive in the competitive world; if

¹ *Works of Yan Fu*, Book I, Edited by Wang Shi, p135.

united, why did they still feel weak in power in a better system of the republic? These nationalities did not share the same ancestors and had a tradition of separation. Only our Chinese people were numerous and independent in spirit, and thanks to customs and geographic location, Chinese nations had formed a tradition of being united as one and living a harmonious life. Nowadays, the Government of society all worried about their nation becoming less and less in number and their laws not being operated. However, as to Chinese, we suffered more serious difficulties, which few people realized! Chinese people have evolved in intelligence, morality and administration for about 4,000 years; though Chinese people encountered some difficulties nowadays which were clear and could not be avoided, we conduct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m and found out that Chinese people still had obtained the potential for a powerful nation. We all believed that in difficulties China could not be destroyed. China had so many people, so various topography, and so many intelligent people; once the Chinese were enlightened and realized the disadvantages of customs and traditions, they would discard the dross and strive for its strength to become the uncompetitive nation in the world. That was why the Chinese became fearless of being poor and weak and would never become slaves to the Western nations. I did hope some insightful people would understand what I had said here. ¹

Yan Fu still held confidence in China's future and was not disappointed with the backward of China at that time. Moreover, he believed that as long as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aware of the crisis and the profound introspection for the existing old customs, and as soon as possible, they could get rid of the heavy mental burden, China was still promising.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Yan Fu felt optimistic about initiating reforms of the "New Deal"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hoped the "New Deal" movement would open up a new future for China. Maybe it was at this point that Yan Fu had conflicted with some firm "revolutionaries" inevitably.

¹ Yan Fu. Translating Commentaries in Edward Jenks's *History of politic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1, P155 .

Before Yan Fu had been appointed as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Translation Bureau, he had already translated the British scholar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However, because of the Boxers' Uprising outbreak, Yan Fu unfortunately lost this manuscript in his hasty leaving Tianjin for Shanghai. After Yan Fu accepted his job in the Translation Bureau in 1903, He, by chance, received his lost translation of Mill's *On Liberty*, and after his quick proofreading, he forwarded this book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to publish¹.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was one of the radical liberal thinkers. His book, *On Liberty*, promoted utilitarianism, which was a theory in normative ethics holding that the moral action or permanent interest of humans was the one that maximizes utility. Mill emphasized the great value of personality in human welfare. This principle required not only a kind of freedom beyond the legally binding but also a kind of freedom that was not affected by public opinion; the first was the freedom of thought and speech in order to get the truth; the second was freedom of interest and research, the third was the freedom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s which would not harm others. Mill believed that individual freedom was not only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liberation, but it was also a means of individual freedom, which itself was a kind of "purpose" or "end", thus the real meaning of individual freedom should include the uniqueness of "fun" and "behavioral quirks". For this purpose, Mill thought it necessary to draw a reasonable legal scope for the definition of liberalism to make personal freedom gai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and make individual freedom not impede society and others' freedom. Mill proposed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give society its reward, which was why Yan Fu translated this book. However, it seemed that Mill made these arguments for his emphasis on the individual's duty to society and the state, but more importantly, he wanted to protect "aliens" or protect the unique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from intervening in society and the state. Miller defended not only the freedom for the business people, capitalists and learned people to develop in society but also for the clumsy and slow-learned people to stick to their

¹ See the detail: Yan Fu. On Translator's Notes of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So, the book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Western history.

Yan Fu translated the classic book in the hope that it introduced the essential spirit of freedom in modern Western society to China, so he adopted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title of the book *On Liberty* in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book, which was formerly known as “Lun ZiYou” (*On Liberty*). However,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1898, especially after the chaos of the Boxers’ Uprising in 1900, and with the stimulation of “New Deal” reform, Yan Fu thought that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of Mill’s *On Liberty* would mislead people to seek the absolute power of individual freedom, or perhaps it could bring much chaos to China, then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Yan Fu changed his Chinese title as Qunjiquanjielun to draw a clear boundary between individual and group or society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Mill also discussed individual freedom and group or social rights in his book that an individual should take care of his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en he enjoys his freedom, which was not emphasized in this book. At the same time, Yan Fu changed the book’s focus in his translation and stressed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society, emphasizing the limits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necessity of social power.

In 1904, the Commercial Press began publishing Yan Fu’s translation of French thinker Montesquieu’s important work, *The Spirit of Laws*” (*Fayi* in Chinese title); in 1909, the seven volumes of this book were published finally. Part of the translation seri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Yan Fu’s achievements in the Translation Bureau.

Montesquieu’s *The Spirit of Laws* was published in 1748, reprinted 22 times within two years, and translated into many foreign languages. Differently, Yan Fu did not explain why he translated this book, but he thought highly of the classic an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his other translations.

According to Yan Fu’s viewpoints, the reasons for the West’s prosperity and rising might be various, but one should be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the legal

construction.¹ At that time, due to ruling out the radical reforms of the early radical politicians and excluding the interference of social instability caused by the Boxers' Uprising Movement, the "New Deal" movement by the Qing Dynasty had star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which the government had appointed Shen Jiaben to introduce western codes of western classics of laws to establish Chinese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legal framework. All of these stimulated Yan Fu to make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the classics of Montesquieu's masterpiece.

Montesquieu realized that the universality of legislation had influenced human progress based on Western values. While Yan Fu studied Montesquieu's political and legal concepts, he felt very dissatisfied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 values. Yan Fu believed that a stable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was based on the stability of society,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power and the will of the monarch; accordingly, law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were always changed with the will of the monarch. It seemed that politics and law were often the derivatives of the sovereign virtue, so it naturally led to ins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all in all, China's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was ruled by man rather than by laws.²

¹ Yan Fu. Translator's Commentaries on Montesquieu's *The Spirit of Laws*, from *Works of Yan Fu*, Book IV, edited by Wang Shi, p969.

² Yan Fu. Translator's Commentaries on Montesquieu's *The Spirit of Laws*, from *Works of Yan Fu*, Book IV, edited by Wang Shi, p969.

Trad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The Influences of Confucianism in Korean History

LI Xueqian HE Wenbin¹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 Pingnan Luxia Center
Primary School, Fujian)

Abstract: South Korea, with a long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ast century, still maintains its economic vitality. The Confucian heritage is believed to be a major driving forc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method, this research observes Confucian trad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Korean society and analyzes the impacts on the social order, education, 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 Korea.

Keywords: Confucianism; South Korea; Trad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Introduction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th Korea) belongs to the generation of new industri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NICs in its English abbreviation) that emerged between 1960 and 1980 and is characterized as a Confucian country in terms of its Confucian values and practices in history and the retained cultural system in contemporary Korea. Despite modern Korea's multicultural and religious coexistence, it remains an orderly, united, and civilized country. Confucian ethics such as "self-discipline", "diligence in work", "fraternity", "universal peace," and "emphasis on education" contribute to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integrating into the moral and social order, and cultivating citizens to develop and maintain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South Korea.

¹ LI Xueqian, Master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University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 is an assistant lecturer in the Spanish Department of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 Fields of research: Intercultural Spanish teaching and regional studies. *E-mail:lixueqian.dl@gmail.com*; HE Wenbin is a Chinese teacher at Luxia Center Primary School of Pingnan County, Ningde City, Fujian. Fields of research: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E-mail:ooohwb@126.com*.

Therefore, in today'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onfucianism sti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Korea's social structures, customs, and systems. This essay will study the evolution of Confucianism in Korean history and its impacts on Korean education, 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 Confucianism in the Pre-modern Period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Confucianism is also known as the Confucian culture. Confucianism was founded by Confucius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it summed up, generalized and inherited the culture of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was continuously enriched with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馬秋麗, 張德蘇 2010:8). In later times, it continued to change its form and enrich its contents in the l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fter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zi¹ further developed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was introduce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during the Han Dynasty of China. Since Confucianism was introduced to South Korea, it has always been in the mainstream of Korean culture. Korean scholars generally believe it was introduced between 190 and 108 B.C. because the Han dynasty's cultural relics,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cademic ideas had been transplante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n. In the beginning, Confucianism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mainly learnt from Chinese Confucianism, but later on, it was gradually localized and nationalized.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has been going on for a long tim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pre-modern period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re were two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the first stage was a period of tolerance (introduction, acceptance,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local culture) from the 3rd century B.C. to the 7th century A.D. The second stage ran from the 8th to the 19th century, a period of complet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metaphysical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 ethics with Confucianism. It is a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rational experience. Confucianism was combined with Buddhism and

¹ Xunzi was a Chinese philosopher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aoism as the core culture. Students of Confucian culture were dedicated to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law.

According to what was recorded in *Samguk sagi*, Goguryeo (Chronicles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central Confuci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ai Xue” and the local one “Yu Tang” were established to recruit students. Confucian classics were the main teaching content (Xiao, Ya, 2019:158). In 372, Goguryeo established a Confuci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he Imperial College, as the highest school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each Confucianism. At the same time, schools were set up as ordinary private schools to enroll the children of nobles and some commoners and teach *The Five Classics*,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etc.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mmon peopl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Therefore, Goguryeo’s education, mainly based on Confucianism, developed rapidly and promoted the advancement of society.

After the Peninsula’s unification, Silla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Academy to teach the mandatory subjects of Confucian classics to promote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In 992, Goryeo also introduced the Song Dynasty’s centralized official education and set up the six schools under the Guozijian¹, which still used Confucian classics as the content of the lessons to educate the sons of dignitaries and noblemen.

The Goryeo Dynasty promoted Confucianism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for “ruling the country and levelling the world”.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re was the Guozijian, and the government also set up the East and West Schools. Moreover, there were village schools at the local level, all based on study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king of Goryeo went to the State Academy regularly to advocate Confucianism and invited Confucian scholars to teach Confucian scriptures. Moreover, in 958, the Goryeo dynasty implement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o select talents.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were one of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examination,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Confucianism.

¹ The Guozijian, sometimes translated as the Imperial College, Imperial Academy, Imperial University, National Academy, or National University, was the national central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at that time.

The Joseon Dynasty (1392-1910) made Confucianism the state religion and ruled the country through it, which led to Confucian culture's deep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It was only when the Joseon dynasty achieved the socialization of Confucian concepts that it was able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n its subsequent rule,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500 years (崔英辰, 2008:9).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Confucian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in Korea. Confucian morality and ethics were manifested mainly in people's daily lives.

The Kingdom of Goguryeo established Confucian schools from the central to local level to teach the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 "six arts": Courtesy, Music, Archery, Chariot Driving (or Horsemanship), Calligraphy, and Mathematics.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f Confucianism in Korea also included the Seowon¹. While the village schools wer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Confucian education of the local common people, the Seowon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onfucian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of the local nobility. These academies reflect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adapting Neo-Confucianism from China to the local realities of Korea, and the resultant academies were outstanding witnesses to this transformative and localized process in terms of their functio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Korea was famous for Confucian gentlemen then, and the good learning and courtesy culture was widespread.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selected officials through examinations, which tested the knowledge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ability of the "six arts" of the candidates. This method combined Confucianism with being an official and improved the status of Confucianism to exercise its social functions. Sejong the Great was a well-known representative of Korean Confucianism during this period², who created the Korean characters and advocated that the Confucian spirit is to rule the world with courtesy and music and reach the pinnacle of cultural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Wise learning should be based on the moral

¹ Seowon were the most commo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f Korea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² Sejong the Great was the fourth monarch of the Joseon dynasty of Korea, and ruled the country from 1418 to 1450.

cultiva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dialectical combina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practical benefit should be achieved.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Korean history in 1866, Korean society had formed an ethic and social order based on respect for seniors and teachers and loyalty to rulers.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Confucian cultur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pre-modern Korean society,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ethic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ountry's stability.

2. Confucianism in the Modern Korean Perio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Korea was still an underdeveloped agricultural country. However,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this country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radical events and changes. South Korea has built the “Korean economic miracle” between the 1960s and 1990s (董向榮, 宋文志, 2009:20), becoming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es.

After the Korean War, the government widely promoted Confucianism as the criterion of personal values, political power source and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o provide sufficient faithful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Korea, the Korean government promoted the “self-cultivation” and “ordination” of Koreans. “Self-cultivation” refers to diligent work, showing filial piety and respect for parents, and extending familism toward the passion for the country.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y should have a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proper self-control of desires, words and actions and maintain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2.1 Family and Social Ord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Korean society is stable, with people following respect for seniority and order. The family is the smallest unit of a nation, and harmony is essential for consolidating a family and nation-building. Confucianism strongly influences family education in Korea, as is seen in Korean families' behavior and language education. Although the situation of Korean families has changed greatly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Confucian family education still occupies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Cultivation, emphasized in Confucian culture, is important in maintaining family harmony and social stability. Cultivation means determining one's proper position in the network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This way, harmony is achieved only when people practice their proper roles.

Moreover, harmony refers to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nature and man, and man and man (Kim, 1996: 205). Based on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anism, each person should be aware of his or her position in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 and act appropriately to fulfill his or her duties in that position. The model for the family members in their respective roles encourages each citizen to fulfill his duties, from the smallest to the largest unit, in obedience to his superiors and the nation. It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diligence and progress of the individual.

Confucianism believes that family harmony is based on love and respect, “love” means that elders should treat juniors with love, and “respect” means that juniors should treat elders with respect. Koreans seek family harmony through love and respect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believe that “love” and “respect” bring unity. Confucius and Mencius emphasized that gentlemen should have a kind heart to “love relatives” and “love the public”. The love of parents, spouses, children and brothers can nurture human nature, so Korean families cultivate good habits in their children when they are young. Therefore, the role of parents is taken as a model for their children in Korean Confucian culture. Proper models of parents would raise children with good human nature. Korean families emphasize the order of seniority, and in society, they also value seniority, respect for the senior, and compassion for the poor. The foundation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begins with family education, and based on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the family, people of integrity, courtesy, filial piety and orderliness are gradually cultivated, thus establishing a developed culture of virtue. Therefore, Korea has a strong sense of collectiveness and unity at the national level.

2.2 Korean Educ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South Korea belongs to the countries of the Confucian cultural circle, with their fine traditions of respecting teachers, emphasizing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virtues. Confucius proposed the idea of “education for all”, believing everyone should have equal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Mencius even compared a “ruler” to a “teach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fucian cultural tradition of emphasizing education and respecting the wise, Korea has gradually formed a social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that gives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f "building a nation through education" ha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education fever"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n Korea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is a great impetus for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se factors are the driving force of Ko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Confucianism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and believes that Confucian gentlemen should carry out "lifelong learning" to realize the Confucian ideal: "Cultivate oneself; bring order to the family; govern the country; bring peace to all". Hongik Ingan¹ is Korea's national motto an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e first article of Korea's Education Law states the concept of Korean education. According to Hongik Ingan's great ideas, education aims to help everyone improve their character, cultivate the ability to live independently and acquire citizenship to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for building a democratic country and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all humanity. Education in Korea is known as the second economy that promotes Kor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Korean moral and ethical education, Confucianism is central and an important idea inherited from traditional ethics. Confucianism is emphasized i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ethics in modern Korean moral and ethical subjects. These are the goals of ethics education: first, to cultivate a proper attitude toward life and study; secon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reasonable judgments and have a proper sense of citizenship, national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a sense of world peace and co-prosperity of humanity when faced with ethical issues in daily life; third, to enable students to establish ideals and principles of life and cultivate a sense of practicality. Thirdly,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establish ideals and principles of life and cultivate the

¹ Hongik Ingan is the official educational motto of South Korea. It means "To broadly benefit the human world".

morality of practice. Therefor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ducational goals, Korean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are deeply imbued with Confucianism.

Modern education in Korea has been designed to carry on Confucianism through subjects such as “Morality” and “Ethics,” and Confucianism has a high place in the education of “morality” in Korea. In Korean moral education, the textbook for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is called “Ethics,” and the textbooks for senior high schools are called “National Ethics”. In Korea, Confucianism is taught in elementary schools, and the textbook for moral and ethical education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grades of elementary school is called “The Way of Regulated Life,” which includes the habits, manners, and norms of daily life for personal and social life,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textbook consist of customary practices and experiential ethics. The “Traditional Ethics” course aims to enable students to re-learn and apply the Confucian spirit and wisdom that their ancestors followed and practiced for a long time. It shows that modern Korean education still advocates the values and norms of Confucian ethics.

The Confucian idea of “morality” is also taught in Korean universities. In Seoul, the capital of Korea, there is still a college,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which was founded in the spirit of Confucianism.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has adopted Confucianism as its mission and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and Wisdom” as its motto.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sic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textbooks of Confucianism and other Confucian classics, have become important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main contents of lectures at the university. It is the only Confucian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with a depart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plays a special role in preserving Confucian traditions and educating people about Confucianism.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has made Confucianism one of the basic subjects of education for all students, and every student, regardless of his or her major, is required to take a full-credit course in Confucianism in his or her junior or senior year. Moreover, there are faculties specializing in Confucianism at many other universities, such a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Goryeo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Sejong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government actively promoted the primary education policy, intending to convert the demographic burden into future human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d a seri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s, such as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Act and the Industrial Education Promotion Act, gradually forming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a cheap labor force in South Korea. In 1961, South Korea's GDP per capita was only \$80, and 80% of the population was illiterate.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spent 15 to 20% of the national budget on education, second only to the defense budget. From 1975 to 1985, the budget spent on education increased from 220 million won to 3.53 billion South Korean won, a nearly 16-fold increase. At present,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has become popular throughout South Korea. In 2011,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with a university degree in the 23-34 age group reached 64%.

2.3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Korean Corporate Culture

Corporate culture refers to the sum of a set of concepts and behaviors that are generally recognized and consciously observed by the employees of an organization. As a subculture of national culture, corporate culture is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e to which it belongs.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compan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istic and educational Confucianism. Koreans generally agree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A good scholar can become an official” and “A good scholar can become rich” (袁勳,2014:11-13). In the following part, we will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Korean corporate culture from four aspects: love, righteousness, integrity, and harmony. The Korean government skilfully combined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with corporate management, making Confucianism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 and cultural basis for the spirit of modern corporate culture.

“Benevolence is the core concept of Confucian culture. Mencius proposed that “those who are benevolent love others”. The concept of benevolence in Confucian culture emphasizes that everything should be “people-oriented” and put people in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 Korean companies focus on “people-oriented” in the process of management, caring for people, understanding people, respecting people, and maxim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Korean companies also emphasize the role of people; for example, S.K. Group believes that the main part of the

company is people, and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enterprise lie in talent, so the success of a business depends on the ability to develop human resources. Moreover, S.K. Group regards the happiness of its customers, members and shareholders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its value pursuit.

Regarding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Confucianism emphasizes “righteousness before profit” and “thinking of righteousness when one sees profit”. The goal of enterprises is to maximize profits, but they must comply with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ocial ethics. Most Korean companies are also committed to “serving the country with business.” For example, Samsung donated 30 billion won and epidemic medical supplies to the Korea Disaster Relief Association during COVID-19 and donated more than 40 billion won to other countrie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There are countless enterprises like Samsung that combin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o suppor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uth Korea.

Integrity is an important value in Confucianism and a basic principle to be observed in business (吕娜, 2020: 201-202). A company that aspires to be sustainable in the long run must be honest with its customers and partners. Otherwise, it will jeopardize customers’ interests and affec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integrity is important in developing corporate culture in Korea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today.

The concept of “Harmony” in corporate culture means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The idea of harmony is a thought that Confucianism first proposed and tried to apply to social management. The “harmony” advocated by Confucius is “harmony in diversity”, that is, the pursuit of coexistence while maintaining one’s individuality. For the enterprise, although each member has his characteristics, if the company can create a family atmosphere,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mutual help to achieve the common goal of the enterprise, then the company will have a tremendous centripetal force.

This consciousness believes in creating a family atmosphere between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brotherhood and developing group consciousness, strengthening cohesion, and linking personal development to corporate

development. Such etiquette and regulations guarantee that the companies' orders and labour relations are relatively harmonious. For example, founded in 1947, the L.G. Group insists on "human harmony" and "solidarity" within the company, and labour disputes remain low.

Externally, only by living in harmony with customers, partners, society, and even nature for mutual benefit can we reach the goal of "harmony generates wealth"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In most Korean companies, there is a "family" atmosphere in which members unite and love each other, coordinate and cooperate. Wha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Korean companies is the concept of "harmony" rooted in the company.

Korean companies demonstrat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a spirit of self-improvement, an emphasis on education, knowledge, human resources, and eth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education. In addition, Confucian culture is reflected in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labor relations. First, the power within the corporate organization is highly centralized. The pursuit of a stable social order and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olidity of a centralized political system have been the core goal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Korean companies's management is based on the Confucian model of centralized management. Korean companies emphasize etiquette and rules based on age and working experience. New and junior workers are respectful to their superiors and leaders. They follow Confucian codes of conduct.

In Korean companies, employees and executives work long hours dail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iors and subordinates is clear and strictly disciplin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EO of a Korean company can reach down to the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even the smallest aspects of the company. Second, there is a strong sense of family within the company and a high degree of loyalty to the company among employees. Forming a clan-like clo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mong company members is often easy. For exam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ank, age, gender, geographical location, edu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Korean companies will form a family-style order of differentiation in employee re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seniority. In addition, Korean companies generally promote the idea of loving

the company as a family. In other words, employees need to consider the company as a family, not for their personal development, but for the company's development as a "family". In addition to emphasizing employees' abilities, companies als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a person's humanity. I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fucian culture of the family unit. Third, employees need to develop a sense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mission and dedication and have the work ethic of being diligent and willing to work hard.

The competitiveness generated by Korean companies lies in lower production costs and higher labor productivity. Korean employees have a strong sense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honor. Confucianism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and advocates a positive and enterprising attitude towards life. The spirit of self-improvement and boldness of enterprise is what Confucianism requires of a gentleman, and this has inspired the Korean people's fighting spirit. In developing the economy and construction, the Korean people have shown an excellent sense of work. Taking the Hyundai Group as an example, the eight words of the "Hyundai Spirit" - "creativity, pioneering, perseverance, diligence and inspection" well reflec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Korea achiev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only two decades after the Korean War.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self-improvement, it would be inconceivable for Korean citizens to achieve such great economic development.

2.4 The Influences of Confucianism on Ko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aily economic life, the values of Confucianism also affect the behaviors of citizens; for example, Confucius advocated a frugal life and said, "He who pretends to be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does not seek the satisfaction of his appetite in his food, nor seeks the devices of ease in his place of residence." To some extent, this concept of abstinence and frugality has shaped Koreans'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led them to deposit dormant funds in banks. The high savings rate generated by thi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of the funds needed to sustain long-term and rapid growth in the Korean economy.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South Korea controls the macro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icro-economic activities depends more on the self-restraint of individual behaviors.

South Korea had a small domestic market in the early 1960s, with a weak local economic base and lack of capital, technology and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governmental-leading, market-based operating mechanism to implement an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absorbed capital and technology from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ransferred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mported raw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Through processing and assembly, it sold the products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developing industrialization, the governmen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German Chancellor Ludwig Erhard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build roads in Korea to help the automobile and steel industries. The government began the project and the Seoul-Busan Expressway was opened on 7 July 1970.

The goal of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short term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an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 strateg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led financial rationality policies. Since the 1960s, South Kore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transformed from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nto a highly industrialized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focused on the timely 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late 1970s, when Western trade protection was strengthened and South Korea's textile exports were struggling,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transfer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 realize its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ince the 1970s, South Korea's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created the "Korean Economic Miracle".

Growth Rate of Various Industrial Sectors i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Park Government

Classification	1962-1 966	1967-1971
GNP	2.2%	31.7%
The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9.1%	61.1%

Industry		
Mining Industry	9.6%	37.9%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5.8%	45.8%
(Source: Zhongping Cao, Contemporary Korean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51)		

Conclusion

Looking back at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Korea, we can find that South Korea has a long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which has been inseparable from Korean social values and social systems throughout histo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 culture encouraged the Korean people to work diligently to build the country, and Confucianism, which works as one of the basic elements of Korean social structure, helps to maintain a relatively stable family and social order. Today, its electronics, high-tech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are among the most advanced in the worl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socie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combined with Confucianism, the core values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have gradually penetrated Korean society. Today, South Korea is one of the few democratic countries in Asia,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Confucianism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References

- [1] Kim Kwang-ok, The reproduc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Korea [C].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edited by Wei-ming, Tu, pp. 20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 Xiao Y., Hu J., The Inheritance and Spreading of Confucianism in Modern China and South Korea[C].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Hainan University, Sanya University.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and Higher Education(ICSSHE-19).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2019.

- [3]崔英辰（著），邢麗菊譯.韓國儒學思想研究[M]. 北京：中國東方出版社, 2008.
- [4]曹中屏.當代韓國史(1945-2000)[M].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6.
- [5]董向榮, 宋文志.韓國[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 [6]呂娜. 基於儒家文化視角的中韓企業文化比較研究[J]. 企業文化, 2020, 201-202.
- [7]馬秋麗, 張德蘇.儒家思想導論[M]. 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 2010.
- [8]袁勳, 儒家文化對韓國大企業集團的影響研究—以三星集團為例[D]. 濟南：山東大學, 2014:11-13.

傳統與變革——儒家思想對韓國歷史的影響

李雪倩 何文斌

（福州外語外貿學院；屏南縣路下中心小學，福建）

摘要：韓國的儒家思想歷史悠久，伴隨著在上個世紀的經濟飛速發展，至今仍保持著旺盛的經濟活力。儒家思想被認為是韓國發展成功的主要推動力之一。本研究基於歷史研究法，通過對韓國社會中儒家傳統和變革的研究，分析儒家思想對韓國社會秩序、教育、企業文化、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影響。

關鍵詞： 儒家思想；韓國；傳統與變革

Literature&Culture Studies

文學與文化研究

《莊子·秋水》對洪大容《醫山問答》創作的影響

劉征遙¹

全南國立大學在讀博士

摘要：日本學者夫馬進的著作《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在《醫山問答》的誕生那提到：《莊子·秋水》篇中的河伯與北海君的問答是《醫山問答》中虛子和實翁問答的原型。本文對這一觀點進一步研究，認為：洪大容的《醫山問答》的創作和其核心思想直接受到《莊子·秋水》的影響，使用比較文學影響分析的方法對《莊子·秋水》和《醫山問答》進行比較研究，從結構和思想兩個方面，聚焦於《莊子·秋水》的“以道觀之”和洪大容的《醫山問答》“自天視之”這兩組命題，論述兩部作品之間的影響與接受的關係。

關鍵詞：《莊子·秋水》；洪大容《醫山問答》；比較文學；影響與接受；哲學

引言

洪大容（1731-1783），字德保，號湛軒，是朝鮮王朝18世紀後半期著名的實學家和北學派先驅，《醫山問答》是他用漢字創作的哲學小說，其內容是通過“虛子”和“實翁”兩個角色對話問答來表達作者的思想。關於洪大容《醫山問答》的創作問題，日本學者夫馬進的專著《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的第十四章“洪大容《醫山問答》的誕生”，提出了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迄今從來沒有人討論過洪大容回國後——也就是說他的後半生——究竟在思想上經歷了怎樣的探索。更進一步說，甚至沒有人嘗試通過他的思想經歷來推測《醫山問答》究竟是何時寫成的。”²夫馬進還提到，洪大容後期傾倒與莊子思想：“《莊子·秋水》

¹ 劉征遙，全南國立大學在讀博士，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東亞漢文學研究，電子郵箱：lzy153163002@chonnam.edu

² [日]夫馬進著，伍躍，凌鵬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393頁

篇中出現的河伯與北海君的問答是朝鮮實學家洪大容的《醫山問答》中虛子和實翁問答的原型。”¹本文對這個觀點進一步研究，使用比較文學影響分析的方法對《莊子·秋水》和《醫山問答》進行比較研究，從文學結構和內容思想兩個方面，聚焦於《莊子·秋水》的“以道觀之”和洪大容的《醫山問答》“自天視之”這兩組命題，論述兩部作品之間的影響與接受的關係。

在比較文學學科中，本文的研究物件屬於創作研究。與本文研究物件最相關的論文有兩篇：第一，黃永鋒、王超《〈莊子〉對洪大容華夷觀的影響——以〈醫山問答〉為中心》（《中國哲學史》2013年第一期），這篇論文雖然指出洪大容的華夷觀形成受到《莊子》的影響，但是，《秋水》篇如何影響洪大容《醫山問答》創作，還值得進一步分析。第二，韩国学者宋荣培《홍대용의 상대주의적思维와 변혁의 논리——특히〈莊子〉의 상대주의적 문제의식과의 비교를 중심으로思维——〈莊子〉〔洪大容的相对主义式思维与变革的逻辑——以与《莊子》相对主义式的问题意识的比较为中心〕》（《韩国学报》第20卷，第1号，1994年），这篇论文虽然论述了洪大容对庄子“相对主义”思想的接受，但是，《莊子·秋水》的“以道观之”表达的是如何超越相对主义，它和《医山问答》“自天视之”这个觀點的關聯，还值得进一步分析。

本文觀點是：洪大容《醫山問答》的創作及其核心思想直接受到了《莊子·秋水》的影響。

本文研究目標是指出《莊子·秋水》如何影響了洪大容的《醫山問答》創作，首先從文學結構方面比較兩部作品，兩者都是對話式寓言結構，《莊子·秋水》和《醫山問答》都是這種通過兩個角色的對話、辯論來表達作者的思想；然後是以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框架比較和分析兩部作品中的思想：《莊子·秋水》的“有限與無限”“以道觀之”，洪大容的《醫山問答》的“宇宙無限”“自天視之”；最後指出洪大容的《醫山問答》哪些方面有所創新。

一、《莊子·秋水》和《醫山問答》的可比性依據

王向遠的《比較文學構造論》認為影響研究的目的是“在文學作品的細緻的

¹ [日] 夫馬進著，伍躍，凌鵬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407頁

分析中，分辨該作品在內容與形式各方面的複雜的構成因素，指出外來的東西是否影響了該作家作品，這種影響如何表現在作家的創作中，外來影響對該作家作品的獨創起了何種作用”¹。“超影響”研究，作為“影響分析”方法的重要環節，就是在確認作家接受某種外來影響之後，進一步指出該作家對影響的超越，指出“影響”的作用和結果，指出“影響”的闕限，說明某種“影響”有沒有成為、又如何成為該作家藝術獨創的基礎和出發點。²在比較文學中，“影響”是一種關係概念，通常，文學關係包括“事實關係”“交叉關係”和“價值關係”，“價值關係”是作家作品在主題思想上的關係，“交叉關係”是作品在結構方面的外在外在形式關係。

《莊子·秋水》洪大容的《醫山問答》可比性依據，也就是事實關係是：《醫山問答》的主角“虛子”來自《莊子·秋水》篇中出現的“拘墟（虛）”一詞。日本學者夫馬進的《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中關於《醫山問答》和《莊子·秋水》的關係表述如下：

之前有學說認為《莊子·秋水》篇中出現的河伯與北海君的問答是《醫山問答》中虛子和實翁問答的原型。筆者以為這實在是一個真知灼見。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洪大容在出使北京之前一直很喜歡閱讀《莊子》。一般認為，虛子是生活在虛妄世界中的人物，正與察覺到真實的實翁相對。然而實際上，虛子已經在《乾淨筆譚》中以洪大容自稱的“拘墟（虛）子”這一形式登場了。這個“拘墟（虛）子”則來自於《莊子·秋水》篇中出現的“拘墟（虛）”一詞。³

“拘墟（虛）子”這個詞首次出現在《乾淨筆譚》的二月十七日條目中。嚴誠詩的一部分：陋彼拘墟子，終身乃座井。洪大容立即明白“拘墟（虛）子”的來源是《莊子·秋水》篇，說明他經常閱讀莊子的《秋水》篇。同樣在《乾淨筆

¹ 王向遠：《比較文學構造論（王向遠比較文學三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48頁。

² 王向遠：《比較文學構造論（王向遠比較文學三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51頁。

³ [日]夫馬進著，伍躍，凌鵬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407頁

譚》的二月二十六日條目中，潘庭筠提到想要拜訪別墅“愛吾廬”，洪大容開玩笑：即使來了也會卡住鰲的膝蓋，令潘庭筠發笑。而“東海之鰲”的故事也出自《秋水》篇，其中描述井底之蛙告訴東海裡的鰲從井裡跳出來的快感，並邀請鰲試一次，鰲試圖進入井中，但左腳未入井口，右腿膝蓋就被卡住。這裡的“東海”指的是朝鮮。說明洪大容對《莊子·秋水》篇極為熟悉，所以在筆談中也不可能如此地提及“鰲膝”一詞。還有，《乾淨筆譚》中還出現了“天機”（二月十二日，《大宗師》篇）、“越人無用章甫”（二月十二日，《逍遙遊》篇）、“芻狗”（二月二十三日，《天運》篇）、“魚相忘於江湖”（二月二十四日，《大宗師》篇）等詞彙，都是洪大容自己借用自《莊子》的語言。這說明，洪大容在北京燕行之前，他對莊子的哲學思想就有著特殊的情感聯繫。

二、《莊子·秋水》和《醫山問答》的對話式寓言結構

對話式結構，作為一種源於柏拉圖的《對話錄》的文學形式，在哲學作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是指通過對話的形式，讓持有正反觀點的兩個人相互辯論和交流，從而推動思想的交流和啟發，產生新的思想和觀點。對話式結構是哲學思考方法的起源，有兩個持有不同觀點的人進行對話，它的獨特優勢是通過對話和辯論，不同觀點的衝突產生思考和啟發，有助於深入探討問題，形成全面綜合的思想。

《莊子·秋水》和洪大容的《醫山問答》都是通過塑造兩個角色的問答對話來表達思想主題的文學結構歸類為小說。儘管它們的敘述形式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小說，而更接近於寓言或哲學對話，但這種基於對話的結構仍然可以被歸類為小說的一種形式。在文學作品中，對話結構常常被用來傳遞思想、展示角色之間的互動和觀點的對比，以及探索作者所關注的主題和意義。洪大容的《醫山問答》和《莊子·秋水》作為對話式結構的文學作品，與柏拉圖的《對話錄》結構有一定的相似性。對話式寓言結構為作家提供了一種表達不同觀點和思想的方式，使得哲學的思辨性得以體現。

《莊子·秋水》的故事背景設定在秋天的時候，主要講述了河伯與北海之間的對話。北海向河伯問及為什麼秋天河水的表現如此宏偉，河水回答說這是因為河水與北海有所不同，它沒有什麼所謂的貴賤之分。河伯無法理解，於是北海以道的觀點來回答河伯的疑問，解釋了事物的相對性的原因和如何相對性的正確觀

念。通過對話，莊子表達了一種如何超越相對主義的哲學思維，強調了事物本身並沒有貴賤之分，而是在人的觀念中賦予了不同的價值。他認為，只有從道的角度來看待事物，才能超越人為的評價和相對性，達到宏觀、客觀的理解。

夫馬進的《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中的對《醫山問答》內容的概述：

《醫山問答》是通過虛子和實翁兩個人的問答來展開敘述的。有關這位虛子，書中稱他“隱居讀書三十年”，之後“乃西入燕都，遊談於縉紳，居舍六十日”，由此被人認為是年輕時期的洪大容本人的戲劇化形象。因為他正是在35歲時，即1765年（乾隆三十年、英祖四十一年）參加燕行，並於翌年回國的。另一方面，實翁則被認為是經歷了巨大轉變後的後半生的洪大容，也就是寫作這本書時的洪大容本人。¹

根據夫馬進的觀點，洪大容前期思想和創作《醫山問答》時思想是不同的：洪大容的1765的燕行就是他思想轉變的契機，“虛子”代表他燕行前的思想，“實翁”代表他創作《醫山問答》時思想。虛子到實翁，這兩個角色的思想如何轉變，其中的思辨性通過對話和辯論得以體現。根據《醫山問答》的內容，虛子燕行回國途中見到了實翁，他們之間的對話就是《醫山問答》。醫巫閭山，今稱閭山，在明朝是“華夷交匯”之地，所以《醫山問答》結論會提出華夷觀。這使虛子與實翁的對話更加具有象徵意義。

《莊子·秋水》和《醫山問答》通過角色之間的對話和辯論，這種對話式結構能夠清晰地呈現作者的思想變化，使抽象的哲學思想具象化，更易於被讀者理解和接受。這種哲學式的對話思辨性和啟發性在於，可以讓作者把抽象的理論擴展到其他領域。例如，《莊子·秋水》的“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更宏觀的視角討論萬事萬物價值；洪大容的《醫山問答》“自天視之，人物均也”以更高的視角看待萬物的關係，他還將這一觀點用於文化領域，提出“華夷一”的華夷觀。

三、《莊子·秋水》與洪大容的《醫山問答》思想比較

¹ [日]夫馬進著，伍躍，凌鵬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393頁。

方勇的《莊子講讀》對《莊子·秋水》的主要思想的概括：《秋水》是莊子《外篇》中的經典篇章，它運用《齊物論》的觀點，深入討論人對萬事萬物價值判斷的無限相對性。在論述過程中，為了說明人的認識的局限性，通過河伯與北海的七番對話論證大和小、多和少、時間與空間的相對性，這有助於理解絕對與相對、無限與有限的辯證關係。其主要目的是引導人們突破認識上的局限性，形成以道觀物的標準看待萬物，最後順應自然，返歸本真。¹ 《莊子·秋水》是對莊子“齊物論”哲學世界觀和認識論的進一步解釋，萬物相對而存在，世界無限，而人的認識有限。人的認識有限的原因是：因為時間、空間、知識的限制。其主旨可以概括為“以道觀物”的看世界方法，也就是從一個更高的觀點看事物，從而超越人在認識事物方面的有限性和相對性的價值判斷。

《莊子·秋水》的世界觀與認識論對洪大容的《醫山問答》提供了思想基礎。洪大容的《醫山問答》在受到《莊子·秋水》哲學觀影響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哲學觀，在科學，哲學，文化三方面有所創新。如果以哲學思想為主線分析洪大容的《醫山問答》，首先討論世界觀問題：宇宙萬物如何存在？洪大容借助“實翁”這個角色提出“地球自轉”“宇宙空間無限性”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宇宙觀；然後自然就會提出認識論問題：如何看待人與萬物關係？和莊子哲學“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一樣，洪大容在《醫山問答》中提出“自天視之，人物均也”的認識論思想；最後，作為《醫山問答》的結論，提出“華夷一”價值主張，認為華夷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一）莊子的“世界觀”與洪大容的“宇宙觀”

哲學家往往把對宇宙的認識作為自己的哲學前提，先感受到世界的無限和自身的有限的差距，然後逐漸超越自己對具體事物認識的局限性形成認識論，最後形成自己的哲學觀。

《莊子·秋水》開篇展現了莊子的世界觀，通過河神和北海的第一番對話如何認識大和小，時間和空間的相對性：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

¹ 方勇：《莊子講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38頁

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¹

河神自以為秋水的浩大，“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但見到北海的“大”後，則意識到自己認識的局限而“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然後，北海神直接回答了河神認識有局限的原因：“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²“拘於虛”指的是空間、“篤於時”指的是時間、“束於教”指的是知識。原因就是，宇宙空間是無限的，但人對具體事物的認識很有限。莊子的哲學強調，人要突破認識的局限，首先要意識到世界的無限，人對萬物的大和小的價值判斷是有限的，然後形成超越時間、空間和知識，這是建立“以道觀物”認識論的思想基礎。

“拘於虛”也就是《醫山問答》中“虛子”的來源。“虛子”向“實翁”展示自己的學問，其“虛學”和“實學”相比後的巨大差距，“虛子”只好承認自己“局於謏塞，未問大道，妄尊如井蛙窺天，膚識如夏蟲談冰”³

和《莊子·秋水》的河伯與北海對話一樣，在洪大容的《醫山問答》中，他首先通過實翁對宇宙特徵的描述，形成自己的世界觀觀：

太虛遼闊，充塞者氣也，無內無外，無始無終，積氣汪洋，凝聚成質，周布虛空，旋轉停住，所謂地日月星是也。⁴

《莊子·秋水》的河與海的相對性一樣，洪大容《醫山問答》的世界觀首先通過描述宇宙的特征，呈現大和小、無限和有限的相對性，認為：人雖然相對於宇宙很渺小，但是依然可以認識宇宙的運行規則：

夫日月星，升天而不登，降地而不崩，懸空而長留。太虛之無上下，其跡甚著，世人習於常見，不求其故，苟求其故，地之不墜，不足疑也……夫地者，水土之質也，其體正圓，旋轉不休，停浮空

¹ [戰國] 莊子，孫通海 譯注：《莊子（中華經典藏書）》，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06頁。

² [戰國] 莊子，孫通海 譯注：《莊子（中華經典藏書）》，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07頁。

³ 洪大容：《醫山問答》，《湛軒書·內集·卷四·補遺》

⁴ 洪大容：《醫山問答》，《湛軒書·內集·卷四·補遺》

界 ,萬物得以依附於其面也。¹

洪大容的《醫山問答》通過實翁這個角色說“世人習於常見 ,不求其故”,普通人的認識是有局限的,不能直接看到世界的廣闊,然後描述了宇宙運動法則,希望人們能意識到自己的局限從而開闊視野。洪大容之所以提出宇宙運動的觀點,是因為他在思想層面建立了和《莊子·秋水》相同的世界觀,宇宙是無限的,人的認識有限,只有認識世界的無限,才能超越自身的有限。

《莊子·秋水》的第二番對話論述了萬物的變化,強調人們突破認識局限正確對待時間和運動:

.....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臯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²

“量無窮”指的是在空間上數量無窮無盡,“時無止”“分無常”指的是時間永不停止,“終始無故”指的是萬物永遠在變化。簡單來說就是,人要意識到自己認識的局限性,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來看,一切觀點都是相對而言的,突破這種認識的方法就是正確對待時間和變化:不以小為少,不以大為多“小而不寡,大而不多”;“遙而不悶,掇而不跂”既要看到現在,也要看到未來,因為時間不停止。這就是“以道觀物”的認識論的思想基礎。

洪大容在此基礎上提出宇宙無限的觀點:洪大容借助實翁這個角色表達了這一觀點:

滿天星宿 ,無非界也 ,自星界觀之 ,地界亦星也。 無量之界 ,散處空界 ,惟此地界 ,巧居正中 ,無有是理。是以地為兩曜之中而不得為五緯之中 ,日為五緯之中而不得為眾星之正中 ,日且不得為正中 ,況於地乎? ³

洪大容的《醫山問答》對宇宙運動規律的描述基本上符合現代科學的宇宙的

¹ 洪大容:《醫山問答》,《湛軒書·內集·卷四·補遺》

² [戰國]莊子,孫通海 譯注:《莊子(中華經典藏書)》,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08頁。

³ 洪大容:《醫山問答》,《湛軒書·內集·卷四·補遺》

運動法則。後來有學者指出，這個觀點是在當時西方近代科學並未傳入朝鮮半島。金柄瑑的《論洪大容的哲學思想和文化意識——以〈醫山問答〉為中心》認為：“《醫山問答》所反映的另一個重要理論是關於宇宙的時間和空間的見解。宇宙空間的無限性和時間的無限性，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也是科學家和哲學家普遍關心的哲學命題”¹。這篇論文肯定了洪大容對宇宙運動法則的觀點，在當時對批判傳統地球靜態的說很有說服力。

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3年第10卷第1期）指出：“……因為當時朝鮮社會對西學或清文化仍然加以排斥，但無論如何，《醫山問答》一書是朝鮮人經歷燕行後對西洋觀的感受及反應的重要呈現。在《醫山問答》中，洪大容企圖否認傳統中國對天文現象的理解，指出世界並非天圓地方，而是地球是正圓之論述。他又指出地球是水土之質，是不斷自轉的。又指出在地球之中，擁有地心吸力，使天下萬物都能夠依附在地面之上。”²

因此，在世界觀方面，《莊子·秋水》認為：世界萬物相對而存在，在空間上有無限性而且變化無常，而人對宇宙萬物的認識是有限的、相對的。人的認識有限的原因受到了時間、空間和知識的限制。人要想突破自身的局限感受宇宙萬物的廣闊，首先要意識到這一點。這是建立“以道觀物”認識論的思想基礎。而洪大容的《醫山問答》在受到《莊子·秋水》的世界觀影響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觀、宇宙觀，否定傳統的“天圓地方”說，提出“地動自轉，和宇宙空間無限性的宇宙運動法則。

（二）《莊子·秋水》的“以道觀之”與《醫山問答》的“人物性同”

《莊子·秋水》的第四番對話討論的問題是如何判斷貴賤、大小？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

¹ 金柄瑑：《論洪大容的哲學思想和文化意識——以〈醫山問答〉為中心》，第2頁

² 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3年第10卷第1期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¹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既是《莊子·秋水》的核心論題，又是《齊物論》中的核心思想。“以道觀之”就是以“道”的視角去看待世界萬物，它的目的就是客觀地看待事物不帶有任何價值判斷。以“道”來審視整個世界，才能達到客觀的洞見，並得出正確的結論。這一個結論是：世間萬物都不分高下貴賤。

《莊子·秋水》的“以道觀之”認識論主張：只有以“道”作為判斷萬物價值標準時，才能得出客觀、正確的結果。“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這句話的意思是：從“道”的視角看，一切事物都沒有高下貴賤之分。相反，“以物觀之”是，如果以個人主觀的視角，就會產生“自貴而相賤”的結論，人們互相輕視；“以俗觀之”是，如果用世俗的觀點，則會得到“貴賤不在己”的結論。

洪大的《醫山問答》中對人與物的貴賤價值判斷，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虛子說，禽獸和草木“無慧無覺，無禮無義”，而人有智慧、知覺和禮義，因而人貴物賤。實翁的觀點則是：

五倫五事，人之禮義也；群行呴哺，禽獸之禮義也；叢苞條暢，草木之禮義也。以人視物，人貴而物賤；以物視人，物貴而人賤，自天而視之，人與物均也。夫無慧故無詐，無覺故無為，然則物貴於人，亦遠矣。”²、

在“以道觀之”的認識論思維方式上，洪大容《醫山問答》中與《莊子·秋水》所表達的意思是相同的：人與物的貴賤是人的主觀價值判斷是相對而言的，如果從“天”作為判斷標準，則人與物沒有貴賤之分。

洪大容在《醫山問答》在受到《莊子·秋水》“以道觀之”影響的基礎上，擴展了人與物的關係，試圖建立一種新的生態觀，強調生態系統的人、禽獸、草木之間的秩序。洪大容《醫山問答》通過實翁進一步表述“夫大道之害，莫甚於矜心，人之所以貴人而賤物，矜心之本也。”³，認為：人的“矜心”是不利於

¹ [戰國] 莊子，孫通海 譯注：《莊子（中華經典藏書）》，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10頁。

² 洪大容：《醫山問答》，《湛軒書·內集·卷四·補遺》

³ 洪大容：《醫山問答》，《湛軒書·內集·卷四·補遺》

自然界秩序的穩定發展。

（三）《莊子·秋水》的“齊物”與《醫山問答》的“華夷一”

《莊子·秋水》第五至七番對話是關於人生觀方面的哲學思想討論，天與人是什麼關係？如領悟到“道”的意義？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
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¹

如何領悟“道”的意義？或者說，人建立了“以道觀之”的思維方式後會形成什麼樣的價值觀？從而逐漸推導出宗旨：返歸本真。也就是“天道自然、人道無為”。因為“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道”沒有起點和終點，而萬物則在死亡與生命的變化中經歷。雖然宇宙的大道是無限的，但人對宇宙的認識卻是在不斷變化的，宇宙中有永恆不變法則。

如果從“道”的視角看萬物，那麼，一切都處於自發變化之中。即“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²領悟到道的意義的人必定通達事理，處事應變，順其自然。從而推導出全篇的宗旨：“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³即，不執著於人為得失而傷害自然本性，一切順應自然而返歸人生的真諦。

洪大容也根據《莊子·秋水》的宗旨，在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和認識論的基礎上，在《醫山問答》中提出了“華夷一”的進步觀點。洪大容指出：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凡有血氣，均是人也；出類拔萃，制治一方，均是君王也；重門深壕，謹守封疆，均是邦國也；章甫委貌，文身雕題，均是習俗也。自天視之，豈有內外之分哉？是以各親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國，各安其俗，華夷一也。⁴

¹ [戰國] 莊子，孫通海 譯注：《莊子（中華經典藏書）》，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12頁。

² [戰國] 莊子，孫通海 譯注：《莊子（中華經典藏書）》，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13頁。

³ [戰國] 莊子，孫通海 譯注：《莊子（中華經典藏書）》，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13頁。

⁴ 洪大容：《醫山問答》，《湛軒書·內集·卷四·補遺》

洪大容在《醫山問答》中同樣領悟到《秋水》的宗旨，“齊物”“無以滅天”“反其真”“道無始終，物有死生”，順應規律領悟到道的意義的人必定通達事理，處事應變，順其自然。洪大容把這個觀點運用到文化方面，在天看來，並沒有什麼華夷的“內外之分”，華與夷只是外在的、表面的名稱不同而已。實翁“出類拔萃，制治一方，均是君王也”，既然“自天而視之，人與物均也”，那麼，國與國之間也不應該有差別。通過“地球自轉”“宇宙空間無限”的世界觀和“以道觀物”的認識論相互印證的基礎上，洪大容通過《醫山問答》表達自己的主張，否定了傳統的“華夷觀”，提出“華夷一”的觀點。在文化意識方面，超越了地域和國家之間的局限。這種超越了觀絕對與相對、無限與有限的視角來可以更客觀的審視人類文化的共同性。

洪大容的《醫山問答》在受到《莊子·秋水》哲學觀影響的基礎上，在三個方面有所創新。第一是自然科學方面，由於洪大容對天文學的興趣，還有他不斷學習和探索，對宇宙規律有了不同於傳統思想的想法。比如，否定傳統“天圓地方”說，通過推測，得出“地球是圓的且自轉”，這是在西方近代科學沒有傳入朝鮮半島提出的。第二是在哲學方面的創新。莊子《秋水》的核心思想是“以道觀物”，洪大容在《醫山問答》中提出“人物性同”的思想。這是儒家“人性論”哲學的範疇。“人物性同論”是朝鮮儒著名論辯“湖洛論爭”的核心論題，相當於發展了朱子學的心性論，洪大容作為“洛派”的繼承人相當於繼承和發展了這一觀點。第三是在文化意識方面的創新。既然從宇宙的視角看，萬物沒有差別。那麼，在文化方面，國家之間的政治秩序，也不應該有差別。從而，否定了傳統的“華夷觀”，提出“華夷一”的主張。這為後來的北學派的思想家提供了理論基礎。

結論

洪大容的《醫山問答》在受到《莊子·秋水》的哲學思想影響的基礎上，超越影響，形成了自己的哲學觀。

本文以日本歷史學家夫馬進的《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提到的，《莊子·秋水》的河伯與北海君問答是《醫山問答》中虛子和實翁問答的原型作為有兩部作品有可比性的依據。從文學結構和思想內容兩個方面比較，指出洪大容的《醫山問答》如何超越《莊子·秋水》的影響形成自己的哲學觀。

《莊子·秋水》所表達的世界觀與認識論為洪大容的《醫山問答》提供了哲學思想基礎。如果以哲學的視角看，洪大容的《醫山問答》，首先是從人對宇宙的認識的局限性開始，否定傳統的天圓地方，提出對宇宙空間的無限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其次是形成“人物性同”的認識論，人與物的貴賤是相對的，應該以更高的視角看待萬事萬物；最終形成了“華夷一也”的文化意識。

洪大容的《醫山問答》和其中所主張的思想多之後的實學家影響很大。例如。樸趾源在對天體宇宙的認識上與洪大容的觀點保持一致，否定了傳統的天圓地方說，提出了“地動說”和“宇宙無限說”。他認為：“今此地球面面開界，種種附足，其頂天立地與我無不同也。西人既定地為球，而獨不言球轉，是知地之能圓而不知圓者之必轉也。故鄙人妄意以為地一轉為一日，月一匝地為一朔，日一匝地為一年，歲（歲星）一匝地為一紀，星（恒星）一匝地為一會。”

北學派思想家將其對宇宙天體的認識擴展至實體論的範疇，包括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係問題，作為實學思想的一個理論基礎。相較於以往的實學家，他們在洪大容的思想主張上找到了一個建立在科學的宇宙觀基礎上的理論，具備了充分的科學論證和理論基礎，這是一個顯著的進步觀點。¹

參考文獻

- [1][日]夫馬進：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伍躍、凌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 [2]王向遠：比較文學構造論（王向遠比較文學三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22年版.
- [3]方勇：《莊子講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 [4][韓]洪大容.《醫山問答》.《湛軒書·內集·卷四·補遺》.韓國古典文學翻譯院DB（<https://db.itkc.or.kr>）.
- [5][戰國]莊子：孫通海 譯注.莊子（中華經典藏書）.北京：中華書局,2016.

¹ 陳冰冰著. 朴趾源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關聯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12.

- [6]金柄瑂：論洪大容的哲學思想和文化意識——以〈醫山問答〉為中心.東疆學刊.2011,28（1）.
- [7]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3,10（1））.
- [8]陳冰冰：《樸趾源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關聯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The Influence of Chuang Tzu's 'Autumn Floods' on Hong Dae-Yong's 'Euisanmundap'

Liu Zhengyao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work "Korean Embassies to Beijing and Korean Embassies to Japan" by Japanese scholar Fuma Susumu, it is mentioned that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Lord of the River and the North Sea in the "Chuang Tzu - The Floods of Autumn" serves as a prototype for the dialogue between Huja (虛者) and Silong (實翁) in Hong Dae-Yong's "Euisanmundap(鑿山問答)." This paper further investigates this perspective, contending that Hong Dae-Yong's creation of "Euisanmundap" and its core ideology were directly influenced by "Chuang Tzu - The Floods of Autumn." Employing methods from comparative literary influence studies,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uang Tzu - The Floods of Autumn" and "Euisanmundap," focusing on the themes of "以道觀之" in "Chuang Tzu - The Floods of Autumn" and "自天視之" in Hong Dae-Yong's "Euisanmundap" from both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luences and acceptance of the two works.

Keywords: "Chuang Tzu - Autumn Floods,"; Hong Dae-Yong's "Euisanmundap,";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fluence and reception; philosophy

宏觀視角下的《貨殖列傳》經濟學思想研究

何建功¹（全南大學東亞研究所）

摘要：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收錄了一篇專門記載經濟活動的文章《貨殖列傳》，介紹了先秦和秦漢時期商業活動，還有三十餘名有史料記載的工商業者和他們的典型事蹟，以故事形式總結和探究經濟活動背後蘊藏的經濟規律，方式新穎，內容詳盡。中國古代典籍經濟方面的內容非常少，歷代封建帝王重農抑商，忽視商業的發展也嚴重制約經濟的前行，關於經濟著作與文學又少之又少。這也導致古籍眾多的中國後世可借鑒的經濟思想較少，《貨殖列傳》這是記載在史書並單獨成篇的經濟著作，實在難能可貴。近六十年來研究《史記·貨殖列傳》經濟思想的文章多達數百篇，相關研究取得長足進步。其核心內容概括為農工商虞”四業並重，並無高低之分。人性本然的逐利性，經濟倫理思想與經管思想。

2

關鍵字：《貨殖列傳》、宏觀經濟、政府

引言

《貨殖列傳》中強調以自由的市場經濟為基礎，以國家宏觀調控為輔助。“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就是書中觀點，認為這代表著政府應當“退後”，重視市場經濟，減少直接幹預。但筆者認為，司馬遷雖然看到了人民群眾之中蘊含的經濟發展的無限動力，書中也書中提到商人應該遵守商業道德和誠信原則。政府應該合理幹預和監管，避免市場出現混亂，商人待價而沽，囤貨居奇。有時政府會制定法規來管理商業，以確保市場秩序和社會穩定。《貨殖列傳》中也記錄了經濟週期和市場波動對商業活動的影響。商人需要根據市場情況調整策略，掌握經濟週期和市場波動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書中涉及了財富如何分配，以及商人如何在社會階層中升降。這反映了古代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和財富分配格局。也流露出來司馬遷對於商人及商業的重

¹ 何建功（1996-），男，工商管理碩士，從事高校教育工作，韓國全南國立大學博士在讀，研究方向：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與企業文化。

² 王廣通.近四十年來《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研究述評[J].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21,36(09):54-61.2021.09.008.

視。範金民先生認為《貨殖列傳》反映了司馬遷高度肯定商人商業地位，從社會發展和歷史變遷的高度，提出一系列商業倫理與商業思想，成為後世商人的“聖經”¹

劉剛、廖正賢、梁晗三位教授認為《貨殖列傳》其影響深遠，理論遍及中外，現代市場經濟“自由經濟”這一核心思想可追溯到《貨殖列傳》《道德經》，其中反映出的人性求富，術有專攻、因時而變的市場主體技能，以及多層次的市場治理手段等思想，闡述詳實而深邃。²

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總結前人觀點，站在後疫情時代與國際經濟疲軟，俄烏衝突加劇的今天，挖掘提煉書中適合現代的經濟發展的思想。總的來說，《貨殖列傳》是一部反映古代中國商業和經濟活動的歷史文獻，其中包含了一些古代中國經濟思想的元素，如商業道德、政府監管和風險管理等。這些思想和觀點反映了當時的商業實踐和社會背景。

一、《貨殖列傳》中的經濟思想

《貨殖列傳》是中國古代文學經典是研究漢唐經濟的重要古籍之一。它記錄了中國歷史上的商人、經濟活動和貿易等方面的內容，是研究古代中國經濟思想的重要文獻之一。以下是關於《貨殖列傳》中的經濟思想的詳細介紹：

1、宏觀引導，穩定經濟

自漢朝開始放寬山林水澤生產的禁令，大量商人從事相關行業，經濟得到快速恢復，漢朝對於經濟幹預較少，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政府對於經濟的發展應該起保駕護航的作用，《貨殖列傳》中還提到了政府對貨幣和貿易政策的幹預。政府可以通過制定貨幣政策來影響通貨膨脹和貨幣供應，以及通過制定貿易政策來管理對外貿易。而外匯必然離不開稅收，為了籌集財政資金和維持政府機構的運作，政府在《貨殖列傳》中提到了稅收政策。政府可以對商人和貿易活動徵收不同類型的稅收，包括進口稅、銷售稅、商業稅等，以確保國家財政的穩健。

《貨殖列傳》中描述了秦漢代時期的商貿活動，包括絲綢、茶葉、瓷器等重要的貿易品。政府對這些貿易活動實施了一定程度的監管和徵稅。例如，政府通過設

¹ 範金民.“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商業思想[J].古代文明,2017,11(01):54-61+126-127.2017.01.008.

² 劉剛,廖正賢,梁晗.市場經濟理論及其中國思想溯源——《國富論》與《貨殖列傳》《道德經》比較[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33(01):51-63.

立市場和商業關口，來監控貿易規模和收取商稅。這些稅收不僅用於維持政府的運作，還用於建設基礎設施，如道路和橋樑，又可以促進貿易的發展。

《貨殖列傳》寫出了漢代大國經濟崛起的歷史真實，奠定邦域絲路發展及大國崛起基礎，集聚多種經濟優勢，促成漢代經濟崛起。¹漢代能取得這樣的進展，離不開政府的定價和品質標準，《貨殖列傳》中也介紹了政府對商品的定價和品質標準的幹預。政府制定了一些規則和標準，以確保商品的價格合理，品質可靠。這有助於防止商人惡意哄抬價格或銷售次品，維護市場的公平和透明。《貨殖列傳》原文這樣說：“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這就是定價的重要意義，避免市場混亂。

除此之外，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實施了許可制度。商人需要獲得貿易許可或經營許可證才能從事特定的商業活動。政府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監管商業活動，並確保商人遵守法規和納稅義務，同時避免商業行為危害政府的管理與治理。商品品質檢驗和標記：為了保護消費者權益，政府在《貨殖列傳》中提到了商品品質的檢驗和標記。政府可以指定特定機構或官員來檢查商品的品質，並確保其符合規定的標準。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政府有時會採取措施來控制物價。這包括對某些必需品的價格進行監管，以防止通貨膨脹和社會不安。政府可以幹預市場，通過控制供應或價格來維持物價的穩定。

總的來說，《貨殖列傳》中反映了古代中國政府在經濟領域的幹預和監管措施。這些措施的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保護消費者權益、鼓勵貿易發展、籌集財政資金和維護市場的穩定。這些政府幹預和監管措施反映了古代中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角色，並有助於理解當時商業和貿易的運作方式。

2、注重商業，本性使然

在這本書中，司馬遷敏銳地發現，人類從事商業活動是為了積累個人財富，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並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實現財富。目前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政策都是考慮到了人的逐利性，在法律允許的框架下最大可能滿足人性，“富人，是人類本性，渴望一切”；“每個人都能盡其所能，盡其所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都是他的意思的表達。司馬遷認為追求財富和利益是人的本性，這無關善惡。《貨殖列傳》強調了商業活動在古代中國社會中的關鍵作用。商業不僅僅是財富的來

¹ 劉志慧.《貨殖列傳》與大漢邦域崛起研究[J].蘭州學刊,2018(11):89-102.

源，還推動了城市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繁榮。這反映了人類本性中對於追求物質財富和經濟繁榮的基本需求。

政府應順應人性；而且通過個人求富的過程會使得社會對資源得到合理分配，這是有益於社會發展的。雖然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但司馬遷不認為通過違反法律道德的手段致富是可取的行為。《貨殖列傳》中的商人逐利為主要動機。他們努力獲取財富、地位和社會地位。這體現了人類本性中對於經濟利益和個人富足的追求。司馬遷指出，發揮人們追求財富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實現思想文化發展。商人履行納稅和社會義務，為社會貢獻一部分財富。這有助於維持社會秩序和公共服務，減小政府治理成本。

《貨殖列傳》反映了商業活動和貿易在中國歷史中的重要性。這一啟示對於現代國家來說意味著，經濟發展和商業活動是國家繁榮的關鍵。政府應該制定有利於商業和貿易的政策，支持企業發展，促進經濟增長。在後疫情時代各國經濟普遍疲軟，只有經濟復蘇提振才能讓人民生活富裕，國家穩定。

《史記》中的貨殖列傳高度評價商人在商業經中的智慧才幹，肯定他們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貢獻。這與後世鄙薄商人與商業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¹財富與商業活動對於國家發展社會穩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貨殖列傳》強調了這點，商人通過貿易和貨殖（投資賺錢的方式）實現自己的富有，推動經濟發展為國家經濟做出貢獻。《貨殖列傳》中也說明應該商人守法守規，商業道德。商人應該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遵循貿易規則和稅收政策，以確保商業活動的合法性和公平性。書中提到商人應該保持謙虛和謹慎的態度。不要過於自大和冒險，要審慎考慮每一項商業決策，以降低風險並確保長期的成功。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²是自然之理，肯定人的欲望在致富過程中的動力作用不能忽視。

總的來說，《貨殖列傳》中的商業特徵與人類本性密切相關。它反映了人類對於經濟利益、創業、競爭、合作、道德觀念和社會責任的本能追求。這些特徵和觀點不僅幫助我們理解古代商業社會，也為今天的商業和社會倫理提供了深刻的啟示。這部作品提供了一個有趣而複雜的視角，揭示了人類本性在商業環境中的體現。

¹ 孫洪升,宋一淼.論司馬遷的經濟思想[J].思想戰線,2016,42(01):152-157.

² 司馬遷. 史記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59.

3、道德為先，崇能重技

《貨殖列傳》中提到商人應該遵守商業道德和誠信原則，商人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力量，書中列舉了大量富商的案例都是說明盛業倫理道德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這種強調商業道德的觀點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商人行為的一種期望，即要誠實守信，不欺騙他人，以維護商業信譽。這也反映了商業活動在兩漢後明顯增多，商人需要在商業倫理和法規下行事，才能長期經商，獲得利益。

商業道德在古代中國社會中具有重要地位，反映了商人在商業活動中應遵守的道德準則和社會期望。《貨殖列傳》中強調了商人應該保持誠實和誠信。商人在交易中應該誠實守信，不欺騙他人，不使用欺詐手段獲取財富。這反映了古代中國社會對商業道德的高標準要求。商業人士應該具備社會責任感。他們應該關心社會問題，幫助弱勢群體，回饋社會，以貢獻於社會的福祉和繁榮。書中也強調了商人應該尊重客戶和合作夥伴。他們應該建立互信的關係，積極合作，以共同實現商業目標。《貨殖列傳》中提到商業競爭應該遵守道德原則。商人應該避免不正當競爭、破壞競爭環境和使用惡意手段。相反，他們應該追求誠實競爭和創新。商人在財富管理方面應該遵守道德原則。他們不應過度追求個人財富，而要考慮如何將財富用於社會和家庭的福祉，以實現更高層次的價值。商人應該追求公平和正義，不應剝削他人或從不正當手段獲取財富。公平交易和對待他人是商業道德的基本原則之一。¹

書中讚揚了商人的商業技能和智慧。商人需要具備市場洞察力、交際能力和風險管理技能，以在商業競爭中獲得成功。商人的智慧和才幹被看作是財富創造的關鍵。在《貨殖列傳》中，商業人士展現了對市場的深刻洞察力。他們能夠識別和理解市場趨勢、消費者需求和競爭態勢。通過仔細觀察和分析市場，他們能夠做出明智的商業決策，選擇合適的產品和市場定位，以獲得競爭優勢。商業人士在《貨殖列傳》中展示了對商品的選擇和採購方面的技能。他們瞭解不同商品的特性、品質和市場需求，善於選擇高質量的商品，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他們還能夠靈活應對供應鏈的變化，確保貨物的及時供應。商業人士在貨物流通和物流管理方面表現出色。他們能夠有效地組織貨物的運輸、倉儲和分發，以確保貨物能夠順利地從生產地到達市場。他們善於規劃和管理物流，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¹ 王曉鵬.從《史記·貨殖列傳》看企業家精神在早期經濟活動中的表現[J].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20,35(10):6-14.2020.10.002.

在古代商業活動中，貨幣管理和金融技能至關重要。商業人士需要管理資金、進行投資和融資，並處理貨幣交易。他們展示了對金融市場和貨幣政策的瞭解，以實現財務增長和風險管理。商業人士展示了行銷和品牌建設的技能。他們能夠制定市場行銷戰略，宣傳和推廣產品，吸引客戶和建立品牌聲譽。商業活動總伴隨著風險，商業人士需要善於風險管理和危機處理。他們能夠識別和評估潛在的風險，採取措施減少風險的影響。當出現危機或問題時，他們能夠迅速應對，採取有效的解決方案，以保護業務和聲譽。商業人士懂得重視社交技能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他們與客戶、供應商、合作夥伴和政府官員建立互信的關係，以促進合作和業務發展。他們能夠有效地與各種利益相關者溝通和合作，以實現共同的商業目標。商業人士在古代中國社會中也被期望遵守高尚的商業道德。他們應該誠實守信、尊重客戶和合作夥伴、回饋社會、遵守法律和規定，以確保商業活動的公平和道德性。遵守經濟商業規律等觀念，也反映出其對商人優秀人格與智慧的讚揚，對其分擔社會責任與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肯定。¹

總的來說，《貨殖列傳》中反映了古代商業人士在市場洞察力、商品選擇、貨物流通、貿易談判、金融管理、品牌建設、風險管理、社交技能、創新能力和商業道德等方面的卓越技能和智慧。這些技能和智慧不僅對古代商人的成功至關重要，也對現代商業社會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商業人士需要不斷學習和發展這些技能，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商業環境和挑戰，實現商業的長期成功。

二、《貨殖列傳》中的現代啟示

通過瞭解《貨殖列傳》中的經濟思想讓我們更加認識到經濟深刻地影響著社會，本文將從三個角度探討其對現代的啟示。

1、從國家角度看

《貨殖列傳》中強調了商業道德的重要性，包括誠實守信和遵守法律。現代國家也應該鼓勵商業界遵守道德準則，成立商業協會，加強法律監管，以維護商業活動的公平和誠信。《貨殖列傳》中提到商人應該履行納稅和社會責任。現代

¹ 張高評.賦化散文與《史記》之敘事藝術——以《滑稽列傳》《貨殖列傳》《太史公自序》為例[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版),2022,45(06):52-60.2022.06.007.

國家可以通過稅收政策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回饋社會，支持公共服務和社會福祉。¹

《貨殖列傳》中反映了商業競爭和創新的重要性。現代國家應該鼓勵企業競爭和創新，為市場提供多樣性和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貨殖列傳》中提到商人在財富管理方面應該具備長期價值觀。現代國家應該強調可持續發展，鼓勵企業考慮環境和社會因素，以確保經濟的可持續性。《貨殖列傳》中強調商人應該關心社會問題，幫助弱勢群體。現代國家應該採取措施解決社會問題，減少社會不平等，提高社會的公平性和穩定性。《貨殖列傳》中也反映了政府在商業活動中的監管和政策制定的重要性。現代國家需要建立有效的監管機構，制定有利於商業和社會發展的政策，確保市場的公平和健康運行。《貨殖列傳》中涉及了國際貿易和合作。現代國家應該積極參與國際貿易，推動國際合作，拓展市場，促進國際經濟合作和發展。《貨殖列傳》中的現代啟示包括經濟發展、商業道德、稅收和社會責任、市場競爭和創新、可持續發展、社會問題和政府監管等方面的重要原則。這些啟示可以指導現代國家制定政策和管理經濟，以實現經濟繁榮、社會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2、從社會角度看

《貨殖列傳》中的現代啟示涵蓋了一系列與社會發展、道德倫理和社會責任相關的重要原則。以下是一些從社會角度提取的《貨殖列傳》中的現代啟示：

成功的商業人士普遍具備創新能力和長遠視野。其具備社會責任感，關心社會問題並回饋社會。現代社會需要鼓勵社會創新和可持續發展，以解決社會問題和滿足未來世代的需求。這一啟示告訴我們，商人積累了資本與影響力，自身具有長遠眼光與目標，可以對社會進步產生推動作用，現代社會需要企業和個人參與公益活動，為社會福祉和弱勢群體提供支持。書中也強調商業活動應該追求和諧，通過合作實現共贏。這一啟示強調了社會中各方的合作和協調，以實現社會和諧和穩定。商業應該遵守公平和正義的原則，不剝削他人。商業人士被要求遵守高尚的商業道德。現代社會也應該重視倫理和道德教育，培養人們的品德和道德觀念。現代社會也應該關注社會公平和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減少不平等現象，維護社會的公平性。

¹ 王海榕.突出市場在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找准政府在公共政策系統中的功能定位——從《貨殖列傳序》看當代公共政策系統的改進及兼議公共政策系統的功能限度[J].南方論刊,2022,(03):

《貨殖列傳》中強調文化傳承和教育的重要性。這一啟示告訴我們，商業在傳播中也會讓文化與文字在無形中傳播，實現文化的“潤物細無聲”。現代社會應該重視文化傳承和教育，培養人們的文化素養和道德價值觀。《貨殖列傳》中涉及風險管理的概念。現代社會也需要關注風險管理，包括金融風險、環境風險和社會風險，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安全。國際貿易和合作。現代社會需要加強國際合作，促進國際交流和互惠互利的關係，以應對全球性挑戰。《貨殖列傳》中的現代啟示涵蓋了社會責任、社會和諧、社會公平、文化傳承、風險管理、社會倫理、國際合作、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重要原則。這些啟示可以指導現代社會制定政策和管理社會，以實現社會的公平、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3、從個人角度看

《貨殖列傳》中介紹了大量成功商人，這給我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首先是自身良好的道德操守與學習能力。書中記載的商業人士普遍具備高尚的商業道德和誠信。《貨殖列傳》中提到商人應該具備長期價值觀，不僅關注短期利益。這些啟示告訴個人，在商業和職業生涯中，誠實守信是建立良好聲譽和信任的基礎。個人應該堅守道德原則，遵循誠信準則。商人展示了創新和競爭的能力。個人可以從中學到，不斷追求創新，提升自己的競爭力。通過學習新知識和技能，個人可以在職場中脫穎而出。同時也要培養長遠思維，考慮自己的長期目標和可持續發展，而不是僅僅追求即時回報。

《貨殖列傳》中展示了商業人士具備的經濟知識豐富，如有效的財務管理和風險管理技能等專業能力，這也是他們取得成功的秘訣。這啟示個人在財務管理方面應謹慎，制定預算，理性投資，並考慮風險。個人也應該具備風險管理的能力，以應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性。《貨殖列傳》中反映了商人的教育和自我提升精神。個人應該不斷學習和提升自己的知識和技能，以適應不斷變化的職業和社會環境。這一啟示告訴個人，要關注環境問題，採取可持續生活方式，為保護地球做出貢獻。《貨殖列傳》中強調商人應該具備社會責任感，回饋社會。這一啟示告訴個人，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和志願者工作，為社會做出貢獻，實現個人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綜上所述，從個人角度看，《貨殖列傳》中的現代啟示強調了商業道德、創新、財務管理、社交技能、長期價值觀、社會責任感、教育和環保等方面的重要原則，這些原則有助於個人在現代社會中實現成功和提升自身品質。

三、結論

《貨殖列傳》中的經濟思想反映了秦漢時期的經濟繁榮和商業活動的重要性。它強調了商業的重要性，商業道德的遵守，政府幹預和監管的存在，以及商人的智慧和技能。這些觀點和觀念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國經濟思想的發展和演變，也為今天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及社會對商業活動的態度和期望。《貨殖列傳》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經濟文獻，其中記載的宏觀經濟思想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府是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反之經濟對於國家的發展助力極大，經濟活動保證了政府主要收入之一的稅收穩定。因經濟發達而興起的商人群體也成為穩定社會的力量，幫助政府分擔社會責任，實現低成本高效率治理社會。經濟活動也產生市場競爭和創新，帶動國家科學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內容發展，是國家強大社會進步的必要物質準備。經濟的發展帶動技術工業進步，同時也為國家可持續發展提供技術資金支持。每次中東戰爭必然影響能源，最近的巴以衝突又使能源問題受到更多關注，只有實現低能耗，高效率，國家才能讓經濟發展更有保障。經濟發展也能幫助社會弱勢群體，維持其最低保障，避免出現社會動盪。貿易也會促進經濟發展，國際貿易和合作更是如此，還能使各個國家加強溝通與瞭解，避免文化差異引起的衝突與戰爭，起到文化交流，資訊共用等多方面的合作。

二、經濟對於社會的穩定不可或缺，經濟活動促進社會和諧和合作，共同進步。分工也促使社會的優勢提升，經濟活動產生大量商人，他們承擔了一些社會責任，同時積極參與公益活動，成為降低社會貧富差距的重要力量，同時經濟發達帶動文化道德水準同步提高，社會倫理和道德教育也快速發展，社會公平和正義成為主流聲音。物質的積累為文化傳承和教育發展打下基礎，沒有一個經濟強國不是教育強國。同時經濟發展降低社會風險，更有利於社會內部穩定。經濟推動了社會合作和國際交流，這在今天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的今天更是格外重要，推動不同社會相互理解包容，從內部化解矛盾而避免了矛盾激化成為戰爭的內因。

三、經濟的考驗個人能力的試金石，成功的商人應該是德才兼備。要想成為成功的商人應該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這也是商人立聲之本，只有商業道德與誠信，才能長久發展。社會責任感也比較強，通常社會活動家與慈善家都少不了商人的影子。商人的成功離不開戰略上的長期價值觀的引導，他們從不追求短期的利益，這與今天娛樂帶給我們的及時快樂完全不同，他們更享受成功帶給他們的

成就感。同時戰術上要富有創新和競爭力，在今天複雜多變的商業環境中能及時察覺並積極應對，尋找新的解決方法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成功商人的財務管理和風險管理一定是優於普通人的，這也是他們專業能力的體現，教育和自我提升是他們保持專業性與競爭性的關鍵，同時保持必要社交技能和人際關係是獲取資訊資訊的重要途徑，現代商業課程MBA與EMBA也有這個效果。對於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等新概念新思維接受理解極快，以實際行動引領時代前景的步伐。個人要想實現經濟實力的強大必然要具備多種優秀品質與能力。

《貨殖列傳》是記載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部重要著作，又包含了極高的文學成就，它一方面反映了司馬遷重視商業發展，主張政府適度幹預，本文全面忠實的反映出司馬遷書中的內容，積極聯繫當下後疫情時代經濟複雜多變的局面，提出新的觀點與思想，更好傳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並讓其在新時代熠熠生輝。

參考文獻

- [1]張高評.賦化散文與《史記》之敘事藝術——以《滑稽列傳》《貨殖列傳》《太史公自序》為例[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版),2022,45(06):52-60.2022.06.007.
- [2]何寶玉.《史記·貨殖列傳》中的商人形象及治生之術[J].文學教育(上),2022(08):94-96.2022.08.008.
- [3]柴嘯森,陳新崗.從《貨殖列傳》談司馬遷的動態經濟思想[J].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39(04):32-37.
- [4]彭豔芬.唐宋時期茶葉消費研究[D].河北師範大學,2022.2022.000237.
- [5]葉夏汐.《史記·貨殖列傳》首段新解之發展說[J].新紀實,2021(34):84-87.
- [6]彭菁.《貨殖列傳序》對當代公共政策系統改進的啟示[J].中國管理資訊化,2021,24(24):207-208.
- [7]吳露萌.從《貨殖列傳序》看當代公共政策系統的改進——兼議公共政策系統的功能限度[J].中國管理資訊化,2021,24(24):211-212.
- [8]劉源.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主張[J].金融博覽,2021(12):32-33.
- [9]史明陽.四十年來《史記·貨殖列傳》商業與商人研究述評[J].商洛學院學報,2021,35(05):48-54.1674-0033.2021.05.011.

- [10]王廣通.近四十年來《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研究述評[J].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21,36(09):54-61.2021.09.008.
- [11]王超越.從《貨殖列傳序》理解公共政策體系[J].中國報業,2021(06):72-73.2021.06.034.
- [12]劉亦麟.從《貨殖列傳序》看公共政策系統的功能限度與改進[J].農村經濟與科技,2021,32(04):285-286.
- [13]王曉鵬.從《史記·貨殖列傳》看企業家精神在早期經濟活動中的表現[J].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20,35(10):6-14.2020.10.002.
- [14]魏華仙.司馬遷論貧窮——以《史記·貨殖列傳》為中心[J].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05):22-26.2020.05.005.
- [15]馬鏡涵.從《貨殖列傳》中的商人形象看早期儒商文化[J].名作欣賞,2019(20):126-129.
- [16]劉剛,廖正賢,梁晗.市場經濟理論及其中國思想溯源——《國富論》與《貨殖列傳》《道德經》比較[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33(01):51-63.
- [17]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 [18]劉志慧.《貨殖列傳》與大漢邦域崛起研究[J].蘭州學刊,2018(11):89-102.
- [19]範金民.“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商業思想[J].古代文明,2017,11(01):54-61+126-127.2017.01.008.
- [20]孫洪升,宋一淼.論司馬遷的經濟思想[J].思想戰線,2016,42(01):152-157.
- [21]彭菁.《貨殖列傳序》對當代公共政策系統改進的啟示[J].中國管理資訊化,2021,24(24):
- [22]王海榕.突出市場在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找准政府在公共政策系統中的功能定位——從《貨殖列傳序》看當代公共政策系統的改進及兼議公共政策系統的功能限度[J].南方論刊,2022,(03):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Thoughts of "The Biography of Huo Shi" from a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He JianGong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Abstract: Han historian Sima Qian included an article specifically recording economic activities in "Historical Records", "Biographies of Huo Shi", which introduced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the pre-Qin and Qin-Han periods, as well as more than thirt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merchants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ir Typical deeds summarize and explore the economic laws behi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form of stories, with novel methods and detailed content. There is very little economic content i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The feudal emperors of the past dynasties emphasized agriculture and suppressed business, and negl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which also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progress of the economy. There are very few economic works and literature. This also resulted in fewer economic idea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in China, which has many ancient books, to learn from. "Biographies of Huo Shi" is a separate economic work recorded in history books, which is really valuable. In the past sixty years, hundreds of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on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Historical Records: Biographies of Huo Shi", and relevant research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ts core content is summarized as equal emphasis on the four industries of agriculture, industry, commerce, and Yu, with no distinction between high and low. The natural profit-seeking nature of human nature, economic ethics and management thoughts.

Keywords: "Biographies of Huo Shi", macroeconomics, government

晚清科幻烏托邦中的「文明新人」

——以《新石頭記》中的賈寶玉為中心

李慧文*

摘要：在吳趸人的《新石頭記》中，古人賈寶玉於 1901 年復活，從入俗世需蓄長發編辮子，到學英文、談時事，成為現代文明人。「文明新人」賈寶玉的出現，是晚清知識分子對未來國民的想像，科幻的引入是晚清知識分子構建「文明烏托邦」的關鍵。本文研究晚清文人如何藉助科幻的手段，讓「賈寶玉」式的古人成長為文明新人。「物與文明」到「人與文明」視角的轉換，是本文研究晚清科幻的新視閥。

關鍵詞：晚清科幻；文明烏托邦；賈寶玉；文明新人；人與文明

引言

關於晚清科幻研究，既有王德威以「賈寶玉坐潛水艇」為靈感考察晚清小說，又有陳平原以「飛車」為中心考察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的演變過程，無論是「潛水艇」還是「飛車」，先前的研究多是將物作為研究基點，物的科技性更容易呈現晚清知識分子對於未來的想像。在《新石頭記》、《女媧石》等作品中，人似乎也更多是線索作用，作者通過人的視野來觀察世界，先進的科技器械，政治的改革等。

不容忽視的是，物的呈現依靠人的視野的切換，在外部環境的不斷更迭中，人也得到了成長。無論是《新石頭記》中的賈寶玉還是《女媧石》中的瑤瑟，在遊歷之中，受到新型文明的衝擊，主人公的思維方式不知不覺也發生了變化，從傳統的古人思維，逐步演變為現代文明人的思考方式。埃利亞斯所言文明是一種進程，其指出：「這兒所指出的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即便是在文明社會裡也沒有人生來就是文明的。每個人都被迫經歷的個人文明進程是社會文明進程的作用¹。」可見個體可以通過經歷而被迫成長，這也是個體文明的進程，個體文明進程是社會文明的一部分，多數時候社會文明會催發個體的文明，但是如果社會文

* 李慧文（1995—），女，福建福州人，蘇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¹ 諾貝特·埃利亞斯. 文明的進程[M]. 王佩莉&袁志英, 譯. 上海: 譯文出版社, 2018: 623.

明停滯了，該如何喚醒個體的文明進程？晚清的知識分子給了我們答案，即藉助科幻手段，虛構一個文明烏托邦，讓主人公通過遊歷虛擬的文明國度得以實現個人成長，再以個體文明反向推動現實社會的文明。

本文藉助人類學的視野，以「人與文明」作為觀察視角，分析晚清科幻小說中文明烏托邦的建構，以及文明新人的塑造。通過科幻的形式，晚清知識分子虛構了一個新中國的文明進程，試圖讓讀者遊歷這一文明進程，達到啟發民智的作用，讓民眾在思想上成為文明新人，從而反向推動社會的進程。也就是說藉由科幻的書寫樣態，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啟蒙的閉環，通過打造科幻烏托邦來喚醒愚昧的晚清國民，塑造文明新人，從而建構理想的新中國。

一、晚清知識分子的文明烏托邦

19 世紀末，一場號稱「扶清滅洋」的農民運動以燎原之勢蔓延，直至庚子國變，中國傳統社會遭到重大衝擊。晚清知識分子在現代文明影響下產生了焦慮，紛紛開始書寫想像中的新中國，試圖通過科幻的形式構想一個烏托邦式的國家。和現實中被列強欺壓的情況相反，小說中，新中國成了世界的中心。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將黃帝紀年取代耶穌紀年，《新年夢》中，蔡元培筆下的「中國一民」構想了一副新中國儒家大同烏托邦，全人類完成從家人、國人到世界人的轉變。陸士諤《新中國》中，新中國已成為世界頭號，無一窮人，成為世界留學中心。《新野叟曝言》中，主人公文祁等人設計創造了「醒獅號」飛艦，環遊月球，還把黃龍旗插上了山頂，以表示中國人的驕傲。吳趼人《新石頭記》中不僅塑造了懂外文曉時事的賈寶玉，還構建了一處「文明境界」來寄託烏托邦願景。

這些情節看似觸不可及，卻是晚清知識分子對未來中國圖景的憧憬，科幻由此成為晚清文人的精神食糧。而在現實中，清末之際，毫無民權和法治可言，正如《新石頭記》中寶玉不過聽完學堂監督演說同學生議論了一番，卻被捕入獄。當伯惠來獄中找他，他依然不解為何發兩句議論，官府無憑據就抓人監押，伯惠一語道出其中緣故：「你又迂了！官場中的事情，還不是由他去說的，要什麼憑據呢¹？」（《新石頭記》第十九回）這就是現實，晚清的知識分子面對的是腐敗的官場，民權的喪失，虛設的法律，是失序的，非文明的國度。他們渴望自由、平等，渴望民權，法治，這些都是西方現代文明的產物，於是《新石頭記》中直

¹ 吳趼人. 新石头记[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6: 150.

接虛構出一個的「文明境界」來。可見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們想像中的新中國是具有高度現代文明的。那麼何為文明？文明的概念為什麼會在這一時期被頻頻提起？

雷蒙·威廉斯在《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中，對「文明」(Civilization)這一詞彙作了闡釋：「到了啟蒙運動時期，文明(Civilization)一詞背後潛藏著啟蒙主義的一般精神，強調的是世俗的、進步的人類自我發展¹。」文明能夠帶來社會的秩序和人類的進步，不僅如此，到了 18、19 世紀，資本主義擴張，歐洲國家進一步將文明劃分不同等級，為自己的優越文明造勢。羅海嬌在《知識分子的困境：蔡元培〈新年夢〉》中指出「『文明等級論』將世界各地的人群歸為野蠻、未開化、半開化、文明、啟蒙等五個等級，並在 19 世紀初經典化，被寫入教科書，嵌入國際法，成為歐美國家認識世界的基礎²。」

19 世紀下半葉，西方現代體系的衝擊導致東亞文明秩序徹底崩潰。甲午海戰之後，西方具有現代特性的文明觀念在中國傳播開，一方面戰敗的刺激引發晚清知識分子的思想劇變，另一方面，進化論等先進的文明理念輸入帶來了文明啟蒙，晚清知識分子開始建構新的歷史觀和價值體系。可見現代文明的概念引入和社會化運用成為了近現代中國「過渡」和「轉型」的推動力量之一，也是把握清末民初現代性的宏大概念形態的重要切入點。晚清的時政情況和現代文明相差甚遠，晚清文人群體積極閱讀西方理論著述，通過留學作為獲悉前沿知識的路徑，憑藉科幻的手段，構建出晚清的文明烏托邦。那麼他們想像中的現代文明以及烏托邦圖景又是如何的？

1897 年 12 月在天津出版的《國聞彙編》刊出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一時之間「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在晚清文人中迅速傳播。高力克稱嚴復是現代文明的「盜火者³」。嚴復不是照搬西方前沿的現代文明理論，而是基於晚清中國國情的基礎上，糅合自己的思考，並通過寫作一系列的政治文論來闡釋學術思想，例如嚴復的《政治講義》，他在文中寫道：「吾人因之而得社會天演深淺之粗分。淺者不離宗法，深者已離宗法。此歷史之一公例也⁴。」嚴復藉此闡釋文明的真諦，即文明與非文明的差別在於是否脫離宗法社會，脫離宗法的國家便

¹ 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 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16: 92-93.

² 罗海娇. 知识分子的困境 蔡元培《新年梦》研究[J],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国学, 2023, 11(4): 470.

³ 高力克. 启蒙先知严复、梁启超的思想革命[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9: 73.

⁴ 严复. 政治讲义[M].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0: 35-36.

能深諳文明之道，國家才能進化為文明社會。顯然晚清的中國還是宗法制的大家族形式，於是嚴復將文明的烏托邦圖景化為八個字：「自由為體，民主為用」。

梁啟超闡述其關於文明烏托邦的期許，無非是「自由、平等的思想」，落實在憲政制度上，便是民權的表現。看似簡單的民權思想，當時的普通民眾卻無法全盤接受，其症候在於文明思想雖先進，卻無法消化。蔡元培在《文明之消化》中提到「自元以來，與歐洲文明相接觸，逾六百年矣，而未嘗大有所吸收，如球莖之植物，冬蟄之動物，恃素所貯蓄者以自贍。日趣羸瘠，亦固其所。至於今日，始有吸收歐洲文明之機會，而當其冲者，實為我寓歐之同人¹。」蔡元培這番言論不僅闡述了六百年來中國的文明現狀停滯不前的原因，即無法吸收歐洲之文明，還將追趕現代文明的希望寄託於留學歐洲的同輩，既是悲痛，也是呼籲。可見「自由、平等」烏托邦的建構關鍵在於「人」，既包括待啟蒙的普通民眾，也包含待團結起來的晚清知識分子群體。

嚴復也好，蔡元培也罷，這一眾學者的思想轉變，都與這一時期的世界動盪相關。閉關鎖國以來，自擬強盛的東方文明猛然發現已經位於人後，在古代轉向近代這個檔口，宗法制扼住了喉嚨，羸弱的國情引發的民族危機，讓晚清知識分子充滿焦慮，社會變革已然在前，他們知道無法憑空造出大樓來，只得通過試驗的形式打下基地，即在社會動盪中劃出一塊試驗田，通過理論建構的形式來闡釋他們的新中國設想。弗里德里克·詹姆遜將此稱為「烏托邦孤島」，他指出：「這種孤島就象是社會機體中的一個外來體：在這些孤島中，分化過程暫時地停止了，因此它們在社會所能影響到的範圍之外暫時保留了它們原來的形態，並見證了其在政治上的無力；也正因為這樣，它們同時提供了一個空間，使得關於社會的新的希望圖景可以在其中被詳細闡述和試驗²。」吳趸人所著的《新石頭記》中的「文明境界」便是「烏托邦孤島」，以此虛構的社會文明來促成賈寶玉個人文明的進程，《女媧石》中的「天香院」也是「烏托邦孤島」，瑤瑟便是在「天香院」的現代化運作和思想洗禮中，完成個人文明的進程。「烏托邦孤島」的封閉性提供給賈寶玉、瑤瑟這些「文明新生兒」一個完成自我修煉的機會，晚清知識分子也借孤島的實驗，將他們對人類的想像具象化。

¹ 蔡元培. 文化之消化，我们的政治主张[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83.

²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 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M]. 吴静，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2014：29.

二、「文明新人」的想像

那麼文明烏托邦裡的理想人類應當具有何種品質？莫爾在《烏托邦》中談到烏托邦居民的特點：「總之，烏托邦人絕不肯放棄精神上的快樂，他們把它放在所有快樂中的首要地位，認為它是最重要的，對他們而言，精神上的快樂主要來源於踐行美德和對於高尚生活的自覺意識¹。」可見烏托邦居民追求的是精神體驗，其來源於美德和自律。在西方文明的進程中，對於道德的追求愈來愈成為一種顯學，到了十八世紀的歐洲，康德對道德展開專門的哲學研究，他認為一門道德形上學是不可或缺地必要的，他指出：「道德本身就依然經受到各種各樣的敗壞，因為要使某種東西在道德上成為善的，它僅僅符合道德法則還不夠，而且它還必須為了道德法則的緣故而發生²。」道德是需要有法則，有一定的規範的，而非憑空造就。莫爾在《烏托邦》中，事無巨細，從婚姻，工作，學習，甚至穿衣各個方面都設置了一定規則，以此來約束人的品德。

嚴復從英國格林尼次海軍大學留學歸來，也意識到這一點，他將歐洲文明的進程歸於國民的勝利，國民的自由、自治，才建構了文明烏托邦。因而，推演至洋務運動的失敗，不是器物文明的失敗，引進科技，物的先進性固然能支撐工業，發展社會，但只是皮相。正如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中提到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時候用了一個詞「耽延」，他談到：「中國文學的現代實際是『耽延』的，作者對讀者心目中的現代常常是在歐洲早已過時的東西³。」不僅是文學，對於西方文明的認知也是「耽延」的，洋務運動等一批知識分子試圖追趕工業革命的步伐，找補錯失的器物文明，殊不知，這種方法觀念的「耽延」屬性。直至嚴復翻譯了《天演論》，「人與文明」的關係才進入晚清知識分子的視野，這也是嚴復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的緣由。嚴復在《與〈外交報〉主人書》中點出當時中國的弊病：「今日中國最大的病患是愚、貧、弱，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為最急，正是愚昧使中國日由貧弱之道而不自知⁴。」嚴復意識到，宗法社會導致的國民的愚昧，是貧弱的根源。於是對於未來國民的想像成了晚清科幻小說的關鍵。

晚清文人中，最早藉助科幻手段想像未來國民的是梁啟超，他在《新中國未

¹ 莫爾. 烏托邦[M]. 胡鳳飛, 譯.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145.

²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M]. 李秋零, 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 4.

³ 王德威. 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M]. 宋偉杰, 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23-24.

⁴ 嚴復. 與《外交報》主人書, 嚴復集 第3冊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 560.

來記》中談到：「諸君啊，須知一國所以成立，皆有民德、民智、民氣三者具備，但民智還容易開發，民氣還容易鼓勵，獨有民德一樁，最難養成¹。」在梁啟超眼中，德是智和氣的前提，沒有德，最後都會散作一團。因此重構人、改造人的關鍵，是民德。蔡元培也在《新年夢》中反覆強調，要救亡圖存必要先塑造「新民」，立國的前提在於「立人」²。

吳趼人在 1905 年的長篇小說《新石頭記》中，賈寶玉對於自由深有疑慮，什麼是自由，是否也有文明的自由和野蠻的自由，而文中老少年的回答將自由與文明的關係道得一清二楚，其說道：

「這裡頭分別得很呢！大抵越是文明自由，越是秩序整飭：越是野蠻自由，越是破壞秩序。界乎文野之間的人，以為一經得了自由，便如登天堂。不知真正能自由的國民，必要人人能有了自治的能力，能守社會上的規則，能明法律上的界線，才可以說得自由³。」

可見吳趼人的自由國民是基於自律、自覺之上的，法度、規約是自由社會之必要，也是文明人需要遵循的。總而言之，秩序內的自由才是文明，有自治能力的人才國民。

需要說明的是，晚清科幻小說採用的策略和西方科幻小說有所不同，在器物改造上側重具有科技元素的裝置，而在人的改造上，沒有採用西方科幻小說中對肉身的科技改造，而是提供了一個烏托邦的思路，即道德性的改造，塑造具有道德的新民，具備現代意識的文明人。比如：《女媧石》裡擅發明、有現代女性意識的秦愛濃，《新石頭記》中建設了「文明境界」的東方強家族，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展開政體論辯的羅在田、黃克強。現代文明理念經由這些「新民」人格化，晚清知識分子的文明新人也有了具象的形態。

這種過於「唯心」的新人想像，也有不少爭議。韓南認為晚清知識分子的烏托邦想像，是基於神話造出的，並沒有科學性，他指出：「最終，一個中國的烏托邦世界在傳統中國道德與先進科學相結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來⁴。」晚清科幻烏托邦難以擺脫道德結合科學的模式，一是由於梁啟超、嚴復、吳趼人等人對儒家傳統思想曖昧不明的態度，二是時代的局限性，對於當時重病的中國而言，求亡圖

¹ 梁啟超. 新中國未來記[M].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11.

² 朱軍. 晚清小說“反西方—超西方”的烏托邦想像, 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J], 2013, 5(3): 371.

³ 吳趼人. 新石頭記[M]. 廣州: 花城出版社, 1986: 178.

⁴ 韓南. 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163-164.

存是第一要義，科學小說的技藝固然仍待打磨，民智喚醒卻迫在眉睫，這種焦慮使得他們急於在這一時期的科幻小說中，推出具有新民特點的現代文明人，於是《新石頭記》中的賈寶玉成了典型。

然而，民智難啟，《新石頭記》中，寶玉在北京差點被無良客棧老闆設計殺害，卻因為他懂洋文，老闆以為他和洋大人有關係，而逃過一劫，足以見諷刺性。可見國民愚昧，喚醒民智，培養新民成了一條最為艱難的道路。弗裏德里克·詹姆遜在考察托馬斯·莫爾式的知識分子時，發現他們對自我的認知為：「知識分子正是這樣一些孤立空間中的精英¹。」晚清知識分子也是如此，他們在無法擺脫宗法制纏繞的清末社會中，孤立無援，不得不尋求新形式，憑藉科幻的手段塑造一個「文明新人」，而回過頭來看，他們何嘗不是「文明新人」。

三、文明新人「賈寶玉」

吳趼人於 1905 年 9 月 19 日在《南方報》(上海)第 28 號附張「小說欄」開始連載《新石頭記》，《新石頭記》的主人公取自《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是《紅樓夢》(又名《石頭記》)的續作，但是《新石頭記》卻是一部科學幻想類小說。小說分為兩個階段，前 20 回講述了賈寶玉於 1901 年下山還俗後遇到了薛蟠和焙茗，在兩人帶領下遊歷清末的中國，賈寶玉開始學外語和時事，從古人蛻變為近代人。後 20 回，講述了賈寶玉誤入「文明境界」，在老少年的帶領下參觀了「文明境界」，習得現代文明之道，從而轉變為文明新人。

賈寶玉生在封建大家族，掙紮於宗族倫理中，賈寶玉的難得之處在於性情單純，這也是其可塑之處。在《新石頭記》的開頭，宗法和自由之間的對抗就躍然紙上了，賈寶玉想要下山，卻因為出家後剃了光頭，不合乎禮法，內心產生了遲疑，文中寫道：

「卻又自己想著已經做了和尚，薙了頭髮、這個尷尬樣兒，如何去得？非但父親見了要動怒，就是姊妹們看了，也嫌我醜陋，不如耐過幾時，蓄了頭髮再去罷²。」

沒有頭髮這件事讓打算返俗的賈寶玉感到羞恥，懼怕父親動怒，姊妹嫌棄，可見賈寶玉潛意識裡對於封建宗法禮教的順從。因而消除自我的羞恥感，維持宗

¹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M]。吳靜，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14：30。

² 吳趼人。新石頭記[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4。

法的禮數，他甘願多挨了一年多，等辮子長到可以編了才下山。

《文明的進程》中談到人的行為發展需要一個過程：「社會中人的行為及其情感表達，從一種並不具有起始點的也不能絕對地、籠統地稱為『不文明』的形態水平，發展到了我們現在用文明這個詞來概括說明的水平¹。」正如此時的賈寶玉，他和多數晚清留辮子的民眾一般，對於傳統禮教抱有羞恥心，他的封建思想需要清除，然後慢慢生長出文明的果實。但當他來到 1901 年的上海，遇到焙茗和薛蟠，被此時上海的模樣所震驚。最開始他連火柴也不知何物，和焙茗蹲在地上一同琢磨劃火柴，這裡的「火」也預示著文明之火，賈寶玉的個人文明進程便是從這團「火」開始的。而之後當他在船甲板上，焙茗遞給他一匣獨牌洋火，他的反應淡然，便笑對焙茗道：「這是洋火呀，你沒見過麼²？」可見賈寶玉對現代事物的認識有了長進。

飲食上也是如此，他剛開始用鋼叉，小刀，喝加了方糖的牛奶，感覺不知所措。但是次日面對兩片火腿，兩個半生熟的雞蛋，「寶玉不像昨天那樣忐忑了，拿起刀叉吃了，又喝了茶，又出來閒望一回³。」一來可見賈寶玉在飲食上慢慢接受了現代餐具和食物，二來也可以看出賈寶玉的學習能力，接受新事物能力慢慢在變強。

除了學習外部的新鮮事物，他也開始提升內在修養。他為了思想能跟上時代，積極掌握當下的政治時事，他從薛蟠那拿來許多報紙，開始廢寢忘食地閱讀。《新石頭記》中有一段對於寶玉讀書之癡迷的描寫：

「然而這裡寶玉仍舊看書，原來他回來之後，在書堆裏檢出了一部全份的《時務報》，還有許多《知新報》，都開來看，覺得十分合意，並有一層奇處，看了它的議論，就象這些話，我也想這麼說的，只是不曾說得出來，不知怎樣卻叫它說了去。至於所載的時事，本不能盡懂，慢慢的看到後頭，也漸漸的懂起來了，所以越看越覺得精神煥發。等薛蟠去了，依舊看起來，競自忘倦⁴。」

從閱讀時事開始，寶玉的學習意識越發強盛，讀得多了，他也有了自己的評判，比如他認為《清議報》較《時務報》勝些。除了時事，賈寶玉又往其他領域鑽研，比如新興技術如《電報新編》，另外寶玉在伯惠帶領下參觀鍋爐廠、熟鐵

¹ 诺贝特·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M]. 王佩莉&袁志英,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8: 61.

² 吴趸人. 新石头记[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6: 27.

³ 吴趸人. 新石头记[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6: 28.

⁴ 吴趸人. 新石头记[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6: 53.

廠、洋槍廠、生鐵廠、鑄鐵廠、大炮廠、炮彈廠。寶玉通過參觀現代工廠運作，對現代器械有了更多的了解。後又開始學習外語，一開始他找到一本《無師自通英語錄》便開始學起來，遇到薛蟠的質疑他，為什麼恨洋貨卻還學洋文，寶玉已經有了自己的獨立思考：「我本來給你說過，用洋貨，也要分個有用沒用，有益無益。這洋書本是個有用的東西，自然要念念它了¹。」緊接著，他一方面從《英字入門》、《華英字典》裏自學英語，另一方面又同伯惠開始學習正宗外語，一日的學習日程滿滿當當。這樣的學習刻苦程度，才有了後文中他來到北京之後，還能在險境中通過外語與洋人溝通，從而救自己一命。

除了好學，獨立意識的增強，賈寶玉還開始審視身處的晚清社會，比如他對於文明人也有自己的見解，在他眼中，耀廉雖懂得洋玩意，卻是個假文明人，而伯惠卻可稱作真文明人。耀廉雖然懂得西方科技，卻崇洋媚外，丟失了傳統文化，而反觀伯惠，他不僅習得西方先進思想，骨子裡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還很認可。所以，他也更願意和伯惠探討時下社會話題，比如新舊黨問題、封建陋習「裹小腳」問題、教育問題、學堂分科問題，其中談到女性自立問題時候，還頗有自己的見解：

「此說出去，那殘忍行為，可望慢慢的豁免起來。然後一面興辦女學，等那些女子有了學問，自然不教她，她也要圖自立的了。此刻那殘忍之事，還沒有除去，忽然先就數她平權自立起來，譬如一個人，病倒床上，還不曾扶得他起來，卻先教他跑，怎麼辦得到呢？天下事，最怕是不辦，又怕是辦的太驟²。」

此處賈寶玉的擔憂和 1923 年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中談及的問題如出一轍，「不曾扶起來卻教他跑」如同未教會娜拉如何生存卻先叫娜拉出走，這就是「太驟」。此處賈寶玉給出了一個解決方法，就是先普及教育以啟蒙女性，慢慢地女性自有了思想的獨立，便自立起來，對其他事情也有了獨立的思考。吳趼人在《新石頭記》也將這種思路一以貫之，欲取勝利難只得緩圖之，也是他在現實中啟蒙晚清民眾的方法，即通過教習而改良思想，改造國民。

這也是吳趼人書寫科幻小說《新石頭記》的意圖，通過寶玉的成長啟蒙民眾，讓其自然地生長出思考能力。《新石頭記》中前二十回古人賈寶玉便是通過接觸近代科技事物，閱讀時政報紙，學習外語，遊覽工業製造工廠，從封建古人蛻變為近代人。他的成功說明了個人文明可以在社會文明進程中被動完成，至此賈寶

¹ 吳趼人. 新石头记[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6: 91.

² 吳趼人. 新石头记[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6: 62.

玉完成了一半的成長。而後二十回，賈寶玉則是通過遊歷科幻式的文明烏托邦，完成了從近代人到現代文明新人的真正轉變。

四、「文明新生兒」與「文明成年人」

個體的文明不是一蹴而就，如同人的發育和生長，有嬰兒期、青年期、成人期，《文明進程》中闡釋過個體文明的發展規律：「個體文明的發展，正如社會的文明發展一樣，大部分還是盲目進行的。在成年人所思考、所策劃的掩護下，在成年人和正在成長一代之間所形成的那種關係在成長一代的心靈中有其功能和影響，而這些是成年人所無意為之的，對此也幾乎一無所知¹。」這兒所指出的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即便是在文明社會裡也沒有人生來就是文明的，每個人都被迫經歷的個人文明進程是社會文明進程的作用。因為在社會系統中，個體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被置於成年人「文明」的制約與影響之下，事實上，每個人都必須重新經歷一個文明的進程，以達到他所處社會在歷史發展中所達到的水平，但這並不是說個體必須重新經歷社會文明中所有的歷史階段。

賈寶玉在「文明境界」中的境遇就是如此，他無須經歷「文明境界」社會文明中的所有階段，在他進入「文明境界」的一刻，就如同剛從這裡誕生，一誕生就會被置於「文明境界」的制約之中，關於「文明」的規矩則經由「文明成年人」老少年無意地灌輸。對「文明成年人」而言，他們已經將周遭的生活視為慣例，而諸如賈寶玉式的「文明新生兒」在前人指引下，才能不斷獲取新的知識，重建認知體系，他的思想便才達到所處社會的文明水平，這是賈寶玉成為文明新人的必經之路。

賈寶玉初入「文明境界」之時，便是老少年招待的，他同寶玉說：

「此是散境的醫生，方才所坐的房，是驗性質房。凡境外初來之人，皆由我招接到這裡，陪到驗性質房，醫生在隔房用測驗性質鏡驗過。倘是性質文明的，便招留在此，若驗得性質帶點野蠻，便要送他到改良性質所去，等醫生把他性質改良了，再行招待。內中也有野蠻透頂不能改良的，使仍送他到境外去。方才醫生驗得閣下性質晶堂，此是外來之客萬中難得一個的，足見閣下是文明隊中人，向來在外面總是鐵中錚錚、庸中佼佼的了²。」

¹ 诺贝特·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M]. 王佩莉&袁志英,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8: 482.

² 吴趸人. 新石头记[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6: 171.

可見「文明境界」的設定中，其對外部世界的來客會做初步篩選，通過測驗，判斷來客是該招留，改良，還是送出境外，而寶玉的質地屬於文明隊中的人，於是由老少年招待他參觀文明境界。在「文明境界」中老少年擔任的便是「文明成年人」的角色，將「文明境界」中的文明知識灌輸給賈寶玉。賈寶玉作為文明新人，經歷了從「新生兒」到「成年人」的文明習得過程，他成長的動力是為了完成「補天」願景，為正在成長的一代「文明新生兒」即晚清民眾，引一條文明之路，帶領他們經歷個體文明的進程。

前 20 回，賈寶玉在清末的遊歷使其意識到近代中國社會的弊病，而後 20 回，賈寶玉則在「文明境界」中的遊歷中尋得了良藥，他自覺地將「文明境界」內外的事物和理念進行比較，並且在腦海中形成認知圖譜。老少年向賈寶玉介紹了「文明境界」中的兩大核心：「文明專制」和「德育」，也是從這兩個邏輯層面，實現了人民自治、德育普及、科技發達的願景。《新石頭記》藉由老少年之口提供給賈寶玉了一套社會改革的參考方案，這也是吳趼人對國民想像的文字體現，經由賈寶玉的學習進程，傳播給民眾。賈寶玉跟隨老少年的學習過程，有疑惑，有思辨，符合文明進程的行為規律，其表現為：「文明進程是人的行為與感覺在某一方向的改變。然而顯而易見的是，這種改變，這種『文明』，並非是在過往的年代裡某一時刻、某些人有意為之；漸漸則完全是有意識、有『理智』通過目的明確的措施來實現的¹。」當賈寶玉開始思考理想的國家形態、政體、國民、文化道德、社會秩序等問題之時，賈寶玉就從「文明新生兒」成長為「文明成年人」了。

而在另一部晚清科幻小說《女媧石》中，成長中的主人公瑤瑟也遇到了「文明成年人」秦愛濃，《女媧石》中女子團體「花血黨」的總部「天香院」，就是由劍仙女史秦愛濃領導。這是中國女性自己用高科技打造的一個文明樂園，也是一個微型科幻烏托邦，不僅有巨型的溫室花房，還有霓彩閃爍的照明裝置，通信工具有無線電報、德律風，代步工具有電馬、電動汽車、電梯，吃的則是食物精汁，再也看不到落後的傳統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這些先進的科技器具，都是中國女性自己發明和製造的。秦愛濃作為「文明成年人」為「文明新生兒」瑤瑟打開了一條現代文明路。

秦愛濃除了在科技上指引瑤瑟，還在思想觀念上給予她啟發，特別是「花血黨」的「三守」宗旨：

¹ 诺贝特·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M]. 王佩莉&袁志英,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8: 469.

「第一，世界暗權明勢都歸我婦女掌中，守著這天然權力，是我女子分內事。第二，世界上男子是附屬品，女子是主人翁，守著這天然主人資格，是我女子分內事。第三，女子是文明先覺，一切文化都從女子開創，守著這天然先覺資格，是我女子分內事¹。」（《女媧石》第七回）

聽了這些文明話語，瑤瑟的反應是佩服以及認同。雖然這些宗旨有些激進，但是秦愛濃將文明小院中的規約傳授給瑤瑟，擴展了她的視野，讓她成長為更具有現代女性獨立意識的新人。此後，她也開始授課，閱讀和思考，由此可見，瑤瑟已經從「文明新生兒」成長為「文明成年人」，離開天香院後，更是開始她的現代女性思想科普之路。

賈寶玉和瑤瑟習得文明之道後，就將這些視為常理，他們成為了嚴復、梁啟超所要塑造的新民代表。他們是晚清新型知識分子的代表，和封建禮教培養出來的文人不同，不再是一心追求自我功名，埋首於四書五經中，維護宗法制的合法性。他們的胸懷更為寬廣，以救亡圖存為己任，敢於實踐，具有現代思維，積極吸納新知，探尋文明社會的發展之道，是具有優良品格的文明新人。這些文明新人也是晚清文人們的希望，是建構文明烏托邦的核心所在。

結論

因此在清末之際，知識分子用小說呈現了「進化中的人類」的可能性，通過科幻的手段，虛構出一個烏托邦，通過主人公遊歷文明的烏托邦，試圖讓個體經歷一段模擬的文明進程，隨即完成個體的文明進程，從而反向推動現實社會的文明進程。埃利亞斯也預言到這一點，談到人和社會的關係時候，指出：「機器、科學發明、國家形態等所有可以算作文明的個別的事物，都是某種特定的人類行為的見證，都是社會和人與人之間一種特定結構的見證。這裡要提出的問題是能否進一步了解人類行為的變化和人類『文明』的社會進程，至少是了解其中的某些階段和這一進程的最基本的特點²。」在晚清的科幻作品中，出現的機器、科學發明甚至於對政黨的想像，都是作者虛構的一段社會文明進程，但是人的行為卻可以真切地通過這種虛構而發生變化。古人賈寶玉在遊歷了「文明境界」後，終於在最後做了一場關於「萬國和平會」的夢，這也呼應了梁啟超《新中國未來

¹ 海天獨嘯子. 女媧石[M]. 沈陽: 春風文艺出版社, 2004: 31.

² 諾貝特·埃利亞斯. 文明的進程[M]. 王佩莉&袁志英, 譯. 上海: 譯文出版社, 2018: 61.

記》開頭的「萬國太平會議」。倘若說梁啟超的未來中國是文明烏托邦的構想，是願景的終點，那麼賈寶玉就是烏托邦中的文明新人，是起點，即只有清末「賈寶玉」式的、掙紮於宗法制的民眾們的思想觀念發生轉變，成為文明新人，科幻烏托邦才能成真，才能建構現實中理想的新中國。

參考文獻

- [1] 諾貝特·埃利亞斯. 文明的進程[M]. 王佩莉&袁志英, 譯. 上海: 譯文出版社, 2018.
- [2] 吳趸人. 新石頭記[M]. 廣州: 花城出版社, 1986.
- [3] 雷蒙·威廉斯. 關鍵詞: 文化與社會的詞彙[M]. 劉建基, 譯. 北京: 三聯書店, 2016.
- [4] 羅海嬌. 知識分子的困境: 蔡元培《新年夢》研究[J],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國學, 2023, 11(4).
- [5] 高力克. 啟蒙先知嚴復、梁啟超的思想革命[M]. 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9.
- [6] 嚴復. 政治講義[M]. 上海: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0.
- [7] 蔡元培. 文化之消化, 我們的政治主張[M]. 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 2013.
- [8] 弗裏德里克·詹姆遜. 未來考古學: 烏托邦慾望和其他科幻小說[M]. 吳靜, 譯. 上海: 譯林出版社, 2014.
- [9] 莫爾. 烏托邦[M]. 胡鳳飛, 譯.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 [10] 康德. 道德形上學的奠基[M]. 李秋零, 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
- [11] 王德威. 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M]. 宋偉傑, 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 [12] 嚴復. 與《外交報》主人書, 嚴復集 第3冊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
- [13] 梁啟超. 新中國未來記[M].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 [14] 朱軍. 晚清小說「反西方—超西方」的烏托邦想像, 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J], 2013, 5(3).
- [15] 韓南. 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 [16] 海天獨嘯子. 女媧石[M]. 瀋陽: 春風文藝出版社, 2004.

The "Civilized New Man" in the Late Qing's Science Fiction Utopia

——Centered on Jia Baoyu in *The New Story of the Stone*

Li Huiwen

Abstract:In Wu Jianren's *The New Story of the Stone*, the ancient Jia Baoyu was resurrected in 1901, from wearing long hair and braid for entering the secular world, to learn English, talk about current affairs, and become a modern civilized man. The emergence of Jia Baoyu, a “civilized new man”, is the imagination of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for future citizens, the introduction of science fiction is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ed utopia by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hese late Qing writers made the ancient people of “Jia Baoyu” style grow into modern civilized man, with the help of science fictio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ng and civilization” to “human and civilization” is an attempt of new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fic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Late Qing's Science Fiction; Civilized Utopia; Jia Baoyu; Civilized New Man; Human and Civilization

劇本殺與後互聯網文化轉型： 跨媒介互動與教育創新的探索

孫麗涵¹

摘要：本研究通過文體學和文化經濟學視角，探討劇本殺在後互聯網時代如何重塑文學表現形式和消費模式，以及其對文化產業的廣泛影響。劇本殺通過其互動體驗和角色扮演，不僅革新了傳統的文學接收方式，還促進了教育領域的參與式學習和社會技能發展。研究還指出，劇本殺的跨媒介實踐顯著增強了文化參與和社會互動，突顯其在文化創新中的核心地位。

關鍵詞：劇本殺、後互聯網時代、文化產業、互動體驗、跨媒介實踐、社會互動

前言

在數字化和全球化的推動下，劇本殺作為後互聯網時代的新興互動娛樂形式，不僅挑戰並重新定義了傳統的文化娛樂和社交方式，其市場潛力也在持續擴展。2021年，劇本殺的市場規模在中國已達到170.2億元，預計到2025年將增長至448.1億元²，顯示其廣泛的市場接受度。劇本殺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其市場熱度與商業潛力已獲得廣泛認可，學術界亦從多維度對其進行深入探討。

張婧³和李瑋⁴的研究分別從市場趨勢和文學體驗創新角度，探討了劇本殺在年輕消費者中的受歡迎程度及其如何通過角色扮演加深用戶的沉浸感。隋春婷⁵和萬奕含⁶進一步分析了新媒體特性對用戶互動的提升以及劇本殺與傳統小說在敘事結構上的相似性。此外，羅長青⁷和楊紫馨⁸等學者探討了劇本殺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應用潛力以及在敘事結構上的創新。

¹ 孫麗涵，全南大學東亞學習博士在讀。

² 艾媒諮詢，《2022-2023年中國劇本殺行業發展現狀及消費行為調研分析報告》，2023年2月。

³ 張婧，《數據揭示劇本娛樂行業發展現狀與趨勢》，《中國文化報》，2023年6月6日，第007版。

⁴ 李瑋，《“主動幻想”：作為新空間形式中的“文學”的劇本殺》，《網絡文學研究》，2022年第2期 總第93期，頁碼：79-85。

⁵ 隋春婷，《劇本殺遊戲的媒介特殊性和新媒體時代的轉型思路》，《全媒體探索》，2024年1月號，頁碼 133-136。

⁶ 萬奕含，《劇本殺的文學敘事研究》，《文藝理論與批評》，2023年第3期，頁碼 192-198。

⁷ 羅長青，《劇本殺作為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實踐策略》，《文化研究》2023年第2期，頁碼 45-49。

⁸ 楊紫馨，《還原·沉浸·交互：論劇本殺劇本的三重創新》，《新媒體研究》，2023年第4期，頁碼 78-82。

雖然現有研究揭示了劇本殺對傳統文化娛樂的影響及其市場擴展潛力，但從文學轉型角度的深入探討仍顯不足。本文旨在深入探討劇本殺作為新文化現象對文學形態和消費模式的轉變，分析其在後互聯網時代文化產業的影響，並強調持續研究其在文化與教育創新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文學互動性、創新及全球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一、新文學樣式的演變：劇本殺與文體轉型

在移動互聯網的廣泛普及、體驗經濟的興起以及消費文化的快速演變背景下，文學生產和消費的模式遭遇了深刻的變革。這場變革不僅推動了文體樣式的發展，也促進了文學形態的根本轉型。學界觀察到，網絡文學的核心結構正向“超文本和數據庫”形式轉變，表現形式趨向視覺化和直觀化。在探索文學新境界的過程中，更是深入至“靈境與場景”的維度¹。在此背景下，劇本殺作為一種融合文學、文化、娛樂和遊戲元素的創新實踐，凸顯出其獨特性²。

與傳統的案頭劇本和舞臺表演不同，劇本殺主要吸引了都市年輕人，這一群體深受青年亞文化的影響。因此，使用「亞文學」一詞來描述劇本殺的文化特徵顯得尤為貼切³。

在創作方法上，劇本殺打破了傳統文學中固有的角色層級結構，轉而強調一種去中心化的敘事模式，其中每位參與者都有機會成為故事發展的關鍵推手和情節轉折的締造者。劇本殺特別強調玩家之間的互動及角色間的均等性。角色設置通常在 3 至 10 人之間，這不僅保障了遊戲的流暢性，也保證了玩家之間充分的互動空間。遊戲中的角色平衡至關重要，以確保每位參與者都能得到一個公正而豐富的體驗。玩家所扮演的角色擁有其獨特的故事線，需借助理和溝通來逐步解開故事謎題，這一機制不僅增加了遊戲的策略性，也提升了破解謎題的樂趣。

劇本殺的「碎片化」敘事特徵與其「去中心化」人物角色設置相得益彰。在劇本殺中，遊戲環境常被設置成案件發生地，玩家的任務是通過分析線索、解決

¹ 韓模永：《超文本場景：網絡文學的空間轉向》，《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第127—132頁；

² 劇本殺是一種互動性強的遊戲，通常包括角色扮演和推理解謎，玩家通過分析線索和解開謎題來推進故事情節。這種遊戲形式在近年來特別受年輕人歡迎，因其能夠提供高度沉浸式的體驗和社交互動；

³ “亞文學”是指區別於主流文學的次文化文學形式，通常具有較強的反叛性和創新性，表現出對主流文化的挑戰和對邊緣文化的關注（劉貴祥、秧志強，2023）。

難題並揭露真兇來推進遊戲。這種娛樂性強的文學形式展示了其敘事上的獨創性。不同於傳統戲劇的線性時間進展，劇本殺採用非線性敘事，呈現出斷斷續續的事件和場景。遊戲設計包括多個線索和任務，要求玩家不僅要發現這些線索，還需連結這些看似零散的信息，利用邏輯推理來重構整個故事線。這樣的「碎片化」敘述，使得玩家體驗到探索和發現的成就感，增強了遊戲的趣味性和挑戰性。

在分類劇本殺作品時，其文體上的創新尤其顯著。作品的劃分依據不僅涉及劇情的複雜性和主題，還包括參與者的規模和所需解決的難題等因素，可以將其細分為警匪、推理、驚悚、愛情等多種類型，每種類型都強調玩家的主體地位和參與遊戲的娛樂體驗。此外，劇本殺在創作上顯著傾向於商業、娛樂及遊戲性元素，其發行策略緊密跟隨市場動態，發行方會根據市場需求定制、測試並改編劇本，這一過程以遊戲體驗為導向。劇本殺的編劇通常涵蓋了傳統作家、網文作者、影視編劇等，他們的加入不斷刺激著劇本領域的創新發展。然而，由於編劇多為轉行或業餘創作，劇本殺創作中可能會遇到創作時間和精力不足、缺乏專業文學素養等問題，這些因素可能削弱作品的藝術性和獨創性，因此將劇本殺歸類於「亞文學」也頗具道理。

這種文體的轉型不僅改變了文學的表達和體驗方式，也反映了廣泛的文化消費模式的變遷。隨著社會對互動和體驗性娛樂的需求日益增長，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從傳統消費到現代互動體驗的明顯轉變，這種轉變在劇本殺的流行中找到了明顯的體現。

二、重塑文化消費：劇本殺在現代社交與娛樂中的角色

在《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中，Fredric Jameson 深刻指出文化在後現代階段已經徹底走向大眾化。此階段不僅模糊了高雅與通俗、純文學與流行文學的邊界，而且藝術作品的商業化特徵越發明顯，逐漸轉變為市場商品。此外，隨著全球化、網絡化和數字化的加速，文學的生產和流通過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商業因素的顯著影響。

作為網絡文學發展的延伸，劇本殺通過其創新的互動模式，打破了傳統文學的精英主義，引領了文學消費的娛樂化革命。研究表明，當代「Z 世代」¹更傾向於通過虛擬體驗來滿足文化和情感需求，他們追求的是一種深層與廣泛審美的

¹ “Z世代”是指1995年以後出生的一代人，他們成長於互聯網和數字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具有高度的全球化視野和強烈的個性化需求（李厚銳，2023）。

結合。劇本殺通過其沉浸式的社交體驗，非常契合這一代年輕人的消費觀念，符合後互聯網時代體驗經濟的發展趨勢。隨著數字社交形式的興起，劇本殺正以其獨有的活力重新定義後互聯網時代的社交場景。

劇本殺結合了文學和遊戲元素，將「劇情揭謎」作為推動遊戲發展的核心動力，這與傳統文學的閱讀體驗大相逕庭。在遊戲過程中，玩家依靠劇本進行推理，並通過解析碎片化的情節和多樣的遊戲關卡來還原故事，這種模式直接影響了劇本殺的吸引力和持續性。例如，《塗川》這一情感玄幻類劇本殺，通過其豐富的敘事和角色互動，為玩家提供了一次深刻的文化體驗。從其起源和發展來看，劇本殺的娛樂屬性得到了從 19 世紀偵探小說到 21 世紀綜藝節目等多種形式的演進與確認，其混合了桌面遊戲和角色扮演的特徵，為社交娛樂市場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劇本殺不僅是從「文學」到「娛樂」的產業演變的證據，也是將創作由傳統的「文學創作」轉變為「創意寫作」的生動實踐。這種創作不受形式、歸類、命名的限制，讓創作者可以自由地發揮個人的智慧、天賦和技能。

「劇情揭謎」作為驅動力與「角色扮演」的情感邏輯在劇本殺中是密切相關的。玩家在選擇劇本的同時，也選擇了相應的角色，以促進快速的情節融入和團隊協作。劇本殺設置的角色數量通常在 3 到 8 個之間，這樣的設置不僅有助於玩家迅速融入遊戲，還便於團隊成員之間的互動和謎題解答。這些角色各具特色，如「推理偵探」、「戲劇高手」、「情感專家」和「社交達人」等，每種類型都旨在滿足不同玩家的遊戲需求和個人興趣。

從戲劇表演的體系來看，劇本殺傾向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技方法，強調玩家在遊戲中的自我忘卻和角色同化，與布萊希特的外化表演形式相對。在劇本殺的理想體驗中，玩家完全沉浸於其扮演的角色之中，體驗從真實自我到戲劇人物的全面轉變，成為他們所扮演的俠客、將軍、女王、公主、總裁等角色，通過這些角色的行動和選擇體驗戲劇性的人生邏輯，實現個性展示、情感釋放以及個人目標的實現。為此，劇本殺的編劇按照角色特性來組織情節，採用模塊化的寫作方法，確保劇本既符合故事的連貫性，又滿足不同角色的獨特需求。這種「按角色劃分劇本」的編排方式不僅確保了劇情的多樣性，也提升了玩家的參與度和體驗質量。每位玩家在劇本殺中都能享受到優質的遊戲體驗。不同於傳統的戲劇表演，劇本殺中的玩家同時擔任故事中的角色和觀眾。在這種雙重角色下，他們不僅參與故事的演繹，還從旁觀者的角度體驗其他角色的表演，這種敘述與接受

的多重身份使得劇本殺的體驗更為豐富和立體。劇本殺遊戲的獨特吸引力之一在於其提供的多角色體驗以及角色間的靈活轉換。劇本殺的結構通常採用「按節奏設幕」的方式，大多數劇本殺通常由三幕主要構成，四幕或更多的結構較為罕見。在這種常見的三幕結構中，第一幕主要功能為人物介紹和情境設置，有助於玩家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團隊建立；第二幕多聚焦於事件的發展，如凶案的展現，為劇情增添懸疑元素；而第三幕則常設有劇情高潮或關鍵轉折，通過意外的反轉或情感的昇華帶來故事的高潮。這樣的結構設計不僅加強了玩家對角色的認同感，也使得每位參與者都能在遊戲的推動下深入體驗沉浸式的互動劇情。此外，雖然某些劇本殺作品可能不顯式分幕，它們通過明確的段落劃分、排版和視覺標識來實現類似的敘事效果，形成了一種緊湊且效果明顯的微縮多幕結構。無論是實景還是線上劇本殺，製作方通常會為玩家準備與劇情主題相符的服裝、道具以及專業級的配飾，如犯罪現場標記、關鍵線索卡片、案件文件等，來增強故事的真實感和玩家的代入感。選擇合適的背景音樂和場景設計，也是為了營造與主題相符的遊戲氛圍，從而全面提升玩家的體驗。

劇本殺不僅成為了「Z 世代」青年中人氣急升的社交娛樂方式，更在於它為後互聯網時代的面對面社交交流注入了新活力。雖然互聯網提供了交流的便利，卻也減少了人們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這種現象在劇本殺中找到了解決之道。劇本殺通過集體合作和角色扮演的的方式，提供了一種與眾不同的娛樂體驗，彌補了線上社交媒介無法提供的親密社交互動。在當前社交媒體如微博、Facebook、微信及抖音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傳統的面對面社交方式正逐步讓位於線上虛擬互動。這種趨勢使得人們在時間和空間上更加碎片化，進而加劇了群體性的孤立感。社會心理學家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在對超過 200 個個案的研究中發現，儘管網絡連接性減輕了人們對孤獨和失落的感受，它同時削弱了面對面交流的價值，這是人際關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從社交角度看，劇本殺作為一種互動性強的遊戲，為面對面的社交互動提供了新平臺。在劇本殺活動開始前，玩家有機會彼此了解、討論劇本內容和分配角色任務。遊戲過程中的密切合作和交流增進了參與者之間的了解。遊戲結束後，這種社交聯繫往往可以持續存在。此外，劇本殺的現場互動有助於緩解後互聯網時代人們的社交孤獨，特別是對城市中的年輕人來說，這種現實互動提供了一種釋放壓力和建立新關係的有效途徑。

劇本殺不僅是提供娛樂的遊戲，它更重要的功能在於滿足了現代社會對實際社交互動的需求。通過遊戲中的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擬，劇本殺成為了一種促進人際聯繫、加深理解和關係構建的重要媒介。

隨著數字化媒體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增強現實（AR）和虛擬現實（VR）技術的應用，劇本殺的互動性和沉浸感得到了顯著提升。這些技術通過模擬更加真實的互動環境，不僅增強了用戶的體驗感，還極大地提高了社會互動的質量和效率。線上平臺的普及使得劇本殺可以突破地理限制，吸引全球玩家參與，從而進一步擴大其文化影響力和市場潛力。

三、跨界合作與文化創新：劇本殺在文創產業中的影響

在「新文科」的推進下，中文學科正在經歷從學科內部貫通、跨學科融合到與新技術的緊密結合等一系列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中，劇本殺的興起代表了一個顯著的現象：它將傳統的作家和讀者角色轉變為內容創作者和互動參與者，同時把文學的接收轉化為一種沉浸式的娛樂體驗。這不僅響應了消費社會對文化體驗和消費模式的新需求，也體現了傳統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消費品所面臨的挑戰，如出版業的衰退、盈利能力減弱和社會影響力的逐漸減少。劇本殺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現象，已經迅速成為都市年輕人喜愛的消費模式之一。它不僅引入了創新的消費方式，而且促進了一種跨文化的娛樂產業的發展。此產業現已發展成一個涵蓋內容創作、出版、發行及前端運營的完整產業鏈，顯著推動了文創產業向專業化和細分化方向的演進，成為推動文化創新不可或缺的力量。

文創投資人孔令西評價說：「劇本殺是一個載體，可以和各個行業融合，當一些傳統社交和娛樂形式僵化時，劇本殺能有效填補這部分的空缺。」¹其跨界整合能力使劇本殺滲透到了旅遊、教育、綜藝等多個領域，形成了「劇本殺+旅遊」、「劇本殺+教育」和「劇本殺+綜藝」等多樣的沉浸式新業態。

1. 劇本殺與旅遊業的結合

劇本殺與旅遊業的結合在全國範圍內迅速發展。多個地方利用其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與景區設施，推出了以劇本殺為主題的文化旅遊項目。例如，北京頤和園的《頤和迷案》、恭王府的《王府迷陣》、清明上河園的《東京夢華錄》等，

¹ 謝宛霏、孟佩佩：《傳統行業遇到劇本殺是降維打擊還是轉型升級》，《中國青年報》2021年11月30日，第7版。

通過引入劇本殺，不僅豐富了遊客的體驗，也顯著推動了文化旅遊的深度開發。這些項目通過讓遊客參與互動劇情，提升了參與感和滿意度，同時也為當地旅遊業帶來了新的經濟增長點。

案例 1： 在四川崇州街子古鎮的沉浸式劇本殺體驗中，街子古鎮大部分房屋仍保留著明清時期的風格，其內的味江景區已被打造成佔地 4 萬平方米的武俠小鎮。在這個武俠小鎮中，玩家可以扮演「俠士們」，完成門派任務或是接受古鎮居民的委託，換取「銀兩」及「丹藥」，獲得「武器」、「祕籍」等裝備。這種兩天一夜的沉浸之旅，不僅包含了劇本殺的遊戲環節，還融入了古鎮的文化元素和風景，提供了豐富的體驗和互動。

案例 2： 在廈門世茂凡象酒店，主題酒店劇本殺將劇本殺與酒店體驗深度融合，為玩家提供了一個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和推理解謎環境。酒店利用豪華裝修的實際置景，為劇本殺提供了逼真的場景，讓玩家彷彿置身於劇本之中。這種沉浸式的體驗方式吸引了大量年輕人前來體驗。此外，凡象酒店還注重劇本殺的社交屬性，通過組織各種活動和聚會，讓玩家在遊戲中結識新朋友，拓展社交圈子。

2.劇本殺對教育領域的廣泛影響：跨學科的實證基礎

劇本殺以其獨特的互動性和沉浸性，不僅在娛樂領域廣受歡迎，同時也逐漸成為教育創新的重要工具。通過模擬真實情境，該方法激發學習者的主動參與，促進知識的深度理解和技能的實際應用。

在語言學習領域，特別是英語教育中，劇本殺提供了一個動態的語言使用環境，使學生在角色扮演中自然而然地使用目標語言進行交流。例如，通過模擬商務談判或旅行情景，學生不僅能夠鍛煉語言技能，還能加深對文化背景的理解，從而提高語言學習的實際應用能力。

在歷史教育中，通過劇本殺重現歷史事件，學生可以深入了解事件背景、人物關係和歷史影響，這種方法增強了學生對歷史學科的興趣和學習動機。例如，通過扮演歷史人物，學生能夠更直觀地理解歷史事件的複雜性和多維性。

在自然科學和技術教育中，劇本殺形式的學習活動通過模擬科學研究過程或工程問題解決，使學生在解決問題的同時，理解科學原理和工程設計的實際應用。這種方法特別適用於複雜的科學概念和技術操作，幫助學生通過實踐學習深化理解。

在職業教育領域，劇本殺被用來模擬職場環境，如醫療、法律或商業情境，學生通過扮演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或商人，學習必要的職業技能。這種教學

模式強調實際操作和決策能力的培養，有效地橋接了理論學習與職業實踐之間的差距。

劇本殺在教育領域內的應用是多樣且效果顯著的。這種教學方法不僅提高了學習的趣味性，還顯著提升了教學的互動性和實效性，為傳統教育方法提供了有力的補充。

3.劇本殺在綜藝領域及跨媒介合作的應用：文化創新的新路徑

劇本殺以其獨特的互動性和沉浸式體驗在綜藝領域嶄露頭角，通過《明星大偵探》和《萌探探探案》等節目，將劇本殺形式引入電視屏幕，極大地提高了節目的互動性和觀看率。這些節目不僅使觀眾通過明星的表演深入感受劇情的推進和解謎的樂趣，而且顯著推動了劇本殺文化的普及。

《明星大偵探》結合明星效應和精彩的推理環節，填補了國內推理綜藝的空白，其獨創的「推理+娛樂」形態，固定了核心觀眾群，同時激發了廣泛的社交媒體討論。該節目通過引入更多遊戲環節，如狼人殺、你畫我猜、真人大富翁等，加強了觀眾的期待感與節目的娛樂性。

《萌探探探案》通過對經典 IP 的改編和實景還原，增強了節目的沉浸感和故事性。該節目雖在觀眾口碑上有所挑戰，但其推理遊戲元素和社會熱點的融入，為推理綜藝的類型化邊界拓展提供了新的視角。

這些節目的成功不只在於它們創新的內容形式，還在於它們能有效地與觀眾互動，提高觀眾的參與度。例如，《明星大偵探》的劇本殺 APP「我是謎」吸引了大量觀眾參與，這不僅帶動了全民推理的熱潮，也為節目帶來了直接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而《萌探探探案》在節目播出期間，通過實時彈幕等方式，允許用戶發表感受，極大地增強了觀眾的交互體驗。

劇本殺的廣泛實踐不僅在綜藝領域引發了內容與形式的豐富革新，而且顯著推動了相關產業鏈的發展。這種獨特的媒介融合不僅注入了傳統娛樂方式以活力，也預示了媒體創新與文化產業發展的未來趨勢。通過這種模式，劇本殺展示了其在促進文創產業創新中的關鍵角色，尤其在深化用戶參與度和增強文化產品價值方面，顯現出其非凡的潛力與優勢。

在跨媒介合作領域，劇本殺與電影、電視等其他媒介的結合開拓了文化產品創新的廣闊天地。這種合作模式通過整合傳統媒介的敘事技巧與劇本殺的互動特性，不僅拓展了媒介產品的表現層面，也顯著提升了觀眾的參與感和體驗深度。

例如，通過將劇本殺項目轉化為電視劇形式，並引入觀眾投票影響劇情發展的機制，觀眾的角色從被動的接收者轉變為內容的共創者，這一轉變不僅增強了節目的吸引力，同時也助力了劇本殺文化向更廣泛的受眾群體的普及。

結論

劇本殺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形式，不僅重塑了傳統娛樂和教育的界限，也推動了文體和消費模式的革新。這種跨媒介的互動體驗已證明了其在提高用戶參與度和增強文化產品吸引力方面的獨特優勢。

在教育領域，劇本殺通過提供沉浸式學習環境，有效地促進了學生的主動學習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的發展。這種教學方法不僅提高了學習的趣味性，還顯著提升了教學的互動性和實效性，為傳統教育方法提供了有力的補充。

在綜藝領域，劇本殺通過結合明星效應和互動劇情，不僅增強了節目的觀賞性，也拓寬了其受眾基礎。這種媒介融合不僅注入了傳統娛樂方式以活力，也預示了媒體創新與文化產業發展的未來趨勢。劇本殺的跨媒介合作模式開闢了文化產品創新的新路徑，通過增強觀眾的體驗深度和參與度，重新定義了媒體消費的景觀。

未來研究應進一步探索劇本殺在其他領域如公共藝術、社會動員和健康教育中的潛在應用，特別是如何利用劇本殺增強公共參與和提升社會意識。此外，研究者還需關注劇本殺在全球化文化交流中的角色，探索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適應性和影響力。

面對技術發展帶來的新機遇和挑戰，未來研究應深入探討劇本殺如何適應數字化和虛擬現實技術的融合，並評估這些技術如何進一步增強其教育和娛樂的價值。具體來說，應考察增強現實（AR）和虛擬現實（VR）技術在劇本殺中的應用，探索其在提升互動性和沉浸感方面的潛力。

總之，劇本殺作為一種創新的互動文化實踐，已經成為推動文化和教育創新的重要力量。它不僅促進了文化的多樣性和社會的互動性，也預示了未來文化產業發展的新方向。未來的研究和實踐應繼續挖掘劇本殺的潛力，探索其在不同領域的創新應用，並不斷完善其理論基礎，以支持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艾媒諮詢：《2022—2023 年中國劇本殺行業發展現狀及消費行為調研分析報告》，2023 年 2 月。
2. 張婧：《數據揭示劇本娛樂行業發展現狀與趨勢》，《中國文化報》，2023 年 6 月 6 日，第 007 版。
3. 李瑋：《“主動幻想”：作為新空間形式中的“文學”的劇本殺》，《網絡文學研究》，2022 年第 2 期 總第 93 期。
4. 隋春婷：《劇本殺遊戲的媒介特殊性和新媒體時代的轉型思路》，《全媒體探索》，2024 年 1 月號。
5. 萬奕含：《劇本殺的文學敘事研究》，《文藝理論與批評》，2023 年第 3 期。
6. 羅長青：《劇本殺作為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實踐策略》，《文化研究》，2023 年第 2 期。
7. 楊紫馨：《還原·沉浸·交互：論劇本殺劇本的三重創新》，《新媒體研究》，2023 年第 4 期。
8. 陳志明：《劇本殺：一種社會行為的剖析》，《社會心理科學》，2023 年第 1 期。
9. 趙林：《劇本殺與現代心理健康：機遇與挑戰》，《心理健康雜誌》，2024 年第 1 期。
10. 劉怡君：《劇本殺 3.0 帶給沉浸式文旅的新機會》，《旅遊科學》，2023 年第 2 期。
11. 高星宇：《“燒腦 推理”，劇本殺是如何形成的？——創意寫作之劇本殺行業相關介紹》，《創意產業研究》，2023 年第 3 期。
12. 孫明：《劇本殺在社交媒體中的傳播動力學研究》，《社交媒體研究》，2023 年第 1 期。
13. 韓模永：《超文本場景：網絡文學的空間轉向》，《南京社會科學》2018 年第 7 期。
14. 劉貴祥、秧志強：《新時代十年青年亞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 年第 1 期。
15. 傑姆遜：《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16. 陳海燕：《博弈與共生：網絡文學與短視頻產業聯動的內在機制》，《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 5 期。

17. 李厚銳：《面向“Z 世代”的精准化國際傳播》，《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 年第 31 卷第 9 期。

18. 趙勇：《文學生產與消費活動的轉型之旅——新世紀文學十年抽樣分析》，《貴州社會科學》2010 年第 1 期。

19. 雪莉·特克爾：《群體性孤獨：為什麼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周達、劉菁荊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年。

20. 謝宛霏、孟佩佩：《傳統行業遇到劇本殺是降維打擊還是轉型升級》，《中國青年報》2021 年 11 月 30 日，第 7 版。

**Scripted Murder Games and Post-Internet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 Exploration of Cross-Media Interaction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Sun Lihan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scripted murder mystery games reshape literary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the post-Internet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stylistics and cultural economics, as well as their broad impact on the cultural industry. Through their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and role-playing, scripted murder mystery games not only innovate traditional modes of literary reception but also promote participatory learning and social skill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The research further highlights that the cross-media interactions of scripted murder mystery games significantly enhance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underscoring their pivotal role in cultural innovation.

Keywords: Murder Mystery Games, Post-Internet Era, Cultural Industry, Interactive Experience, Cross-Media Interactions, Social Interaction

陳果“妓女三部曲”的妓女形象書寫

胡文博*

摘要：作為香港重要的“草根導演”，陳果的電影總是將攝影機對準社會邊緣人物，他以現實主義的立場和批判主義的精神構建了妓女、小混混、偷渡客等底層人物的形象。其中 2000 年的《榴槤飄飄》、2001 年的《香港有個荷裡活》以及 2018 年的《三夫》構成了陳果的“妓女三部曲”。陳果在“妓女三部曲”中彰顯了“北姑”在香港文化中的身份，並且通過其對社會的洞察，捕捉到妓女在社會中的地位並構建了三位獨特的妓女形象。

關鍵詞：“妓女三部曲”；陳果；“北姑”；香港電影；

引言

2000年陳果在完成他的“回歸三部曲”¹之後開啟了“妓女三部曲”的篇章——《榴槤飄飄》，這部講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下東北女性在香港賣淫的故事，不僅入圍了當年的威尼斯電影節，更奪得了包括金馬獎最佳影片等4項大獎²。之後2001年的《香港有個荷裡活》延續了“北姑”南下的主題，講述了來自大陸的女人在香港追逐荷裡活夢想的故事。17年後，《三夫》為這三部曲畫上了句號，陳果延續了大陸女性在香港賣淫這一母題，並找到了三位優秀的大陸女演員飾演三位被時代裹挾的女性（秦海璐、周迅、曾美慧孜）。

九二南巡³之後，無數中國人借助政策的東風湧入香港賺取“第一桶金”，這時期也加劇了香港灰色產業的亂象。《榴槤飄飄》和《香港有個荷裡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不論是《榴槤飄飄》中為了掙“快錢”的阿燕（秦海璐飾）還是《香港有個荷裡活》中嚮往好萊塢的東東（周迅飾），香港在她們眼中是“夢工廠”一般的存在。2018年的《三夫》與前兩部處於不同的背景，彼時的中國大

* 胡文博，男，河南洛陽人，山西師範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電影學方向2023級研究生。

¹ 陳果的“回歸三部曲”：《香港製造》（1997）《去年煙花特別多》（1998）《細路祥》（1999）。

² 2001年第38屆金馬獎，《榴槤飄飄》獲得最佳劇情片、最佳原著劇本、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新演員。

³ “九二南巡”亦被稱為“南方談話”，是指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間鄧小平在中國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進行的一系列巡視和講話。鄧小平此次南巡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篇章，還拯救了當時中國新興的資本市場。

陸經濟發展迅速飛升，當初南下的景象已經式微，與此同時許多香港人選擇“北上”，前往珠三角或長三角等地務工、經商。《榴槤飄飄》和《香港有個好萊塢》是“後九七”時代港人文化憂慮的言說。這兩部影片對中國大陸和香港文化關係的寓言式描述，完善了香港“文化北上”的文化理念，形成了大陸文化的南侵故事，也是對香港文化盲目樂觀的一次有力反擊。《三夫》則是今日香港褪下了往日繁榮的光環與母國的一次曖昧的連接。陳果較早地發現“北姑”這一特殊群體，他所塑造的“北姑”形象則成為香港電影中獨特且重要的銀幕形象之一。

一、“北姑”南下：香港電影中的“北姑”形象

所謂“北姑”，即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南下到香港作妓女的北方女人或者說大陸女人。¹ “長期以來，‘妓女’或‘娼妓’涵蓋了一類女性的特殊社會身份與文化指示性，參與構建了一個有關中國性別文化的形象、想像與再現的譜系，並輻射到小說、戲劇、電影等不同文藝形式之中。”² 早在1934年吳永剛執導的《神女》中，電影中的妓女形象便受到關注。阮玲玉飾演的母親為了撫養兒子上學，不幸淪為暗娼，此外她還要遭受流氓的掠奪。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雖然妓女行業未被取締，但在社會中妓女總是處於最末端的地位，片中母親也成為人人喊打的對象。《神女》揭示了動盪社會中女性生存的艱難，導演吳永剛並未以男性“窺淫癖”式的視角暴露妓女的職業，相反他以極具人文關懷的筆觸謳歌了女性的自立自強。這種精神一直延續到香港電影的創作之中。

香港電影中妓女形象的塑造基於香港現代化建設和城市化進程中工業的拓展和繁榮的商業。出身貧寒的女性想要在香港立足，或迫於男權社會中工作崗位的擠壓和薪資的低廉，從事性工作是其無奈且被動的選擇。現代化進程中的妓女承擔了絢爛旖旎的社會中邊緣的地位，她們大多來自中國大陸比較貧窮的家庭，為了生計自願或者被迫在香港從事賣淫工作。由於她們生活節儉或者為了搶佔更多的生意，“北姑”的價格一般低於香港本地性工作者的價格。在香港電影中，“北姑”往往受到本地人以及本地性工作者的歧視，他們認為“北姑”的到來搶佔了本地人的生意並且破壞了行業的規矩。妓女作為社會邊緣人物，通常被隔離於主流社會之外，而“北姑”作為來自外地的妓女更是位於邊緣的邊緣——即香

¹ 黃中山.“北姑”與“大圈仔”——解析香港電影中的另類邊緣群體[J]. 電影評介, 2007, (20): 19-20.

² 張一璋.“煙花女兒翻身記”:兩部禁娼電影中的女性表演及其文化意義[J]. 文藝研究, 2016(05): 101-109.

港社會的最底層。她們身處雙重困境，一是來自於大陸身份所受到的歧視，二是作為妓女的生活壓力。

90年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經濟快速騰飛，成為亞洲重要的經濟重心，但與此同時也助長了性產業的發展。部分香港導演關注到了“北姑”的特殊身份，以及“北姑”作為特定年代產物的時代特性。除了陳果的電影，邱禮濤的《性工作者十日談》、《性工作者2：我不賣身，我賣子宮》，余力為的《天上人間》，爾冬升的《旺角黑夜》，陳木勝的《天若有情2之天長地久》等電影都觸及到了“北姑”在香港的生活和社會地位。九七回歸之後“北姑”的稱謂開始慢慢消失，但大陸女子在香港賣淫的現象仍存在。例如在2008年上映的電影《性工作者2：我不賣身，我賣子宮》中，導演邱禮濤聚焦2000年的香港，女主角阿鐘作為一名妓女與其他社會中的打工者一樣，整日穿梭於香港的街道，在閃爍的霓虹燈下來來往往，和其他性工作者一起等待拉客。但是阿鐘的唯一目的與信念就是進行牙科手術去面對她的母親。然而即使在經濟騰飛的年代，性工作者的生意越來越差，她們不得不借助於毒品聊以慰藉自己的身體和精神。另一位從大陸來到香港的孕婦——蓮花，她不想回到家鄉，成為熟人的笑柄，她的信念只有一個，即“死也要死在香港”。兩個女人一個賣身，一個賣子宮，她們背負著同一個信仰在香港苟延殘喘。

同樣在陳果的“妓女三部曲”中，香港這個賴以生存的城市被冠以某種特殊的意義。“（香港社會）空間帶有消費主義的特徵，所以城市空間把消費主義關係（如個人主義、商品化等）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¹ 陳果將攝影機掃過香港的窮街陋巷，富有的、貧瘠的人們生活在同一個空間但卻差異極大的角落，他仿佛在說“我的攝影機不撒謊”。作為“草根”導演的他，毫不掩飾地展現社會邊緣人物的生存狀態。因為“城市空間之於個體的意義不是經濟、政治或文化的載體，而是人的生存景況。”²

二、妓女形象的豐富內涵

作為南下的“北姑”，她們既要在客人面前隱藏自己的身份，又不得不帶著自己異鄉來客的身份和同行競爭。“她們自己身上也存在著跨越兩地的角色分裂，但是香港這個欲望之地除了讓她們獲得金錢之外，更成為她們實現另一個跨

¹ 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01.

² 龔湘凌。城市與人——陳果電影香港城市形象與人物形象研究[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4，(04)：30-38.

越和飛升進入西方社會的階梯或者過渡。”¹ 尤其在《香港有個荷裡活》中，荷裡活作為一個能指，代表了繁榮、發達的美國，它更是女主角逃離本土，追求更加自由的烏托邦理想。從“死也要死在香港”到追求荷裡活的夢想，香港電影中的這群“北姑”總是在他鄉的文化背景下尋求個人的安居之地，她們在後現代主義文化語境中，以期實現去中心化（decentering），即消解亙古不變的集體身份感。在陳果的電影中能夠認識到，“香港電影習慣於將對內地的他者化想像依附在內地女性身上，通過對不同內地女性形象的塑造，來體現香港人對內地文化與香港文化在不同領域內的反思。”²

香港電影仍處於父權社會的體制下，而與已往香港妓女題材的電影不同，“妓女三部曲”並未物化女性和窺視妓女的生活。相反，陳果給予了三位女性充分的主體性，其中的三位女性形成了三種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三位女性也各自代表了不同狀態下各自的目標追求。雖然作為男性導演和長期處於香港電影工業的陳果導演並未帶有女性主義的思考去創作，但其“妓女三部曲”將三位妓女當作一個有欲望、有需求的普通人來看待。

（一）阿燕：金錢與故鄉的兩難抉擇

陳果在拍攝《香港製造》時便投身於獨立電影的製作模式，《榴槤飄飄》則順承了他獨立電影的拍攝方式，在表現女主角形象的時陳果不需受太多限制，反而給予了他充分的自由性。《榴槤飄飄》中的阿燕符合人們的對妓女的傳統認知，即妓女將身體作為商品，被動地任憑男人挑選。作為香港街頭的“站街女”，她們出賣自己的身體並取得回報，雖然阿燕抗拒這個身份，但卻不得不接受這份工作給她帶來的收益。彼時的大陸人渴望南下投身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浪潮之中，學習了九年京劇的阿燕空有一身本領，抱著巨大的期待前往香港賺錢。她具有清醒的目標，即在護照到期之前賺到更多錢。所以她不停地接客，全然地像一個賺錢機器，從早到晚，有時候連吃飯都匆匆幾口。陳果將現實中真實存在的“北姑”的生活濃縮在阿燕身上，阿燕在接客時會根據不同客人的地域從而隨意變化自己的家鄉，以期滿足男人們的獵奇心態。阿燕在香港的最後一天，從早到晚拼了命地接客賺錢，以實現在香港最後一天的最大價值。陳果捕捉到阿燕癱在床上筋疲

¹ 司若．現代城市的第二歷史——略論香港陳果的“遊民”電影[J]．當代作家評論，2004，(01):122-127.

² 孫建業．淺析“九七”前後香港電影中的內地女性形象[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1(03):17-22.

力盡的樣子，可即使這樣，她在離港的最後幾小時裡依舊堅持接了最後一位客人。如果說影片的前半部分是盡力展現阿燕在香港的賺錢生活，後半部分則轉向她回到家鄉的生活百態。影片的基調也由燈火輝煌、街道逼仄的香港都市切到東北（牡丹江）的遼闊大地和白雪茫茫之上。

當阿燕賺足了錢回到家鄉的時候，等待她的又是家中瑣事和人情世故的無奈。阿燕回到家之後首先結束了她自己的婚姻，也許大城市的生活使她意識到了婚姻制度的脆弱，或者出於認為自己的工作已然對丈夫不忠，陳果並無明確給出答案。其次，阿燕逃不掉中國傳統的人際關係，她的父母為了表現阿燕的成功，卻用她辛苦接客的錢大擺筵席，阿燕即使不情願也無法違抗父母的意願。當阿燕的表妹看到她的“成功”之後也要效仿其去南方賺錢，而阿燕默不作聲，她內心的苦澀在這片土地上無人提及，她也難以啟齒。她深知賺錢不易，但此時的人們急於南下借助政策的東風掙得大錢。香港是人人嚮往的繁榮都市，而阿燕在這裡從事的卻是最底層、最卑微的工作；故鄉是身心棲息的場所，但阿燕卻要向所有人隱瞞心底的秘密，依舊艱難地生活下去。

（二）東東、芳芳、紅紅：理想與現實的置換博弈

與《榴槤飄飄》中的阿燕不同，《香港有個荷裡活》中周迅飾演的角色則擁有主體的自覺性，她有明確的目的性，甚至用欺騙、誘惑的手段，以身體作為交換的籌碼，以期達到前往好萊塢的機會。她並不像以往的“站街女”一般，等著客人的到來，而她有固定的客戶，並且主動在網路散發自己的名片，等著客人的上鉤。電影中女主角名為東東、芳芳、紅紅，她以三個不同的名字勾引不同的男性，當與他們發生關係之後，就用強姦的理由起訴他們，進而敲詐他們的金錢。電影中的女主角被塑造為充滿誘惑、擅於算計的女人，她有預謀地接近某個人，再以不同的方式滿足她的所求。而電影中的男性角色則稍顯愚笨或滑稽，他們毫無防備地陷入女主角的圈套，甚至甘願淪為她的棋子。作為一位“北姑”，香港只是她暫時的棲息之地，而她攢夠錢之後將去往好萊塢。作為並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陳果將自己的童年經歷投射到女主角的身上，和大多數外地來到香港的人一樣，他們只是將香港作為一個跳板，最後終將離開香港，去往更理想的地方。陳果導演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道：“很多人會把香港視為暫時落腳的地方，然後

就會走，她的角色就是一個大陸女子借香港落腳再去了美國。就像我小時候來香港，父母也跟我說不知道會住多久，可能隨時都會走。”¹

儘管女主角以欺詐者的身份出現，但影片並無將女主角塑造為蛇蠍女人或反派形象。陳果導演利用周迅活潑、有靈性的表演特質給女主角灌注了具有童話般的形象。《香港有個荷裡活》像一部暗黑童話，電影中血腥的屠宰場和隨處可見被懸掛起來的豬肉象徵著欲望的流露。她擁有充分的自主權，目標明確且善於利用別人對她的好處。對於她來說現實的確是殘酷的，為了理想被迫從事一門低下的職業意味著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身體，甚至自己也遭人欺騙。

（三）小妹：倫理與道德的棄之不顧

《三夫》中小妹的形象則與前文兩位女性形象產生巨大的差異，小妹作為一個智力低下的女性，無法擁有自我意識和自主權，她所有的性行為皆來自於她本能的性欲。她智力低下但是欲望強烈，無法用言語表達她的情感，只能用肢體動作或者喊叫的方式表達自己。她已經失去正常妓女所具備的自主意識，全然將自己的身體交付給她的三任丈夫。時隔十七年，陳果在這部影片上放置了更加大膽和突破倫理道德的內容，並且賦予了這部電影神話般的色彩。與前兩部的“北姑”題材不同，這部電影並未交代女主角來自哪個具體的地方，只模糊地稱其來自華南的某個水域。基於此，小妹被賦予了神秘的色彩，她像神話故事中的女神或女巫，而她的智力處於也尚未開發的階段，亦擁有無邪無惡之態。然而她卻擁有超乎正常人的性欲，即“性癮症”。為了滿足她的性欲，她擁有了三任丈夫，也不得不被成為妓女，甚至發生了亂倫的關係。然而她的所有選擇都是被動的，她的父親和丈夫替她策劃了所有的選擇，不僅是與不同男人發生關係，還有她的意外懷孕而產下的嬰兒。

雖然呈現妓女賣淫的電影都會被大眾認為她們違反了倫理道德，但是與《榴槤飄飄》和《香港有個荷裡活》不同的是小妹毫無羞恥心。她不會在接客之後洗澡，也沒有清晰的目標，她的目的僅僅滿足自己的性欲，換言之則是治療自己的“性癮症”。她已然無視了傳統的倫理道德，也無法感知到羞恥，在這一方面她是單純的，因為她並不知曉在每次接客之後，客人的錢都進入了她父親的口袋。

¹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叢書，《焦點影人 陳果》，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出版，2024年版，第34頁。

三、妓女形象的主體性建構

“所謂主體性,是指個體面對客觀事物時所表現出來的主觀能動性,其具有自主性、選擇性和創造性等特點。”¹在“妓女三部曲”中不論是賺錢回鄉的阿燕還是前往好萊塢的東東,亦或是為了滿足欲求的小妹,她們充分體認到自身的需求,並且在自我實現時以自身所能爭取到的方式實現其目標。陳果在“妓女三部曲”中有意或無意地放置意象符號以及隱喻的設置,使其電影具有豐富的解讀空間和討論空間。“妓女三部曲”第一部《榴槤飄飄》的拍攝來自於他一直以來對香港社會的觀察,他在拍攝《細路祥》時,看到街上和茶餐廳內的妓女總是在等待接客,並且有許多大陸女子,他認為有必要拍攝一部反映這樣現狀的電影。陳果在建構妓女的形象時,以演員自身的特質出發,爾後結合演員與自己所要表達的內容。並且陳果多以水果、動物等物體作為喻體,安排事物之間的對比,進而建構和豐富妓女的形象。

在《榴槤飄飄》中,榴槤作為電影中重要的意象元素,意指著“南方”的符號,榴槤作為最典型的熱帶水果,當阿燕回到東北準備開啟新生活的時候,收到了阿芬寄來的榴槤,之前在香港的經歷和複雜的思緒湧上心頭。榴槤其自身難以打開,味道難聞,並且人們對它愛惡參半,在影片中榴槤也被當作兇器襲擊人。榴槤承載著阿燕在香港的種種記憶,也是南北方差異的鮮明體現。陳果將中國一南一北兩座城市做出了鮮明對比,香港逼仄的街道和摩天大樓轉而切換到白雪茫茫的東北曠野,遊走在兩個地區、兩種文化之間的阿燕,是時代洪流下的卑微遊子。電影中阿燕洗澡的畫面也構成了鮮明對比,在香港時,每接一次客她都要洗兩次澡,久而久之手和腳都會掉一層皮。陳果放大了細節,多次展現阿燕撕掉腳皮的畫面,回到家鄉之後,電影展現了她在澡堂從容不迫地洗澡,在這裡她終於能好好地洗個澡,沒有人催促也沒有人盯著她看。陳果在電影中表現妓女身體但不色情,表現妓女接客但不獵奇,在《榴槤飄飄》中他完全展現了阿燕回到家鄉後作為普通人的生活狀態,以及阿燕找尋自己京劇夢想的過程。

到了《香港有個荷裡活》時,陳果進一步利用意象元素豐富影片的深層含義。大磡村是香港最破舊也是即將拆遷的地方,其中生存的居民是香港底層勞動人們的縮影,他們像絕大多數香港底層人一樣為了生存而忙碌。而大磡村的後面矗立

¹ 孙玲琪,任彦智.《朱迪》中的女性身份认同与银幕呈现[J].电影文学,2020(17):143-145.

著的五座名為“荷裡活”的大樓，它們猶如一座五指山牢牢地壓在底層人民的頭頂上。貧窮與富裕僅僅隔了一條道，亦如香港的現狀，貧富差距極其嚴重，一條馬路即是難以逾越的鴻溝。而女主角，這個“北姑”，卻被包養在這棟樓裡，她夢想有一天走出這座“荷裡活”去往真正的荷裡活。女主角擁有撩人心弦的美貌，在電影中她能夠吸引所有垂涎欲滴的男人，她以挑逗或性暗示的方式使影片中的父子三人著迷或是上當，這個外來者的突然闖入改變了父子三人正常的生活。影片中秋千的意象代表著父子三人對更高階層的眺望，秋千的位置正面對著荷裡活大樓，他們在女主角到來之後便傻傻地登上秋千，甚至有些愚蠢地蕩在上面。爾後當他們意識到這是一場騙局之後，小兒子不願相信女主角是個壞人，他在大磡村的天臺上用一面紅旗寫著大大地“走”，向對面的荷裡活大樓揮舞。這面旗意味著女主角一直以來的心願，也是提醒她逃避追殺的信號。“後九七”時代，焦慮感一直籠罩在港人的心頭，正如陳果所展現的那樣，走或留則是許多人考慮和糾結的問題。女主角所飾演的“東東”“芳芳”“紅紅”成為影片中一個巨大的隱喻，始終伴隨著影片的發展。亦如“東東”所代表的“東方”，在此刻已不是北姑南下對香港的入侵，而是對“西方”（影片中荷裡活所代表的美國）的嚮往。“走”也始終是影片所隱藏的暗線，它是女主角自我意識和形象的構建，也是陳果所暗指的社會現狀。

《三夫》的靈感來源於沈從文多年之前寫的短篇小說《丈夫》，小說中鳳凰城的吊腳樓和香港今天的大澳（香港現存最知名的漁村）幾乎一模一樣，陳果大膽的拍攝方式使電影中的深層含義更加昭然若揭。小妹作為一個智力低下且無法開口言說的妓女，被輾轉分配給三個丈夫，儘管這是一件有違倫理道德的事情，但是它亦象徵著一個久久離開母體的孩子被不同勢力所掌控。小妹飄零在三地交界處，即港珠澳大橋所連接的香港-珠海-澳門三座城市。妓女在多數電影中被構建為扁平化的形象，但是在《三夫》中，小妹被加以神性的光芒，她以豐滿、容光煥發的身軀安撫、哺育著兩岸三地的人們。儘管電影中大尺度的性愛場面令人瞠目結舌，但無法以色情的眼光去看待它，小妹就像歷史中被征服的土地，無言地歷經被佔領。她被視為一盞沒有聲音的肉身菩薩，反復安排在不同男人之間，象徵著漂泊無依的香港人。導演在接受採訪時說道，他將“海”、“陸”、“空”三個概念放入《三夫》中，“在我們中國人裡面‘空’不是天空的空，不是老外講的空，是什麼都沒有的‘空’。所以到最後連顏色都沒有了，空的意境就來了。

這樣就有了它非常重要的一環，它比‘海’、‘陸’還要沉重，還要來得有意義。”¹

陳果通過構建“妓女三部曲”裡的意象符號，如：榴槤、荷裡活大樓、漁船等物，進一步彰顯三位女性在影片中獨特的身份特徵。其物在能指的意義上的符號替代了原有的所指含義，進而將妓女——這一敏感的身份的生活境況、個人意識和身世特質凸顯出來。三位女性重新定義了妓女的意義，她們不再是傳統觀點上放浪形骸的賣淫女，而將從事的性工作在道德上邏輯化，還給予了妓女賣身合理化的理由。

四、結語

“香港電影作為一種主要的大眾文化形式和港人重要的娛樂生活方式，是有效探詢香港人身份認同與民族／國族意識的重要指標。”² 作為一直以來關注香港底層群眾的陳果，他敏銳地捕捉到九七前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繼而拍攝了反映大陸與香港關係的“回歸三部曲”。爾後，他將這種思考轉嫁於“妓女三部曲”中，進而揭示回歸後香港政治、經濟、文化的複雜變化。“妓女三部曲”的拍攝歷經了18年，18年間香港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發展已經不像往日那樣輝煌，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早已過去。陳果一如既往地目光望向社會前進中的小人物，《三夫》既是“妓女三部曲”的終章，也是陳果對今日香港交出的答卷。陳果曾經說道：“香港電影不愛思考，但我的電影有思考性……我沒有專教育觀眾去做什麼，我沒有教育觀眾的責任，我的電影反映社會的現象，是有力量的，是我個人的感受。”陳果在“妓女三部曲”中所建構的妓女形象放置在香港電影史中是罕見的，他敏銳地捕捉到大環境下“北姑”這一特殊群體的生存狀態。在橫跨18年的紀錄中，從後九七到今日香港，時代的脈搏與激蕩被他通過“妓女三部曲”所串聯起來。

¹ 2020年6月1日陳果接受拍電影網的採訪<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C4y1a77h?t=577.5>

² 張燕.香港電影倫理敘事中的身份認同與國族意識(1949—2019)[J].電影藝術,2019,(04):144-150.

參考文獻

- [1] 陳果的“回歸三部曲”：《香港製造》(1997)《去年煙花特別多》(1998)《細路祥》(1999)。
- [2] 2001 年第 38 屆金馬獎，《榴槤飄飄》獲得最佳劇情片、最佳原著劇本、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新演員。
- [3] “九二南巡”亦被稱為“南方談話”，是指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期間鄧小平在中國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進行的一系列巡視和講話。鄧小平此次南巡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篇章，還拯救了當時中國新興的資本市場。
- [4] 黃中山.“北姑”與“大圈仔”——解析香港電影中的另類邊緣群體[J]. 電影評介, 2007, (20): 19-20.
- [5] 張一瑋.“煙花女兒翻身記”：兩部禁娼電影中的女性表演及其文化意義[J]. 文藝研究, 2016(05):101-109.
- [6] 包亞明主編. 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01.
- [7] 龔湘凌. 城市與人——陳果電影香港城市形象與人物形象研究[J].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 2004, (04):30-38.
- [8] 司若. 現代城市的第二歷史——略論香港陳果的“遊民”電影[J]. 當代作家評論, 2004, (01):122-127.
- [9] 孫建業. 淺析“九七”前後香港電影中的內地女性形象[J].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 2011(03):17-22.
- [10]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叢書,《焦點影人 陳果》，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出版，2024 年版，第 34 頁。
- [11] 孫玲琪, 任彥智.《朱迪》中的女性身份認同與銀幕呈現[J]. 電影文學, 2020(17):143-145.
- [12] 2020 年 6 月 1 日 陳 果 接 受 拍 電 影 網 的 採 訪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C4y1a77h?t=577.5>
- [13] 張燕. 香港電影倫理敘事中的身份認同與國族意識 (1949—2019)[J]. 電影藝術, 2019, (04):144-150.

Writing about the image of prostitutes in Fruit Chan's

"Prostitute Trilogy"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grassroots director" in Hong Kong, Fruit Chan's films always aim the camera at marginal characters in society. He constructs the images of prostitutes, gangsters, illegal immigrants and other bottom characters with the position of realism and the spirit of criticism. Among them, *Durian Durian*, released in 2000, *Hollywood Hong Kong*, released in 2001, and *Three Husbands*, released in 2018, constitute Fruit Chan's "Prostitute Trilogy". In the "Prostitute Trilogy", Fruit Chan demonstrates the identity of "northern girls" in Hong Kong culture, and captures the status of prostitutes in society and constructs three unique images of prostitutes through his insight into society.

Key words: "Prostitute Trilogy"; Fruit Chan; "northern girls"; Hong Kong film